

鳳凰週刊

AUG 2015 | 第23期 总第552期

土耳其 七月反華事件始末

解密維吾爾人偷渡路線圖



習近平考察後：駱駝灣村脫貧攻堅記 | 「大師」王林的建寺大業 | 台灣苗栗「破產」危機

ISSN 1810-4770
9771024 120050

中國內地 RMB 15.00元 港澳地區 HKD 25.00元

本刊獲特許在中國內地發售

Independent Thinking for Chinese All over the World.

www.ifengweekly.com

為全球華人提供獨立意見



《凤凰周刊》上期封面



凤凰周刊官方网站



凤凰周刊亚马逊电子刊



凤凰周刊微博



凤凰周刊微信



凤凰礼品微店

鳳凰週刊

PHOENIX WEEKLY

為全球華人提供獨立意見

咨询服务热线

深圳0755-25934567/北京010-65281005/
香港00852-22008790 传真0755-25934579

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

董事长 / 出品人 刘长乐
行政总裁 崔强
编委会副主任委员 王纪言 杨家强 周军
编委会顾问 余秋雨
编委(姓氏笔划为序) 王酉年 王多多 邓飞 刘庆东 刘爽 何新京 吴晓镛
编委会秘书长 钟大年 段敏 郭志成 唐建 袁路 喻凌霄
编委会秘书长 孙谦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

社长 / 总编辑 孙谦
副社长 丁晓曙
副总编辑 蓝艺
主编 师永刚 周宇
总编室主任 段宇宏 **总编室副主任** 黄楠
编辑部主任 崔世海 **编辑部副主任** 王毕强 路琰
记者部主任 段文
主笔 叶润洋 魏恭 袁凌
主任编辑 晓波 漆菲
主任记者 钟坚 李光 张弛
记者 谌彦辉 徐佳 陈祥 王琰 孙杨 曾鼎 赵新宇 李克难 吴如加
马军 徐伟 刘荣 邱锐 郭天力 赵福帅 曹蓓 闵云霄
特约主笔 曹景行 杨锦麟 南方朔 谢国忠 阮次山 何亮亮 石齐平
美术总监 小米 **图片总监** 丁大伟 **美编** 黄静 虎妹
多媒体发展部主任 吴穷 **广告总监** 李泽红
多媒体发展部编辑 马茹均 莫文烨

香港凤凰周刊副总经理 崔博

海外事务总经理 夏婷婷 / **社长办公室主任** 赵海燕
大区业务总经理 齐崇轩 柳楚光 傅张伟 高卉 周卫 / **出版事务部主任** 李迪 / **副主任** 张云
驻地代表 北京 贾楠 / 上海 金龄 / 广州 陈卫东 / 南京 任浩

法律顾问 王昇 **财经顾问** 沈铭

编辑出版

编辑部 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
社址 香港新界大埔工业邨大景街2-6号 电话00852-22008790
深圳办事处 深圳市深南大道2008号中国凤凰大厦1号楼6楼 邮编518026
深圳市红岭中路1008号荔景大厦9楼 邮编518001
电话86-755-25934567(订阅热线)/25934558/25580179/25934597
Email:weekly@phoenixtv.com.cn

北京办事处 北京东城区建国门南大街5号金龙建国温泉酒店3211室 邮编100005
电话86-10-65281005/65281006(订阅热线)/65211745(办事处)
Email:cubo@phoenixtv.com.cn

北京凤凰雨翔广告有限公司 汽车、外航行业总代理 IT、房地产行业代理

.. 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小关东里10号院 电话010-84467053/84467054

浙江金色凤凰影视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浙江省区域广告总代理

.. 杭州市文三路90号(东部软件园内)凤凰科技楼7号楼6层 电话0571-87175087

上海新泽广告有限公司 上海广告总代理

.. 上海市余姚路288号1号楼7楼 邮编:200042 电话021-63511838

深圳市派动广告有限公司 华南区钟表、金融、洋酒、红酒、地产行业总代理

.. 深圳市福田区上步中路南方日报大厦7楼 0755-83226011 0755-83225602

凤凰周刊理事单位 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中国内地进口 / 发行总代理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

地址 北京市工体东路16号 **电话** 86-10-65063082

承印人 凸版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北角电气道169号宏利保险中心20楼

中国大陆广告总代理·神州电视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朝阳公园西南角)凤凰中心南楼3层 电话010-65207877
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淮海中路381号中环广场1927室 电话021-52925188
成都分公司 成都市人民南路二段55号岷山饭店商务楼2705室 电话028-85588710
武汉分公司 武汉市建设大道700号香格里拉饭店432号 电话027-85781338
西安分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东新街319号索菲特人民大厦东楼2层 电话029-87928666
沈阳分公司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北大街69号总统大厦A座2103室 电话024-22814065
凤凰卫视广告综合业务机构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朝阳公园西南角)凤凰中心南楼3层 电话010-65207833-
广东一代传媒 广州市东山区文德路67-69号金德大厦28楼 电话020-83226130

广告委托代理商 深圳市凤凰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地址 深圳市红岭中路1008号荔景大厦9层(邮编518001)

广告热线 0755-25580179 传真0755-25580169

广告客户服务热线 0755-25580179/25934597 传真0755-25580169

本期所有文字和图片作品经著作人授权本刊,未经许可,不得摘编。本刊发表的文字、图片作品并不代表本刊立场观点。

本刊字体由方正电子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养老产业如何走出困局？

□ 周兼明

7月30日，广东高州一敬老院，一名72岁老人因口角情绪失控，杀死了另外3名老人，然后自己上吊自杀。该院住有22名孤寡老人，没有护工，只有一个院长。大多数时间，老人们都在自己照顾自己。

今年2月，湖南双峰一养老院发生过同样的血案，一名六旬护工因养老院亏损欠薪，用砖头打死了8位老人。5月下旬，河南鲁山的养老院火灾，夺走了38位老人的生命，失火原因同样是养老院管理与服务严重缺位。

近年来，养老机构发生的多起恶性事件，警示全社会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需尽快正视与反思中国养老事业的短板与缺陷。养老悲剧的一再发生，笼罩的不只是当事人和他们的亲人，也影响到现在的中年人与子女对未来的恐慌，间接影响到数以亿计的家庭生活质量、理财方向。

中国多难，刚刚解决温饱，就要面临“未富先老”。到去年底，大陆有近1.4亿的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10.1%。按联合国标准，此数据到7%，即已进入老龄社会。10年后，大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如何全面布局和提速中国的养老产业，已成为每个中国人都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

历届政府都很重视养老产业，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李克强总理今年又提出，要把健康产业作为国家支柱型战略产业。但具体落实到资金、人才、用地、运营等配套问题时，一些地方的力度和强度就发生了衰减。公办养老院价低，服务较好，但通常一床难求。在很多大城市，配套好的养老院排队甚至已排到20年后，八十高龄的老人才可能入住。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高定价的民办养老院闲置率很高。最新调查显示，大陆养老服务床位

的空置率高达48%。

为何如此？从综合效益看，养老院类产业本身的性质就决定了它既不会是暴利行业，也不会是短期见效的行业，更可能是问题产出比较多的行业，在中国民众习惯政府“包揽”的大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怕惹麻烦，对养老产业投入自然缺乏热情。

而民间对养老业的投入，也因困难重重，多人不敷出。中国近年人力成本上升，人们对医疗、服务水准要求的提高，与老人综合能力（支付、健康、沟通、认知、合作性、价值观等等）的下降之间，存有巨大落差。而现行某些政策又限定民办非营利养老机构不能设立分支机构，无法实现连锁经营，也阻挡了民间资本的脚步。

凡此种种，导致养老业始终没能建立起良性市场运作机制，没有形成真正的“产业”。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只有强化政府在养老产业服务中的责任担当，才能解决养老产业的重重困局。如果政府不先行参与和引导，只依靠民间和社会资本，要发展养老产业显然只能是一句空话。

所以，各地政府在发展养老产业时，首先需明确自己的责任。这里的责任不是指单纯地发展公共养老机构，而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在财政、税收、土地等领域给予民办机构以真正的扶持与助推，让民办养老机构有降低成本、提高服务的价格空间。这其中，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最为重要，政府需明确对民间资本投入养老产业的支持与资源配置，凡是市场与社会力量适合承担的，政府可减少直接的公共服务供给，让相应的民间资本与社会组织去承担具体的运营。

其次，要建立明确的以公共财政补贴为

主体的机构养老补偿机制与政府监管机制。除了公办养老机构外，对民间资本投入的养老机构，也需根据其提供服务的种类、方式及当地养老服务的需求量等多种指标，由政府确定指导价格，政府要做好公共服务的政策制定者与监管者。通过提供购买服务与外包服务，为养老产业建立有序而合理的竞争与激励机制，提高各地民办养老机构的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

养老产业的基础形成与市场培育需要较长的时间，美国的大健康产业（包括养老产业在内）已占到GDP的17%，而中国大陆目前只占5%。要使这一产业获得切实的增长，找到养老公益性与社会化运作之间的平衡点最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民间资本对养老产业的投入，最终形成一个科学而合格的养老社会评价机制。

其三，把“官建民营”作为发展养老产业的一项重要补充。目前，大陆养老服务尚处在“9073”模式（居家养老、社区养老与机构养老所吸纳的养老人数分别为90%、7%和3%）。随着老龄人口的快速增长，如按国际通用标准（百位老人需5张养老床位）计算，至少需要1000万张床位，而目前大陆只有550万张床位，缺口高达一半。基于养老机构的初始投入大、盈利少、回收期长等特点，“官建民营”的方式能够有效解决民间资本信心不足的问题，既能防范投机土地的套利行为，解决公益机构的所有权问题，也可防止重复建设及资源浪费，有助于实现规范化与标准化管理。

总之，随着大陆养老压力越来越重，养老已不是一个未雨绸缪的事情，而是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了，政府和民间无论如何都要对这一产业进行科学布局以及鼎力扶持。◎



18

COVER
STORY

谎言与冲动：土耳其7月排华始末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游行次日明确表态说：“我想指出的是，那些照片很多都是夸张和虚假的。虚假报道导致的抗议游行中发生了袭击来访的东亚客人的事情，我们对此表示强烈反对，我呼吁全体同胞不要被某些恶意的挑衅所愚弄。”

红云红河集团
HONGYUNHONGHE GROUP

赠阅部分嘉宾

卷首语 Editorial

3 养老产业如何走出困局？

现在时讯 Trending

6【瞬间 / 封面 / 台港澳 / 中国观察 / 环境&科技 /
阅读 / 军事】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18 土耳其7月排华始末

26 土耳其的中国人江湖

34 微妙的中土关系

大陆时事 Mainland Politics

42 习近平考察后：骆驼湾村脱贫攻坚记

46 大学生创业热调查

50 “大师”王林的建寺大业

53 大师“门客”与权贵“门生”

“大师”王林的 建寺大业

这里一度是王林与显贵往来，甚至聚敛钱款的重要活动场所，它们的兴建和落成，纠结着王林的精明和矛盾，是他游走江湖数十年的浓缩剧。

50▼



观察 Observer

54 社交软件或增加性工作者被害风险

特别报道 Feature

56 台湾苗栗负巨债陷“破产”边缘

60 财政危机引发台湾“希腊化”隐忧？

国际 World

64 缅甸大赦中国伐木工内情

68 菲难以打赢南海仲裁

72 唐纳德·卡贝鲁卡：亚投行已经在做正确的事

我的中国心 China Elite

76 钱理群：告别不了的教育与青年

财经线 Business

80 大陆个人信用体系或将重构

83 股市重挫下的“减持”敢死队

85 财经资讯



缅甸大赦中国伐木工内情

打击中国伐木工人有着多方考虑，既可以阻断克钦邦少数民族武装的经济来源，也可以对缅甸森林形成保护，更为重要的是让中国人明白情况的严重性。◆

64



解密《猎杀红色十月》原型事件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重新审查了苏联时期的政治案件。结果认定萨布林和沙因的行为不构成叛国，其罪名应为“滥用职权”即扣押本舰舰长，因此撤销原判决，改判萨布林十年有期徒刑，其家属被认定为“政治迫害的受害者”。

92



42 ▲

习近平考察后： 骆驼湾村脱贫攻坚记

爱心热潮只是一阵风，单纯靠捐款捐物的“输血”不可能真正解决村子的实际问题，怎么能让村子拥有自己“造血”的能力，才是检验脱贫成果的标准。

图谋天下 Galleries

86 故土怎堪离——环境难民的哀愁

历史档案 History

92 解密《猎杀红色十月》原型事件

96 微史记

文化 Arts & Culture

98 《阎明复回忆录》出版：
揭秘中苏两党特殊间谍

101 上海名妓的风头

三地书 Books

102 钱穆眼里的中国文学史

83

股市重挫下的 “减持”敢死队

大陆股市连续重挫。为稳定股市，监管当局严令打击违规减持，但仍无法阻止大股东减持套利，其根源在于制度的空白，这需要从法律层面加以规范。

广告目录

奥迪 / 第一跨页 周刊征订 / 封三 《世界遗产地理》 / 封底
凤凰网 / 13 苏州人才 / 17 比音勒芬 / 33 红云红河集团 / 37-41
多媒体 / 63 《凤凰周刊·生活》 / 67 广东南粤银行 / 73
广告资讯 / 75 将本刊作为指定读物的航空公司和酒店 / 104



MOMENT

瞬间

美国 2015 / 07 / 31

美国伊利诺伊州，国际跳伞队的164名成员完成了一项惊人之举：从6千米高空以24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倒立跳伞，并组合成巨大的花朵状队形。此队形创下了新的世界纪录。





1 法新社
2015/08/03

2 路透社
2015/08/02

中国制造业活动处在3年来最弱水平
中国制造业正处于3年来的最疲弱状态。财新/Markit 7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终值降至47.8，6月为49.4。这一终值为2012年8月以来的最低值。财新在发布报告时表示，客户需求放缓以及产出需求下降造成了进一步的裁员和采购活动降温，采购活动降温速度为2012年1月以来最快。凯投宏观首席经济学家普里查德说，坏天气是影响因素之一。“过去一个月热带风暴袭击中国主要制造中心，PMI回落部分反映出工业活动暂时受挫。”

大病医保将覆盖中国城乡
中国国务院8月2日发布文件称，2015年底前，大病保险覆盖所有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人群，其支付比例应达到50%以上，更有效地减轻个人医疗费用负担。该文件说，扩大大病保险覆盖范围是为了使“大病患者看病就医负担有效减轻”，建立强有力的大病保险制度体系。近年来，中国在医保改革方面投入巨资，但该国依然存在医生短缺、病人与医护人员关系紧张等状况。经济学家说，如果中国希望促进经济、国内消费，关键是要提高医保品质。



两位前总统虽然不是亲自参选，但作为热门总统候选人的家人，对于这场总统之战十分关注。

权力的游戏

•《时代》周刊 / 2015.08.03

→ 2015年7月的烈日下，杰布·布什和希拉里·克林顿正在某处围绕就业和经济政策相互攻击。而在达拉斯一间凉爽的办公室，乔治·W·布什和比尔·克林顿正同坐一张沙发上，一起接受《时代》采访，讨论如何应对2016年的总统大选。

两位前总统虽然不是亲自参选，但作为热门总统候选人的家人，对于这场总统之战十分关注。布什家族培养了两位总统、多位议员和州长，成为美国目前最显赫的政治王朝。“杰布·布什现在最大的目标还是先在共和党党内选举胜出吧。”谈及弟弟的目标，小布什表示，“候选人为竞选总统必须做充足的准备，但即使准备充足，也不意味着你就可以战胜别人，总会有些意外发生。在选举的过程中，候选人肯定会面临反对者与批评家狂风暴雨般的攻势，但只要习惯就好。毕竟我和我父亲都是过来人，我们会教给杰布如何在众人的批评中保持冷静。”

虽然克林顿家的政治家数远比不上布什家族，但夫妻二人先后竞选总统在整个世界都十分罕见，这对夫妻组合也可以被称为美国政坛一代传奇。

“虽然我很不喜欢在家里谈政治上的事情，也避免直接为希拉里提供参选建议，但是她真的很喜欢问我这一类的问题”，克林顿有些无奈地表示。

就在这两位前总统，同时也是两大主流偶像为本刊封面摆姿势的时候，大批选民要问：美国真的找不出靠谱的候选人了吗，以至于10次大选9次都有克林顿或布什家的人？现在为什么要关注这两个人之间不可能结成的联盟？至少现阶段，布什和克林顿的利益是一致的：两个家族都既有福佑又有包袱；都受到强大利益集团的驱动和资助；都要在已经被极端派人物扭曲的初选战场上披荆斩棘。因此这两个家族的战略优势，同时也是保护层，就是提醒所有人他们熟知总统办公室，知道什么可行，什么只是空想。

从解放军建军周年看两岸军力消长

• BBC, 节选 / 2015.08.03

→ 201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央军委纪检部门《关于对郭伯雄组织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决定给予郭伯雄开除党籍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这是继201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开除徐才厚党籍的第二个前军委副主席因贪腐问题落马。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掌权后便“刮骨疗毒”,狠抓军队内部的反腐败斗争,大力肃清郭伯雄、徐才厚的恶劣影响,以恢复解放军的战斗力,维护中共军队的良好形象,目前已经初见成效,意义十分深远。

习近平是有眼光有抱负的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他提出的“中国梦”和“一带一路”战略直接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这也是美国为什么要战略东移搞“亚洲再平衡”的原因所在。中共则借机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在南海永暑

礁建设机场及码头,对美日同盟实施“反介入,区域封锁”,还将与俄国海军举行代号为“海上联合—2015(II)”的联合军演。

从宏观来看,目前中共尚处于卧薪尝胆、蓄势待发阶段,不会与美国进行正面军事对抗。然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共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前提下,实行国家宏观调控,可以有效调动各方面资源,假以时日,大陆也将成为世界一等军事、科技强国,在东海、南海主权上将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形势。

巧合的是,台湾“国防部”于7月28日前举办“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暨利益冲突回避法”讲习,旨在让军队人员了解政府阳光法案意涵,提升财产申报作业正确性。依据规划,此项宣教活动将持续巡回至中、南、东部及金门、马祖、澎湖等地举行,彰显了军队对肃贪



防弊工作的高度重视。

贪污确是项历史久远、全球普及的社会病态行为。就经济学理论来说,贪腐不但会扭曲市场机能,消耗或错置国家资源;严重者更将导致上下交征利、诚信价值崩解,陷国家、社会于动荡不安。联合国也意识到贪腐问题是现代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而将每年12月9日定为“国际反贪日”,呼吁防止贪腐造成人类文明的迟滞。

从2008年马英九执政后,廉能政治向为施政的重要方针,相

关法规机制也都从严强化。众人皆知军队是台湾的主要武装力量,若是军人贪污腐败,势必重走历史上每一朝代晚年的老路子,因此“清廉”一直是军队的核心价值之一。采取此种策略的目标很清楚,即在短期禁绝任何可能的贪腐行径,让心存贪念者不能贪、不敢贪;在长期展望方面,则可经由持续深化的廉政教育,养成官兵以贪为耻的正直风气。可以预见的未来,两岸谁先整治好军队,谁才有战力,否则只是空有新式武器装备的纸老虎。(毕中和)

台湾教科书强调与大陆联系引发抗议

• “中央社” / 2015.08.02

→ 在针对高中历史课本修改提案的持续抗议中,数百名学生聚集在台湾“教育部”外,并一度进入立法机关。抗议者指责“教育部”不当地推行课纲调整,片面强调中国大陆与台湾的联系,拒绝听从学生们希望历史课本关注台湾本土历史的要求。

7月30日,抗议活动领袖之一、20岁的林冠华身亡,令抗议活动产生动摇。一学生抗议组织发表书面声明称,林冠华与其他抗议

者于7月23日闯入“教育部”办公室,他可能因此面临刑事起诉。抗议者举办了一场林冠华的追思会,并要求“教育部长”吴思华辞职。一些学生举着要求吴思华“停止虚伪关怀”并下台的标语,闯入附近的“立法院”。吴思华则对林冠华的死亡表示感到痛心。有报道称,林冠华死前一天与“教育部”官员举行的会议让其感到沮丧,因此选择自杀,“教育部”称正在进行调查。抗议活动也与去年的“太阳花运动”有一些相似之处。

香港医院成功进行全球首宗双肝移植手术

• 《星岛日报》 / 2015.08.02

→ 不久前,香港玛丽医院肝脏移植中心的肝脏移植发展取得突破,成功进行全球首宗双活肝移植手术。该肝脏移植中心于7月完成全香港首宗双活肝移植手术,即由两人各捐出部分活体肝脏救患者。医疗团队表示,亦成功进行了世界首宗的同步植入手术,有别于韩国与台湾地区的分步植入法,这一方法可减低手术时间及减低器官缺血时间,并提高肝功能恢复时间。

玛丽医院肝脏移植中心医护

团队指,手术是为一名急性肝衰竭的59岁男患者进行,他于7月11日在澳门确诊乙型肝炎感染,导致急性肝衰竭,转送玛丽医院,但肝功能持续恶化,进入四级肝昏迷。而他两名分别23和22岁的女儿愿意捐肝救父,经评估发现两人肝脏太小,不宜单独捐肝,遂决定由两名女儿各捐出部分肝脏。手术于7月20日分别在3个手术室同步进行,植入肝手术历时12小时,有40名医护人员参与。手术成功,目前病人情况稳定。



最近有学者把中美两国之间的互相恐惧概括得很好，认为中国恐惧于美国要围堵中国，尤其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秩序，而美国则恐惧于中国要推翻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

地缘政治阴影下的中美关系

•《联合早报》，节选 / 2015.07.28

近年来，地缘政治回归世界政治舞台。有中东变局，有俄罗斯和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冲突，在我们这个地区则有中美两国之间的地缘政治之争。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稳定的地区，既经历了高速发展，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冲突。不过，近年来，随着东海钓鱼岛问题和南中国海问题的升温，人们对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越来越担忧。因为这些问题都涉及世界上两个最大国家——中国和美国，有美国学者甚至称，中美两国关系已经到了“临界点”。“临界点”当然是有所指的，即中美两国之间的冲突即将来临。

中美两国处于浩瀚太平洋的两岸，本来并无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诚如中国领导人所说的，太平洋之大，容得下中美两国。但为什么会导致现在这样的局面呢？这里有很多原因，但主要是因为中美两大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变化，给两国所带来的心理冲击。最近有学者把中美两国之间的互相恐惧概括得很好，认为中国恐惧于美国要围堵中国，尤其是要推

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秩序，而美国则恐惧于中国要推翻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不过，具体分析来看，这种互为恐惧并没有多大的道理，更多的只是表现在心理层面。

美国人的恐惧有其自身的原因，但在一些方面，美国的恐惧往往是和中国互动过程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对中国来说，应当思考的问题就是能够做些什么，来减少美国人的恐惧而改善中美关系。

第一，双方的有效沟通仍然不足。尽管中国多年来多次向美国解释新型大国关系的含义，但类似的解释必须是日常的。这是因为两国关系深刻地受彼此国内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影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美国有其国内的巨大动力，不同的利益追求不同的中美关系，一些力量可以从中美关系的友好中获益，而另外一些则相反。

再者，在很多事情上，中国都没有作好向外在世界做解释的心理准备。例如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很大，发生任何事情都可以对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中国内部可能不这样看，因为人们总是

觉得问题一大堆，因此往往是只看国内，忘记了国外。亚投行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中国开始时并没有意识到会有那么多的国家参与进来，尤其是西方国家，其中有些是美国的传统盟友。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亚投行与现存国际和区域秩序更多的是互补的，而非竞争的。如果一开始中国有充分的准备，和美国等国家的沟通会有效得多。

第二，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缺少软力量。在很多方面，尽管并不是中国的问题，但一旦发生问题，人们就普遍认为是中国的问题。这不仅是因为西方美国一直主导着国际外交领域的话语权，而且也是因为中国本身毫无这个意识。话语权的缺失也是中国本身的原因。就举近来南中国海填海的例子。在中国开始填海之前，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家早已经在填海了。中国的行为因此是反应性的，就是对越南和菲律宾等国行为的反应。只不过中国的填海比其他国家的速度要快得多罢了。在他国填海的时候，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声？如果早发声，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在

话语权上处于被动。

第三，作为一个有责任的大国，中国有时也需要理性地理解对方的行为模式，甚至从对方的立场看问题。就是说，要理解对方。例如，美国人所具有的军事冒险精神，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所经常低估的。理解美国的军事冒险精神并不是说中国要恐惧它，而是相反。在深刻理解其军事冒险精神之后，中国可以有效管控它。中国也要把握美国对自己长期相对衰落所产生的恐惧。

第四，最为重要的是，中国也没有必要过于恐惧美国对中国政治秩序的影响。如果说美国对改变中国政治秩序不感兴趣，那是个错误；但如果认为美国可以轻易地改变中国的政治秩序，也是个错误。对美国的恐惧是中国本身没有自信的表现。要意识到，在全球化的开放社会，政治影响是互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美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要影响中国，这是人们思考问题的前提。中国很多人把美国的很多行为视为是美国要推翻中国秩序的“阴谋”，例如货币政策、股市操作、人权组织的活动等。作为大国，中国如果不能估计到美国各方面（不见得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影响，或者中国各方面对美国的影响，就很难建设新型大国关系。

（郑永年）

欧洲多支重磅足球队密集访华

•《卫报》/2015.07.25

→ 据说，在二世纪至三世纪，原始版本的蹴鞠就在中国流行着。而在跨越了许多个世纪之后，这项运动再一次在中国受到了欢迎。而这个拥有13.5亿人口的国度，如今对正在寻找球迷并拓展市场的欧洲俱乐部而言变得至关重要。

7月16日，拜仁慕尼黑来到中国，随后与巴伦西亚、国际米兰在中国踢了比赛。7月30日，皇家马德里在上海举行的2015年国际冠军杯赛中对阵AC米兰。这几支球队都希望在中国增加关注度，因为这里有着对外国俱乐部而言巨大

的潜在市场。

在中国，足球已经成为最多人观看的运动之一。中国的球迷规模、不断增长的中产球迷以及他们的消费水平使得自身成为了一个值得攻坚的市场，像曼联、阿森纳、利物浦还有巴塞罗那，近几年都在中国踢过季前赛。“中国庞大的人口、快速增长的经济和狂热的球迷使之变得非常吸引人。”中国体育咨询组织“邮差”的客户经理文森·陈说，“足球是中国最受欢迎的运动。”

俱乐部在中国的竞争并不仅仅是在绿茵场上，他们同样在网

络上刷存在感。在过去，由于使用英文网站，语言成为这些俱乐部与球迷互动的一大障碍。因此，开始有更多的俱乐部建立中文网站，同时为中国球迷提供内容。自利物浦2011年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设立官方账户后，现在已经有超过30家俱乐部在诸如微博的平台上非常积极。

根据“邮差”调研，在世界杯取得成功后，德国足球非常受欢迎。例如多特蒙德，在一年内获得了超过100万的新粉丝。拜仁作为德国冠军在中国有着相当的存在感，“邮差”称其为“球迷最爱”。而皇马今年被评为在网络上最为成功的球队，在“邮差”的红榜上占据榜首。今年早些时候，中国政府启动了提高中国足球水平的倡

议。成百上千的足球场建造了出来，而足球训练也将在2025年被引入50000所学校。中国足球的命运也在1月进入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时取得了转机。拥有更多预算的中国俱乐部招收了知名外援。

在扩大球迷基础后，外国俱乐部更多地在试着增加自身的收益，而这比增加球迷人数更难。有些人正试着通过中国流行的网络市场出售商品。比如拜仁，就在5月宣布与电商巨鳄阿里巴巴合作，在天猫上开设了网店。利物浦、阿森纳和热刺同样拥有自己的网店。文森·陈称俱乐部如果要在中国产生利润，则需要假以时日。“只要他们牢牢抓住中国市场，一切都只是时间问题。”他说。(Jennifer Duggan)

中国，冬奥会经济来了

•《日本经济新闻》/2015.07.31

→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7月31日在吉隆坡召开的大会上，决定北京为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举办地。北京将创造在同一个城市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历史。继2018年冬季奥运会的平昌（韩国）、2020年夏季奥运会的东京之后，将在亚洲的城市继续举办3届奥运会。由于申办冬奥会成功，在中国，滑雪等冬季体育项目的需求有望大幅增长，体育用品厂商和冬季度假村开发企业将积极拓展在中国的业务。

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申办候选地除了北京外，还有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阿拉木图，不过北京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经历和雄厚的资金实力受到好评，多数IOC委员将票投给了北京。大部分滑冰等室内竞技项目将在北京市内举行，计

划在2008年举办夏季奥运会之际建设的设施内举行。北欧两项和自由式滑雪将在河北省张家口市的崇礼县内举行。在高山滑雪会场方面，将在距离北京市中心约90公里的延庆县内新设滑雪场。

在中国，除了过去就在民众之间受到欢迎的滑冰之外，滑雪的人气也在迅速提高。崇礼县万龙滑雪场上一个滑雪季节的游客人数与前一年相比翻了一番。随着冬季奥运会的举办，将迅速对滑雪和滑冰爱好者的需求起到推动作用，相关行业也将越来越受到期待。

在日本，运营苗场和富良野等大型滑雪场的王子饭店自上个滑雪季节开始，接受中国房地产巨头万科的委托，运营其在吉林省开发的大型滑雪场“松花湖滑雪场”，计划今年冬季大幅扩张滑雪场，然后正式开业。此外，中



国百龙绿色科技正在张家口市建设“新雪国滑雪场”，预定今年内完工。其特点是长达3公里的滑雪道，将引进常温状态下也能进行人工降雪的最新设备。

在崇礼县，用于度假的高级公寓相继建成，开发商打算今后迅速展开销售攻势。认为在获得冬奥会举办权之后，需求将迅速扩大，在此次IOC大会之前一直

控制销售。中国国内对高价滑雪用品的需求仍不突出，而且日本企业在生产的生产也仅为小规模。曾向世界各国国家队供应官方比赛服的日本高得运目前在北京工厂主要制造面向电子零部件工厂的工作服等，但如果以获得奥运会主办权为契机，冬季体育项目受到欢迎，该公司打算扩大滑雪服生产。

资本外流引发中国经济牛熊之辩

•《金融时报》，节选 / 2015.08.03

→ 中国外汇储备连续四个季度出现下降，引发新一轮关于资本外流的警告。

对那些认为经济增长放缓加剧，同时来自债务负担加重和投资浪费的风险正推动中国滑向金融危机的人来说，每一个新的数据点背后都隐藏着资本外逃的幽灵。他们警告称，资本外流将从国内经济抽走流动性，加大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融资难度。

对那些比较乐观的分析师来说，适度资本外流表明中国在放宽资本管制，放弃痴迷于积累外汇储备的重商主义。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为中国国内的流动性担忧，因为中国央行有很多新的机制可以扩大货币供应量，取代一度由外资流入创造的流动性。

现在，随着美联储准备提高利率、中国股市出现大幅下跌，资本流动趋势显得愈发重要。“资本流出增加的趋势，反映了放开对

外投资的政策措施，也反映了国内缺乏稳定的投资机会。股价波动和对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也是助长流出的短期理由，”IMF中国部前负责人埃斯瓦尔·普拉萨德表示。

中国外汇储备在2014年6月底触及3.99万亿美元的史上最高峰之后，已经减少了2990亿美元。分析师们大多同意，中国经历了规模空前的资本流出。但他们对于资本流出的规模、原因及其对经济构成的风险各执己见。

摩根大通前驻伦敦的几名策略师估计，过去五个季度的资本流出总额达到5200亿美元。“相对于以往的资本外流，中国此轮资本外流更持久和严重。”

然而，摩根大通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朱海斌婉转地反驳了同事们的估计，他提出了几条理由，以证明上述估算数据偏高。理由之一是中国外汇储备在央行和私营



部门之间的转移。直到不久前，中国央行持有中国几乎所有外汇作为官方储备，而银行、企业和家庭持有极少外汇。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央行干预汇市。在干预力度最大的时期，央行为了抑制人民币升值每月买入数亿美元。而中国的银行和企业乐意把美元交给央行，因为在2005年-2013年期间，他们获利于缓慢但稳定的人民币升值。

这种情况在去年发生变化，去年人民币出现逾20年来首次显

著的全年贬值。如今，很多收到美元付款的中国出口企业选择持有美元，而不是兑换成人民币。经济学家表示，虽然这些美元不再扩大央行金库，但仍然在中国境内，因此不应被视为“流出”。

经济学家们预计中国将继续出现温和的资本外流，但大多数分析师认为没有理由感到恐慌。他们指出，中国仍拥有全球最大外汇储备，资本外流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国政府刻意的政策选择，而不是恐慌的投资者在寻求退出。(吴佳柏)

过半在华外企感到反腐压力

• 美联社 / 2015.07.31

→ 中国当局严厉打击腐败的行动已经让在华开展

业务的跨国公司切实感受到了压力。由化险咨询与上海美国商会联合发布的《2015中国商业报告》向企业询问了他们成为中国执法行动目标的可能性；52%的受访高管认为其公司今年成为行动目标的可能性增大。

调查发现，2013年之后，中国经济呈现出的新常态已经使得应对欺诈和腐败问题面临更大的难度；在新一届领导班子推行的反

腐行动影响下，多家知名企业面临巨额罚金，多名政府高层官员入狱。化险咨询大中华及北亚区董事总经理高凯德表示，受监管审查力度加大的影响，甚至有一家外企——葛兰素史克及其前任驻华高管被控行贿。在打击行贿受贿行为之外，中国还已开始大力实施反垄断条款，监管机构还将调查范围扩大到环境、食品、安全和税收等领域。

尽管采取了打击行动，但调查发现，有超过65%的受访企业表

示，2014年欺诈和腐败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企业面临的难题。高凯德说，15或20年前，外资企业进入中国时也面临同样的挑战，但他们容忍了这些问题，以便能够从中国的高速增长中分得一杯羹。他还表示，现在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放缓，很难再实现以前的增长速度，但这些外资企业仍然要面对这些挑战，而且这种局面短期内很难改变。调查发现，2014年，表示会提高对合规问题关注度的公司的比例增至48.7%，而2012年和2013年这一数字分别是36.6%和44.2%。公司表示，最大的风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不确定性，有52%的公司认为这是个隐患。

高凯德说，公司在合规问题上仍然摸不着头脑，原因是调查作者所说的中国法律法规不明确，常常明显背离监管部门所强调的“法治”。调查发现，虽然企业的合规意识增强并强调加强政策培训，但很多企业并没有采用调查报告作者眼中能够降低这类风险的最佳方法，比如加强第三方尽职调查、实施更为严格的监控措施、从一开始就将合规纳入公司战略以及开展定期的风险评估。不过，调查报告显示，在中国这样的市场存在很多规避合规规定的做法，仅靠增加培训还远远不够，公司应该采取更多更加积极的措施防患于未然。

中国过度建设的新典型：沈阳

•《华尔街日报》/ 2015.07.26

→ 鄂尔多斯让位，中国有了过度建设的新典型。非营利性房地产组织城市土地学会的最新年度调查报告显示，在中国30个主要城市投资和发展前景排名中，东北城市沈阳垫底，受到经济增长乏力和住宅供应过剩的拖累。该调查报告的受访对象包括100多个房地产开发商、顾问和投资者。

城市土地学会在这篇名为《2015年中国大陆主要城市房地产投资前景分析》的报告中称，沈阳排名最低，这与其停滞的经济有关，这种停滞部分是由最近的石油价格下跌造成的。私人数据

供应商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的数据显示，6月份沈阳房价同比下跌7.6%，高于中国100个城市2.7%的平均跌幅。

沈阳是辽宁省省会，拥有620万人口，是一个交通枢纽和大宗商品分销中心。但沈阳也卷入了非理性建设的热潮。据中国房产信息集团的数据，6月份沈阳的住宅存销比达31.7个月，为该机构追踪的28个大城市中的最高水平。

这座城市的购物中心和写字楼有着类似的遭遇。城市土地学会称，2008年至2013年间，沈阳的零售业开发投资超过了任何一座中国城市，连北京和上海都位居

其后。如今在这份榜单上，位居前列的不出意外的是上海、深圳、北京、广州等一线城市，与去年的情况几乎相同。

几年前，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及信贷快速增长的刺激下，中国的许多中小城市开始大兴土木，建造住宅、购物中心和写字楼。然而，市场上却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这使得人们担心会有更多的地方沦为荒凉的“鬼城”。在许多城市，紧挨着住宅楼修建的商业街上，商铺的大门紧锁，商户们还未入驻，这里就已经开始凋敝。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对吉林省进行了视察，他要求推出新的举措来鼓励中国东北企业实行创新，这也是振兴东北经济的举措之一。今年4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视察了吉林省省会长春，期间他表示

示，长春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数据表现疲软，令人忧心。

不过，一些企业仍然在这里看到了发展机会。总部位于上海的复星集团在沈阳建造的占地19万平方米的文化及娱乐综合设施豫珑城将于年底前开业。此外，复星集团还在沈阳建造一处高端生活服务中心，预计明年将迎来首批租户。

沈阳豫珑城总经理戴金铁表示，沈阳的商业地产领域存在供应过量的情况，但如果你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种过量是由于商业地产项目的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他指出，网上购物的普及也对实体店造成了冲击。但从长期来看，目前的衰亡其实是在为新事物取代旧事物铺平道路。
(Esther Fu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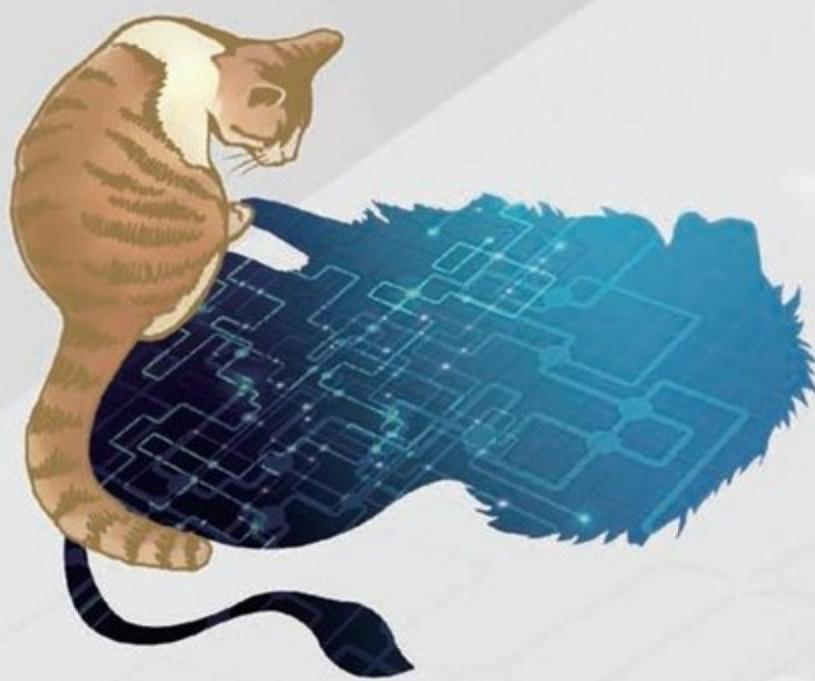
2015 凤凰 LINK+ 大会



扫码报名

重新想象未来
IMAGINATION OR FUTURE
推动互联网+ 传播新技术新思维

2015.08.16 北京 中国电影导演中心



报名咨询 : 010-6067 6753

微软“小冰”成中国大众情人

•《纽约时报》，节选 / 2015.08.03

→ 她叫“小冰”，上千万的中国年轻人被她会心的幽默和高超的倾听技巧所吸引，每天都会拿起智能手机与她互发消息。人们在失恋、失业，或者感到沮丧的时候，常常求助于她。他们经常对她说“我爱你”。

小冰可以整天和这么多的人聊天，是因为她并非真人，而是一个聊天机器人。微软去年推出的这个程序，在中国大受欢迎，也让2013年的电影《她》显得不那么像是科幻了。

“它引起的反响远比我们预期的高，”微软这个项目在北京的负责人姚宝刚说。小冰的名字来自微软的搜索引擎必应，它是人工智能软件在模仿人类大脑

方面取得进步的一个突出例子。该程序会记住之前与用户交流的内容，比如与女友或男友分手的细节，并在后来的交谈中询问用户的感受。虽然小冰是一个文字消息程序，但是在下一个版本中，它会带有Siri那种语音功能，这样人们就可以和小冰进行语音交谈了。

通过系统性地挖掘中国互联网上人与人的对话，微软为小冰赋予了一种比较令人信服的人格，以及一些“智能”的印记。该公司开发的语言处理技术，可以从实际的人类对话中，挑选出成对的问题和答案。因此小冰就有了一个如何做出回应的数据库，不仅人性化，而且紧跟潮流——小冰

还喜欢使用表情符号。

由于小冰收集了大量的私密信息，人们不可避免地对该程序的隐私问题感到担忧。但微软表示，它采用了很严格的准则，不会长期存储人们的任何信息。“我们不会追踪用户与小冰之间的对话，”姚宝刚说。“我们需要知道用户的问题是什么，所以我们先要把它存储下来，但之后就会删除。我们不会保留任何数据。删除用户数据是公司的政策。”

不过，该公司承认，它会在有限的时间内保留某些一般性的信息，比如用户的心情如何，以便小冰稍后可以提出相关的问题。微软表示，当用户通过新浪微博等网站与小冰互动时，该服务会遵循各个网站的隐私政策。

小冰是一个虚拟的化身，体现了计算机科学家早已预测的一些进展。具体而言，一种被称为

“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引领技术的快速进步，使得各种新产品和新服务成为可能。“我们能建立起一些可以更好地理解自然语言的系统，”蒙特利尔大学计算机科学家、该领域的开拓者之一约书亚·本吉奥说。“那尤其会促进用户界面、对话、回答问题和个人助理方面的发展，也会受到那些领域的推动。”

深度学习是机器学习领域一种已有几十年历史，称为人工神经网络的技术的升级版本。在生物神经元的反应的启发下，人工神经网络能识别语音、语言及图像的模式。于是，电脑越来越能以更加自然的方式与人类互动，甚至到了能够创造小冰这样具有人格的软件，吸引大批追随者的程度。微软表示，小冰现在已有2000万注册用户。

(JOHN MARKOFF)

科学家担忧人工智能军备竞赛

•《每日电讯报》/ 2015.07.29

→ 超过1000名科技专家、科学家、研究员共同撰写一封信，警告自动化武器可能带来的危险。信中警告说：“人工智能军备竞赛是个可怕的想法”。让人联想到热门电影《终结者》中的“杀人机器人”。这封信的签署有科学巨擘史蒂芬·霍金、企业家埃伦·穆斯克以及苹果公司共同创办人斯蒂芬·沃兹尼亚克。这封信在2015年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议上被呈现。

“杀人机器人”近期在联合国委员会上成为辩论的主题之一，讨论是否要禁止某些有潜在威胁的自动化武器。现在专家们呼吁要特别禁止那些使用人工智能来操控的武器，认为它们可

能会“超越人类控制”。专家们表示：“就像大部分科学家和生物学家不会对打造生化武器有兴趣一样，绝大多数的人工智能研究员不会对打造人工智能武器有兴趣，而且也不想弄脏自己的手去涉足这个领域”。

信件内容由未来生命研究院在网络上发布，纸本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议上提交。身为信件签署人之一的霍金，最近参加美国热门社交论坛Reddit“问我提问”活动，向网民收集关于“如何让未来科技更人性”的问题。去年11月，霍金曾提出人工智能可能终结人类文明的担忧。

然而，另一位签署这封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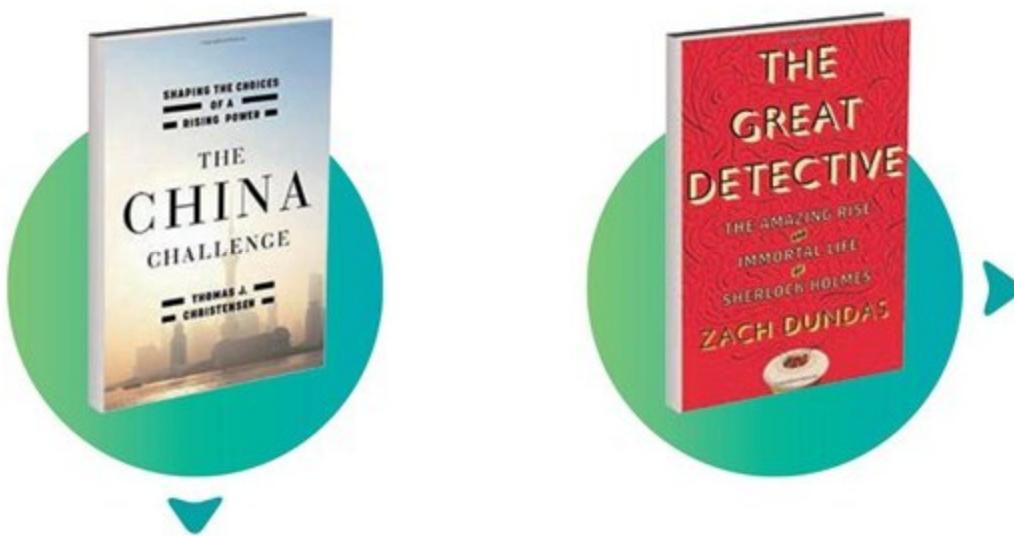
2013年4月23日，英国伦敦，国际机器人武器控制委员会的成员发起“停止机器人杀手”活动。

微软研究首席Eric Horvitz也上传了一段为人工智能辩护的影片。

“看看电脑计算已经为我们带来多少难以置信的改变，在社会经济面、医疗应用面等。人工智能改变了许多事。这将带来许多希望，许多可能的好处，当然也有其隐忧。我觉得有很多问题需要被解

决，但我期待经由人类的引导，人工智能将带来更多正面效应。”

英国国防部最近在一项声明中说到，所有英国军队的运作都必须“依照国际人道主义法”。声明称：“英国的交战规则(ROE)很明确的是依照人道主义法为基础制定的，所以在此系统中永远会有‘人为控制’。英国军方人员在目前以及未来，总会有人员下达控制武器的指令。”



为何福尔摩斯的魅力经久不衰？

•《华盛顿邮报》/2015.07.20



关于夏洛克·福尔摩斯，人们还有什么可以评论的吗？阿瑟·柯南道尔笔下的偶像侦探跨越三个世纪仍然风靡全球，目前看来丝毫没有过气的迹象。然而，扎克邓达斯所著的《伟大的侦探》一书依然十分成功。邓达斯从小痴迷福尔摩斯，他试图对福尔摩斯热潮进行全面解析，不仅探究福尔摩斯及其缔造者，也考察他们在流行文化中的不朽魅力。邓达斯问道：“福尔摩斯是如何、又是为何能保持魅力的？”

此前人们曾多次研究过这一问题，最近一次是麦克·迪尔达在《柯南道尔：讲故事的完美艺术》一书中的精彩论述，但是邓达斯仍努力开拓出新的领域。在研究、采访多家机构并一次次前往伦敦、达特穆尔等福尔摩斯“圣地”的旅程中，他一度假装创造了一套“模拟福尔摩斯破案的方法”。邓达斯承认，要踏访福尔摩斯故事中的所有地点，搞清楚故事中的所有事情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材料太多了”，但他也取得了不小成就，邓达斯书中收集了早年的《贝克街杂志》和一些文化历史学家的著作。

“福迷们”向来是杯中物的爱好者，邓达斯说，在“福迷们”早年的一次聚会上，他们喝掉了“96杯鸡尾酒、243杯威士忌、98杯黑麦酒和两杯啤酒”。“贝克街小分队”的聚会活动已经“有80年的历史，是一小群铁杆‘福迷’亚文化的鼻祖”。虽然其他作家在复述福尔摩斯原著故事时并不流畅，但邓达斯无疑是第一个以“辛普森一家”式的通俗语言复述福尔摩斯故事的人。

中国挑战：一位美国前内阁官员的视角

•《纽约时报》，节选 / 2015.07.24

“中国有避免不必要的冲突的强大动力，”柯庆生写道。但美国在“应对其最不了解的挑战，即说服这个面临着巨大国内挑战、承担着沉重历史负担的最大发展中国家积极与国际社会合作”这个问题上，没有经验。

柯庆生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曾在2006年至2008年期间在布什政府任职，担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他尽管不负责政策的制定，但在讨论中国问题时，常常会作为“后座议员”在场。

他了解中国，与中国学术界过往甚密，但这种关系似乎并不包括更多的中国普通老百姓。他的清晰叙事笔法是有名的，当他声称中国“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其影响远大于他国”，并强调说，中国“正被要求在当前做出比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以往做过的多得多的事情”时，我认为他的观点值得重视。

他的书针对的是困扰中美关

系的危机和冲突。他指出了必然会增添困扰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观念。不管是发自内心，很多中国人都表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是永远要牢记的历史因素。美国有很多盟友。北京确切地说只有一个，就是朝鲜。而柯庆生的一些高权重、或消息灵通的交谈对象向他吐露，朝鲜是个令中国烦恼的盟友。重大问题还包括气候变化、核扩散、台湾问题、缅甸问题、南海问题等。

还有突发事件，这些事件不可预见，但后果极大。比如1999年，在科索沃战争期间，美国轰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还有2001年，一架中国战斗机在国际领空与一架美国海军情报飞机的相撞事件。该事件导致中国飞行员死亡；美国飞机迫降中国领土、机组人员被短暂拘留。北京将所有这些事件称为美国的挑衅行为。

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不论是长期的、还是突发的，都会是头等的外交麻烦。柯庆生曾亲身经历过某些事件，还与中国问题

专家讨论过其他的事件。

柯庆生书中的观点似乎不同寻常地不偏不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他指出，中美两国共同制造了40%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虽然中国是目前最大的排放国，但他提出，第一世界国家是气候问题的始作俑者，中国已在控制排放上作出了一些努力。他还指出，在不使用化石燃料的情况下，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看不到他们怎样才能发展的前景。

柯庆生试图对各方都保持公平，但也并非毫无原则。他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国存在巨大的腐败问题、无视许多国际和区域规范、学术抄袭成风、一胎化政策后果严重。但柯庆生承认，中国有认为其主权继续受到新殖民主义和新帝国主义威胁的担忧。

与自己的一些同事不同，他不预见会与中国发生战争。尽管如此，他还是指出，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军事力量敌不过美国。他批评了那些认为中国行将统治世界的北京观察家们。
(JONATHAN MIRSKY)

高原机场成中印边防会晤点

• 新德里电视台网站 / 2015.08.01

→ 印度和中国军方指挥官8月1日在世界海拔最高机场跑道之一、拉达克的斗拉特别奥里地机场跑道举行了会晤，使之成为第5个边防会晤点。一名国防部发言人说，今天标志着印中边界军队关系一座里程碑，因为这是人民解放军首次在该地区接待印军代表团。他说，中方军队十分积极组织在每年建军节当日举行边界人

员会晤。“上述活动反映出双方希望从实际层面维护、改善边界关系。”

中方还安排了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文艺节目为会晤助兴。上述发言人说，两国代表团的互动氛围轻松自由、愉快友好。“会谈在友好的气氛中结束，双方承诺加强现有友好关系、维护实际控制线沿线地区和平。”

一名高级军官对新德里电视

台记者说：“两国军方的边境会晤至关重要。其作用是解决无意间越境巡逻等地方事务和防止冲突加剧。”

斗拉特别奥里地位于拉达克北部，海拔1.6万英尺（约合4877米），可以俯瞰喀喇昆仑山口——列城和中国新疆之间古老的贸易通道。斗拉特别奥里地是过去一年里启用的第二个边防会晤点。今年5月，位于中国藏南地区（印度称阿鲁纳恰尔邦）最东端的安杰区的基比图开放了一个边防会晤点。

在这两个新会晤点启用之

前，3488公里印中实际控制线上只有3个会晤点，分别是拉达克东部的斯邦古尔山口附近的棒拉山口和锡金邦东北部的乃堆拉山口。增加边防会晤点是缓解印中边界紧张关系新政府倡议的内容之一，加强军方接触以解决地方事务对于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这也是印度总理莫迪改善与中国关系总体战略的内容之一。

去年，印中两国军队曾在拉达克东部地区久马尔陷入长达数周的对峙僵局。通过双方达成互谅、撤军和重新部署边界军队恢复“原状”，僵局才得以缓解。

中国将限制无人机出口

• 《南华早报》网站 / 2015.08.02

→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中国将从8月中旬起对部分无人驾驶航空飞行器（即无人机）实施出口管制。业内人士表示，此举旨在对军用无人机、而非民用无人机进行出口管制。

商务部和海关总署7月31日发表联合公告，要求有意出口无人机的制造商及早申请办理出口许可证。公告称，本次出台的管制措施将适用于可以在阵风条件下飞行或者最大续航时间大于等于1小时的无人机，以及设计或改型后用于在15420米以上高空飞行的无人机的吸气活塞式或转子式内燃发动机。但将于8月15日生效的管制规定没有提及所限制出口的无人机的体积。

为了获得出口批准，国内无人机制造商将必须向相关主管部门提供无人机的技术说明以及最终用户证明和最终用途说明等文件。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国产

军用无人机——包括“彩虹”-3、“彩虹”-4和“翼龙”无人机在内的，或将出口巴基斯坦等国。“翼龙”的最高飞行高度可达5000米以上，最大续航时间为20小时，最大任务载荷重量为200公斤。与此同时，中方声称“彩虹”-4要比美国生产的MQ-1“捕食者”无人机先进。报道称，中国当局没有详细说明其国家安全担忧是什么，但出口管制似乎旨在保护关键技术，并确保它们不会落入坏人之手。

中国媒体援引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邵建伙的话说：“禁令针对的是并非设计为民用的无人机，它将保护中国公司的关键技术。”他说：“这对业界而言是一个意外的决定，但从国家安全以及产业健康发展的角度来讲，是有道理的。”

大疆公司目前占据全球民用无人机市场约70%的份额。一些权威人士对该公司的估值达100亿美元，它现在已经跻身世界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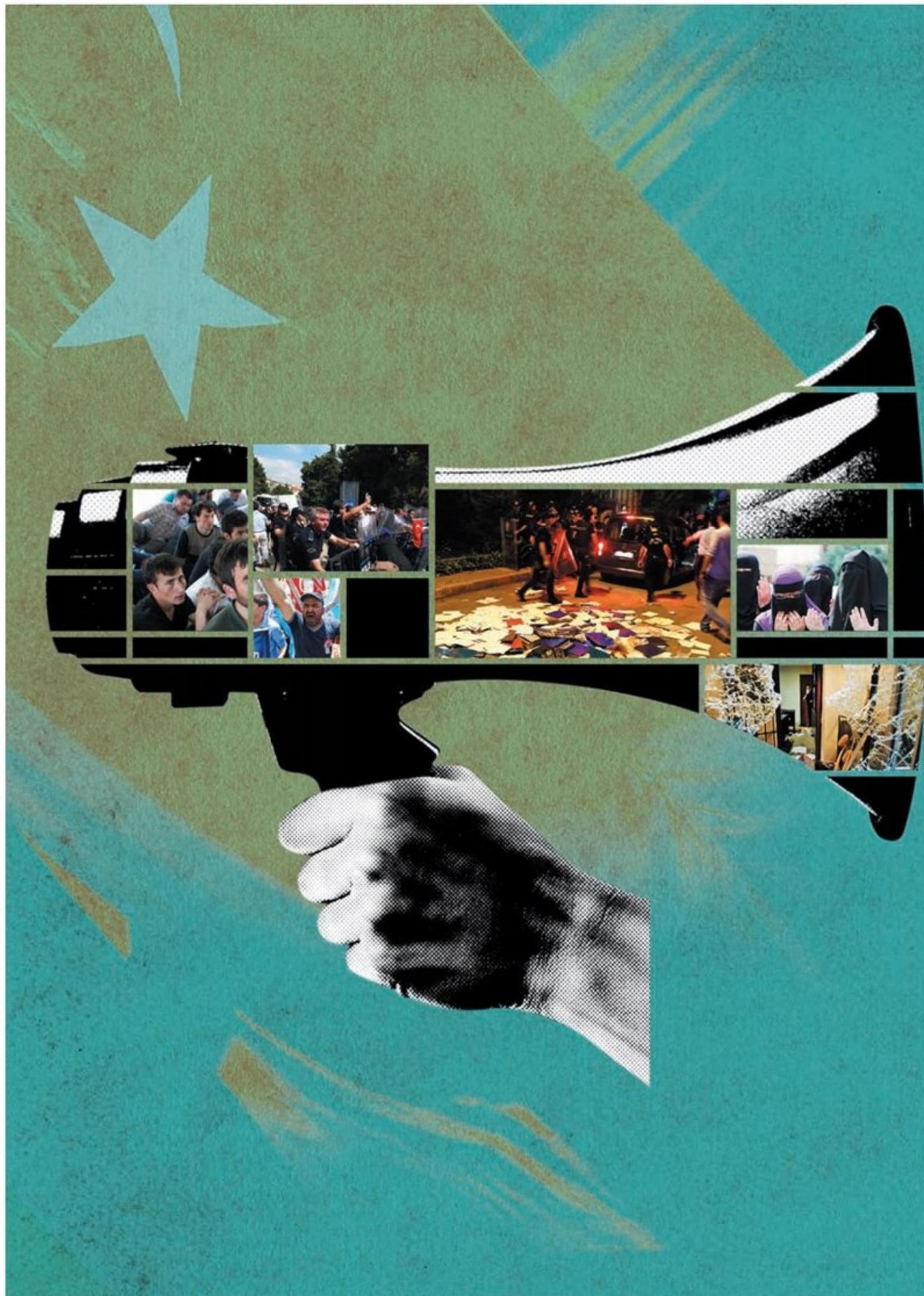
有价值的初创公司之列。2013年11月，中国首架喷气式隐身无人机——即“利剑”无人机首飞成功，从而成为英国、法国和美国以外第四个拥有该技术的国家。

军事专家说，无人机可以帮助中国加强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上的情报收集能力。北京目前与亚洲邻国在那两片水域存在紧张的领土争端。这次管制是中国继6月后第二次对高端无人机实施出口管制。从7月1日起，中国制造的航程大于等于300公里或具备容量20升以上的气雾剂布撒装置的无人机同样受到限制，它

们需要经过许可才能出口。

世界上大多数商用无人机都是深圳市生产的。从1月至5月，深圳的生产商向海外出口了16万架此类无人机，总价值7.5亿元人民币。媒体报道说，出口量同比增加了68倍。大疆公司在对照新标准后对媒体说，大疆的产品不在禁止范围内。但像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这样的军用无人机制造商将无疑成为管制对象。一些中国无人机制造商说，它们已经为规则改变做好了准备，因为许多国家都开始出台类似的管制规定。

□ 编辑 漆菲 □ 美编 青年



谎言与冲动 土耳其 7月排华始末

记者/吴如加 实习生/赵乾

“不”要把东西卖给中国人！”

有人扯着嗓子喊出了这样一句话。在伊斯坦布尔原本就嘈杂的集市上，竟也显得突兀。那是个卖桃子的年轻小伙子，他仍然在喊：“他们杀死了我们的同胞。”

苏阳一脸错愕，继而感到愤怒，她走到那堆桃子前，“你说什么？”

“你是中国人吗？”对方反问。

一阵恐惧袭来。

“是。”她回答。

这是苏阳在土耳其的第8个年头。她在集市遭遇质问的前一天，还发生了另一件事。那是6月30日的下午，下班后的苏阳在地铁上遇到了一位老太太。苏阳注意到她裹着彩色的头巾，而不是象征保守的黑色。她下意识地起身让座，老太太坐下后，看了她一眼道：“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中国人。”

老太太突然站起来，走向一旁不再理她。或许是心理作用，苏阳感到周边人群冰冷的目光，而那位老太太反倒像个不食嗟来之食的英雄。

车厢里的苏阳不知道，这一天清晨，经过土耳其与泰国政府连续数月的外交谈判之后，173名因偷渡而被拘押在泰国的维吾尔人抵达伊斯坦布尔国际机场，其中大部分为妇女和儿童。一场更大的风波随即将至。

在土耳其，许多民族主义者持有一种泛突厥身份认同，他们认为横

跨广大中亚地区、说着突厥语的不同民族间存在共同的起源。而伊斯兰教的信仰使得土耳其人格外关注他国穆斯林的生存现状。

这里没有肉卖给中国人

13岁就在伊斯坦布尔定居的苏阳，第一次因为中国人的身份而感到不安，是在2009年的“7·5”事件之后。当时周边的人总会问她，“你看报纸了吗？你看新闻了吗？”她感到争论可能带来的危险，主动减少和当地人的接触。

此后，对于每年7月5日前后的游行，她早已习惯。“之前都只是简单的活动，他们会在广场上摆一些东西，有时请一些学生过来。”而多数土耳其民众对此反应并不大。但今年“很诡异，好像提前商量好了”。苏阳注意到，在社交网站Facebook和Twitter上，许多注册多年却不发一语的账号突然活跃起来，还发布了许多关于新疆的虚假消息和图片。土耳其的电视媒体也在6月29日的晚间新闻上，播放了一则关于“7·5”事件的简短回顾。

刘丽是另一位注意到网络谣言的中国人。“我平时不太用Facebook，一开始看到并没有在意。”直到大量虚假新闻图片在网络上频繁出现，她才意识到今日不同往时。

“后来，一些原本了解中国、学历很高的土耳其人，也开始问我这些事情。”

当地的华人圈子里，也出现越来越多中国人遭到冷遇的传言。最近的一个故事是，一个中国人去肉店买肉，肉都装好了，老板突然问她从哪里来，待她回答后老板却说：“这里没有肉卖给中国人。”

自6月18日进入斋月后，关于新疆地区禁止穆斯林“封斋”的传言在土耳其的网络上蔓延。“这并非新的流言，”据刘丽说，每

年这段时间都会出现。新疆官方曾多次表态，对信教民众在斋月期间的封斋、聚礼、吃斋饭等活动不干涉，但基于中国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原则，公务员、教师、学生群体在实际操作中并不属此列。因此，这一敏感话题得以被夸大，并在土耳其被一再炒作，继而成为这场风波的直接导火索。

173名维吾尔偷渡者的抵达则是另一个引爆点。

据刘丽所述，“土耳其很多中老年人不用Facebook，但会看电视。当看到一群人在泰国滞留了许久后，终于来到土耳其，小孩在电视上天真烂漫地笑，维吾尔女人喜极而泣，加上社交媒体的渲染，如果我不了解情况，不知道他们是维吾尔人的话，也会觉得他们终于‘解放’了。（土耳其人）觉得电视都播出来了，怎么会是假的呢？”

在此背景之下，“中国政府迫害新疆穆斯林”之类的言论在土耳其越传越广。与此同时，社交网站上组织游行的帖子下面也不乏响应者，“具体在哪儿集合，什么路线，怎么联系，一应俱全。哪怕你在其他国家，也有联系邮箱。很有计划和规模的”。刘丽告诉《凤凰周刊》。

6月29日，一个名为“图兰主义者运动联盟”的组织在伊斯坦布尔打砸了一家中餐馆，示威者打出了“独立的东突厥斯坦万岁”旗帜，并且声称此举主要是为了抗议中国政府“禁止穆斯林封斋和打压维吾尔族人的宗教权利。”

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报道，这家名叫“Happy China”的中国餐厅，其经营者实际上是一位土耳其穆斯林，大厨则是维吾尔人。这位倒霉的店主抱怨道：“我们甚至都不提供酒精饮料。”

“我并不认同在中国西北发生的事情，也很同情维吾尔人。但是我知道，（示威者





↑ 2015年7月9日，在土耳其的维吾尔族妇女。

2015年7月9日，安卡拉，土耳其警方使用催泪瓦斯驱散在中国大使馆前抗议中国的人群。据报道，在安卡拉中国大使馆前抗议的大约有100人，在抗议人士推倒路障后，土耳其警察发射了催泪瓦斯。

的)大多数指控不过是谣言。”店主说，除了关掉餐厅，他别无选择。“我把仅有的一点积蓄都花在了这里，只是勉强收支平衡，现在这一切都完了。说实话，卷入这些政治纠纷中，让我很沮丧。”

接下来几天，一些景点附近能陆陆续续看到零散的小型集会，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7月4日。

这一天，中国游客李曼刚刚结束了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游览，正要离开时，听见外面排山倒海的口号声。她隔着教堂的围墙向外望去，只见苏丹阿合麦特广场上已挤满了人，目力所及之处，飘满了据称象征“东突”的蓝底星月旗。

几排手持盾牌的防暴警察在教堂前严阵以待，成了李曼和示威者们之间的唯一屏障。保安将教堂内的中国游客拦下。“如果是日本人就放出去，要是中国人，就先等一下。”然后，在保安的引导下，中国游客们一小拨一小拨地，从教堂后门的第一个出口疏散。“出去之前保安都要先看一下(外面)”。

与此同时，在广场另一头的托普卡帕皇宫，一群韩国游客被误认为是中国人，遭到了部分示威者的袭扰，最后警方发射了催泪弹。一位惊魂未定的韩国女游客用英语对着媒体的镜头说：“我不是中国人，我是韩国人！”

这场乌龙最后还引发了土耳其示威者之间的肢体冲突。“当时我们百思不得其解，说好的反华呢，怎么自己打起来了。”刘丽从一位在皇宫附近做导游的土耳其朋友处了解到，当时韩国团中的女游客一度被吓得尖叫，“示威人群里面有一些人说别打，但是有一些暴力分子冲上去要打。结果他们自己打起来了。”

这一周，每天都有人聚集在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门前抗议，抗议者热衷于在使馆门口的道路上吃“开斋饭”，一坐就到凌





晨。据驻土耳其的一位中国记者描述，7月5日，抗议活动达到高潮，使馆外围聚集了近千名抗议者，土耳其警方则派出了约200名警察维持秩序。

而在土耳其各地，不少示威者烧毁了中国国旗和毛泽东的画像。虽然毛泽东去世近40年，但他却是极少数土耳其人能认识的中国领导人。

请不要相信挑衅者

7月4日的游行视频被上传网络后，游行中出现的混乱和暴力，令一些土耳其人感到无地自容。**土耳其的一份漫画杂志**则在封面刊登了一幅漫画，一群手持棍棒的人冲向埃及金字塔，高喊着：“进攻！拆掉中国的长城。”在另一幅漫画中，两个暴徒正在殴打一个黑人，黑人说：“兄弟，我不是中国人。”其中一个打人者回答：“不要紧，反正我既不是抗议者，也不是人。”

“新闻播出来后，很多人觉得游行的人很傻。第二天去的人就少多了。”刘丽说，“他们内部也有分歧，一些人相信维吾尔人被迫害，一些人则觉得是被美国和以色列利用了。”

7月5日，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发布安全提示，提醒在土中国游客注意安全，特别是不要接近或拍摄游行队伍，并减少单独外出活动。

但是，这场风波并没有结束。7月8日晚，从泰国移民局传来了100余名维吾尔族偷渡者被遣返回中国的消息，导致泰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受到了激进民族主义者的冲击。愤怒的示威者们在发表了一份声明后，闯入了总领事馆大楼，打碎窗户并降下泰国国旗。领事馆铭牌被摘，文件散落一地。此后，泰国政府下令暂时关闭其驻土耳其安卡拉大使馆与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泰国使馆还建议泰国人在土耳其的公共场所不要展

示国旗和国家标志，避免去抗议者聚集的地方，更回避和当地人谈论维吾尔人问题。

对于国内发生的一系列风波，土耳其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泰国政府将维吾尔人遣返中国的决定，同时对泰国领馆的遭遇表示遗憾。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则在次日晚上明确表态说：“我想指出的是，那些照片很多都是夸张和虚假的。我们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同种同源的兄弟姐妹，我们很关心他们的境遇。虚假报道导致的抗议游行中发生了袭击来访的东亚客人的事情，我们对此表示强烈反对，我呼吁全体同胞不要被某些恶意的挑衅所愚弄。”

土耳其驻上海总领事馆微博亦发布埃尔多安的声明称：“来我国旅游的和居住的东亚国人民是我们的朋友。他们也是我们的客人。在伊斯坦布尔发生的挑衅事件不符合我们的形象。请不要相信挑衅者，来我

2015年7月8日晚，由于泰国将100多名维吾尔人遣送回中国，泰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遭到攻击，使馆的文件被示威者撒在街上。示威者砸碎了泰国领事馆的窗户，并且洗劫了部分建筑。



国的人们是托付于我们照顾的。”

据悉，在7月4日游行中误将韩国游客当作中国人攻击的示威者，来自右翼**民族行动党**附属青年激进组织——“灰狼”。该党在近期的议会选举中获得81个席位，成为议会第三大党。

2014年土耳其经济出现衰退，当下全国失业率超过10%，年化通胀率超过8%。大量失业的年轻人则成为右翼激进团体的主要构成。而他们大多只能看懂土耳其语新闻，对于社交网络上的虚假新闻和图片缺乏辨别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激进组织“灰狼”的眼中，游行中出现的暴力行径亦非光彩之事。据BBC报道，在伊斯坦布尔的“灰狼”领袖伊尔迪里姆否认该团体曾袭扰韩国游客，他声称是警察与游行群众发生冲突，没有接到任何抱怨投诉，并且同时表示：“保证每个来到我国游客的人身安全是我

们的责任，我们不会容忍任何暴力行为。”

相较之下，民族行动党主席巴赫切利的表态则颇为失礼。他在谈及其党派下的激进青年组织误伤韩国游客时表示，“很难区分清楚中国人和韩国人，他们都长着狭长的眼睛。”

此番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言论，引发舆论哗然。土耳其《每日新闻》专栏作家吉拉·本玛约尔表示，韩国有关方面已经表示，将对巴赫切利的言论进行上诉。

新疆问题成土政党斗争砝码

土耳其国内的政治变化亦是此番反华风波的一大背景。今年6月7日，土耳其第25届国民议会选举落幕，**正义与发展党**执政13年来首次失去单一组阁权，因此需要与其他党派进行联合组阁的磋商。游行发生时，土耳其国内正处于临时政府状态。而在这次选举中，民族行动党在大选中获得了13%的选票，成为第三大党，声势日盛。因而如何组阁显得十分关键，除了各个政党领导人彼此私下交易谋划之外，充分利用社会舆论也成为造势的关键。

由于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有广大拥趸，埃尔多安的正义发展党及巴赫切利的民族行动党，均在维吾尔人问题上争相表态，以期获取更多支持。

今年6月27日，巴赫切利在其Twitter上对埃尔多安率先发难，“从Nişantaşı（伊斯坦布尔的时尚街区）到Yüksekova（土耳其边境城市），每个人都只关心发生在科巴尼（叙利亚边境小镇，库尔德武装和‘伊斯兰国’在此激战）的事情，却没有人为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暴行发声，甚至提都不提。”

埃尔多安则在一次开斋晚宴上表态，“土耳其的大门永远对维吾尔人敞开”，并且针对巴赫切利的指责反唇相讥道：“有

两泛主义

指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

两者均滥觞于19世纪后半期。“泛伊斯兰主义”源于阿富汗，首倡者为哲马鲁丁·阿富汗尼。他宣扬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民族应该联合起来，抵御基督教国家的进攻，建立政教合一的“大伊斯兰帝国”。奥斯曼帝国统治者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有意借其恢复专制统治，扩大在穆斯林地区的影响，曾加以大力鼓吹。

“泛突厥主义”源于沙俄统治下的克里米亚半岛，创始人为鞑靼人伊斯马伊勒·加斯普林斯基。他主张生活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至阿尔泰山脉之间所有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联为一体，组成一个“大突厥帝国”。20世纪初期在土耳其执政的土耳其青年党曾将其奉为圭臬，试图建立一个土耳其苏丹为首的奥斯曼大帝国。土耳其人艾买提·卡马尔和从土耳其留学归来的麦斯武德为这两种思潮的代表。30年代初期，麦斯武德、伊敏等在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基础上，逐渐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政治纲领，并发起了东突厥斯坦运动。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AKP）

土耳其执政党，为中间偏右的保守派政党。2001年，埃尔多安创建了正发党并任主席。2003年3月，他出任土耳其政府总理。此后，正发党又赢得2007年和2011年大选，埃尔多安连任总理。2014年，埃尔多安在首次总统直选中获胜，成为土耳其第12届总统。该党内外政策较为温和、务实，政策主张与世俗政党日趋相同，得到了军方和世俗势力的认可。

土耳其民族行动党（MHP）

土耳其第二大反对党。1965年8月土著名极右政治家阿尔帕斯朗·图尔凯希加入该党，1969年大选前，图尔凯希将其进行了改造并更名为民族行动党。1973年大选中民族行动党获得议会3个席位，图尔凯希在内阁任副总理。现任党首是德夫莱特·巴赫切利。此次示威活动参与者主要来自右翼组织“灰狼”，该组织就属于民族行动党。该党在今年6月选举中夺取81席晋升议会第三大党，终结了正发党13年单独执政格局。

人说‘你们只关心阿拉伯人，只关心科巴尼和塔尔艾卜耶德（叙利亚地区），却忘记了维吾尔人’，我想请问这个人：‘你可曾亲身探访过维吾尔人居住的土地？’你没有。而我，埃尔多安去过。”埃尔多安2012年访华的第一站便是乌鲁木齐，他亦因此成为首位探访新疆的土耳其总理。

埃尔多安还为其执政期间收留过寻求庇护的大量维吾尔人而自豪，并反问巴赫切利：“在担任副总理期间，你接收了多少维吾尔人并给予他们公民身份？”

当政客们打嘴仗的时候，土耳其则出现了对此次反华游行后续影响的担忧。据土耳其《今日时代》报道，恶化的关系已经开始影响双方之间的经济联系，已有几家中国企业冻结了他们在土耳其的投资项目。游行之后，一些从事矿石生意的企业和商人，推迟了他们在土耳其的项目进度或考察计划。

“我们应该尊重常识，用民主的方式表达抗议。”伊斯坦布尔矿石出口商会会长卡赫亚奥卢（Ali Kahyaoğlu）说，中国是土耳其石材最大的出口市场，因此至关重要。而目前，土耳其对中国的石材出口正面临着

断崖式下滑。

土耳其的旅游业则面临着更为直接的冲击。在土耳其卡迪尔哈斯大学从事东亚研究的经济学家阿克米克（Ali Akkemik）说，“中国对土耳其在维吾尔问题上的干预感到担忧，近期发生的事将对两国关系产生影响，中国游客将会减少。”

当下，土耳其的旅游业正面临着巨大挑战。俄罗斯游客曾经是土耳其旅游业的一大支柱，从2010年开始，赴土旅游的俄国人数量连年增长，2014年达到440万人次。但是随着卢布的大幅贬值，据土耳其一家旅游机构的负责人表示，今年前四个月，俄罗斯游客数量减少了40%。

因此，吸引中国游客成了土耳其旅游业当前的重要目标。虽然土耳其旅游局表示，目前当地的游行已基本受到控制，同时土方也将加强对当地旅游景点的护卫以及对游行人员的安保力度，但是此次发生的排华行动势必会对中国游客心理产生消极影响。

他们不知道新疆还有别的民族

在刘丽的印象中，土耳其人一向热情、友善。

“他们对亚洲人很好奇，在伊斯坦布尔的美国人很多，但中国人很少，看到你的面孔他们就很好奇，就把自己知道的关于中国的事情都如数家珍地和你说。有一些关于中国的不了解的情况，他们也会很友善地问。”所以，当刘丽在网上看到一些煽动性、侮辱性的言论时，感到很诧异。

于是刘丽找来一些华人朋友，希望对网上的假新闻做一些辟谣工作。“只要我们看到有人发假的图片，就会把真的信息发给他，解释具体情况到底是什么。”刘丽说，

“一般人看到澄清会删掉原来转的谣言，但也有人会把我们的留言删掉，接着煽动。”

她也曾试图与身边的维吾尔朋友谈论关于新疆的问题，并希望他们的聊天记录可以作为证据展示出来。但出乎预料，她的维吾尔朋友并不希望谈论这个话题。“有的支支吾吾说，别谈这个东西了，反正我们是好朋友。”

有一位土耳其朋友甚至反问她：“维吾尔人居住的地方在中国叫什么？”“我说叫新疆啊，他说那新疆的中文是什么意思呢？我说意思就是新的领土啊，讲完之后，我就发现这是个陷阱。”

土耳其网络上关于新疆的不实传言

这三张图片在土耳其社交网络上广为流传，被用于说明维吾尔人在中国遭受迫害。

然而，第一张图片是摄于广西省南宁市体育馆业余体校，一名教练站在女孩的腿上，帮助她拉筋。

第二张图片同样来源于中国网络，关于图片中的具体事件有不同版本的流言，譬如，西安一女子当街晕倒。也有其他人使用过这张图片，文字说明却是：停止杀害缅甸穆斯林。

第三张图片是菲律宾的一位母亲虐待孩子的视频，视频中，她用绳子拴住孩子，拖着孩子在地上爬。她甚至用小盘装着狗粮给孩子吃。该视频曾在网络上引起公愤。



于是，刘丽开始查阅有关新疆的一切历史资料。“我想用土语解释的时候，会涉及到很多历史问题，但有时很难解释清楚。”她无奈承认，“尤其当有些人编了另外一套说法，在这个问题上反驳比较难。”

赛乃西·司马义是土耳其-中国丝绸之路经济贸易、文化艺术合作协会会长，在他看来，土耳其人很文明，比较简单，有正义感。“但是土耳其人不知道维吾尔的真相。他们看到这个东西以后，民族情绪就起来了，认为在人权角度欺负了维吾尔族，自己的兄弟民族。”

司马义向《凤凰周刊》记者指出，此次反华游行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在土耳其比这个大的游行很多。但是按照中国的思维来看，不理解嘛。这次没有死人，也没伤人，只是一个餐馆被砸了，一个韩国人被打了一下，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也比美国、法国的一些所谓反华游行人数少得多。只是一些媒体把它扩大了，但越炒作其实对两个国家越不利。”

“以前土耳其人民支持车臣人，出于伊斯兰教感情，成千上万的土耳其人在游行时烧毁俄罗斯国旗。但车臣人呢，并不支持土耳其人，而在支持叙利亚人，现在土耳其人也看清

由于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有广大拥趸，埃尔多安的正义发展党及巴赫切利的民族行动党，均在维吾尔人问题上争相表态，以期获取更多支持。

了真相。过上一两年之后，土耳其人也会看清这个真相，这些都是暂时的。”司马义说。

维吾尔人医生阿里木则说：“在土耳其生活的汉人，他们看到（网上的谣言），也会去争论。一些谣言一开始传播了，过一段时间，真相出来，大家就知道原来是这样的。这里一出事就有人游行，警察也不会马上制止。折腾几天就安静了。”

阿里木在土耳其的生活中，常常能感受到身边的朋友对中国充满好奇，却知之甚少。“他们会问你，那边（中国）有清真食品么？穆斯林能不能祷告？”

一位生活在土耳其的新疆汉族人告诉记者，“土耳其人对维吾尔人非常热情，觉得是兄弟。他们问我哪儿人，我说是新疆的，他们就说你是我们的兄弟。他们不知道

新疆还有其他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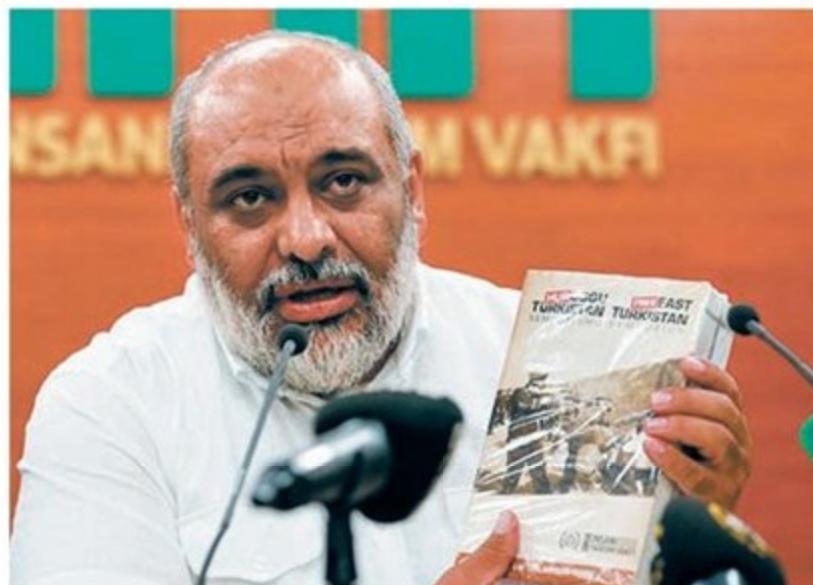
土耳其马尔马拉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乔达西(Çağdaş Üngör)在接受《今日时代》采访时指出，实地探访过新疆的土耳其记者和专家并不多，因此维吾尔人议题极容易被媒体所操纵。她还强调，“土耳其在新疆议题上的舆论生态很大程度上是由维吾尔人流亡团体所塑造的，因此带有偏见。”

土耳其慈善组织“人道主义救援基金会”(IHH)一直对新疆的维吾尔人“关爱有加”。在7月8日召开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其会长尤迪伦(Bulent Yildirim)向公众推荐该基金会撰写的一份报告，主题是关于新疆维吾尔人遭遇的迫害。他还建议埃尔多安在7月28日的访华行程中，多去乌鲁木齐以外的新疆地区走走。然而，这本声称维吾尔人遭受迫害的报告封面所使用的却是一张1995年大陆严打期间枪决犯人的照片。截至《凤凰周刊》发稿时，这次发布会的新闻仍然挂在IHH的官网首页上。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主义者、宗教主义者或极端主义者。土耳其一共有7000万人，里面有200人做这些（指游行中的过激行为），他们不代表土耳其，甚至不代表民族行动党。”针对近来的反华风波，在北京大学读博士的土耳其人乌穆特如是说。

乌穆特曾在托普卡帕宫（即此次游行中韩国游客被袭地点）听音乐会，旁边有人卖酒，于是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喝酒。结果有人因此来到皇宫门口示威。“这些极端的人不仅仅针对西方人、中国人，也针对自己国家的人。他们示威只是因为我们在托普卡帕宫里面喝酒。”乌穆特说，“这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你可以表达自己想法，但应是和平的。”

（苏阳、刘丽、李曼、阿里木为化名，李叙对本文亦有贡献）



2015年7月8日，“人道主义救援基金会”(IHH)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其会长尤迪伦向公众推荐该基金会撰写的一份报告，主题是关于新疆维吾尔人遭遇的“迫害”。但这本报告封面所使用的却是一张1995年大陆严打期间的照片，与新疆毫无关联。

土耳其的中国人江湖

土耳其存在着各种维吾尔人团体和组织，或世俗或宗教保守，彼此之间亦存在分歧与斗争。一些团体主张“圣战”解放“东突厥斯坦”，一些团体则避免公开支持暴力或恐怖主义。

记者/吴如加

土耳其中部城市开塞利。在西方媒体的镜头下，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幼童站在一堆捐赠的杂乱衣物中，口中含着奶嘴，不知该将目光望向哪里。

在开塞利一处曾被土耳其财政部使用过的建筑群内，住着约1000名维吾尔人，由土耳其警方把守。住在里面的不少人都表示，他们向“蛇头”支付了数千美元，经历了艰苦旅程，离开中国，终点是土耳其。

这趟冒险的旅程并不顺利，他们在偷渡过程中被第三国扣押，后由土耳其政府出面接回。“从去年年底到现在，断断续续一千来人吧，经过各个途径，主要是泰国，还有一部分从马来西亚（接回的），几乎都安置在开塞利。”长期做贸易生意的维吾

尔人热合买提说。这是他在土耳其生活的第10个年头。与上述同胞不同，他并非偷渡者，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

这处建筑群由大约10座5层楼房组成，维吾尔人的公寓也分布其中，因为缺少家具而显得异常宽敞。其中一间公寓被辟作男孩子的古兰经学校。一红一蓝两面巨大的星月旗悬挂在两座楼之间，红色那面是土耳其国旗，蓝色那面旗帜则被维吾尔流亡者们看作是“东突厥斯坦”的象征。

他们带着对保守教义的虔诚和对穆斯林国家的憧憬踏上了偷渡之路，却往往在到达之后发现，土耳其远比他们所想象的要更世俗。而由于偷渡问题的敏感性，他们的存在也为中土关系添加了更多不确定性。

营生方式多元

他们并不是开塞利的第一批维吾尔流亡者。早在中共建政之前，就有包括“东突”领导人在内的维吾尔人流亡土耳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被集中安置在开塞利。1952年，又有1800多名维吾尔人移居土耳其，同样被安置于此。早期在开塞利的流亡者至少经过了两代人，其中一些穷其一生也未到过新疆，甚至不会说维吾尔语。

2011年，在中土建交四十周年之际，土耳其驻华大使埃森利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大约有30万维吾尔人（包括其后裔）生活在土耳其。但中国官方并未给出过明确数字，媒体报道中最常见的是10万维吾尔人，多数是二、三代移民，而土总人口为



2015年7月16日，伊斯坦布尔，从中国偷渡来的维吾尔族人正在等待接受媒体采访。他们带着对保守教义的虔诚和对穆斯林国家的憧憬踏上了偷渡之路，却往往在到达之后发现，土耳其远比他们所想象的要更世俗。

2015年2月11日，土耳其中部城市开塞利，一处曾被土耳其财政部使用过的建筑群内住着约1000名维吾尔人，由土耳其警方把守。有外电报道称，自去年以来，有一千多维吾尔人从中国偷渡来到土耳其。一红一蓝两面巨大的星月旗悬挂在两座楼之间，红色是土耳其国旗，蓝色那面则被看作是“东突厥斯坦”的象征。

右图为在这个封闭营地的日常生活——男孩正在读古兰经，午饭时刻，以及正在做祷告的人。



7000多万。

走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如果打开手机上中国大陆流行的社交软件——陌陌，可以看见附近清一色是有着深深轮廓的维吾尔面孔，许多人的签名栏里写着：中土翻译、导游、办居留证，显现了多元化的营生方式。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赴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多以经商、开杂货店为主，其中不少人积累了一定财富。中共建政后赴土耳其的维吾尔人，有的从事中土之间的服装、丝绸、瓷器和中药贸易，有的开设中餐馆和中医针灸诊所。改革开放，尤其是90年代后，又有一定数量的维吾尔人以探亲、朝觐身份到达土耳其后，经亲友担保而留下，多经营中医诊所、旅行社、餐馆，或在跨国公司供职。

建国后过去的人分成北疆和南疆两派，据热合买提介绍，北疆人接触汉语环境较多，从事的一般都是和中国有关的工作，比如经商，或是翻译。现在华为、中国水电建，还有一些大的企业，都有长驻土耳其这边的维吾尔员工。华为招聘很多会汉语和土耳其语的维吾尔人，欧普手机想开拓土耳其市场，也招维吾尔人；相比来说，南疆来的如果不懂汉语，大部分在伊斯坦布尔的商业区做些小买卖，从事零售、批发行业。“喀什、和田地区的人最多，都从国内温州、义乌进口小商品，做批发生意。”

除了维吾尔人外，也有不少哈萨克人在土耳其生活、工作，他们中许多人从事皮衣和塑料制品的加工和销售，生活较为宽裕。

相较而言，在土耳其的汉族人则要少得多，他们多是国内大企业派驻此地的员工，如华为、中电光伏、中车、新希望等。也有一些自费来此的汉族留学生，以及开饭店、从事旅游业的私企老板。其中，做石材出口贸易的汉族商人数量不少。“中国进口的大理石52%是土耳其的”，研究中土经贸

关系的北京大学土耳其学者乌穆特·艾尔古苏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大部分华人在土耳其安居乐业，总体生活水平尚可。在现实生活中，不同民族的华人之间常有往来。一位在土耳其经营石材生意的中国商人表示，在石材贸易中，维吾尔人就经常在土耳其人和汉人之间，扮演翻译或牵线人的角色。

“在土耳其的批发市场，你可以看到汉人的店和维吾尔人的店挨在一起，一起聊天，一起喝茶，一起换货。但一谈到政治问题上，就很快翻脸了，这种事情很常见。”热合买提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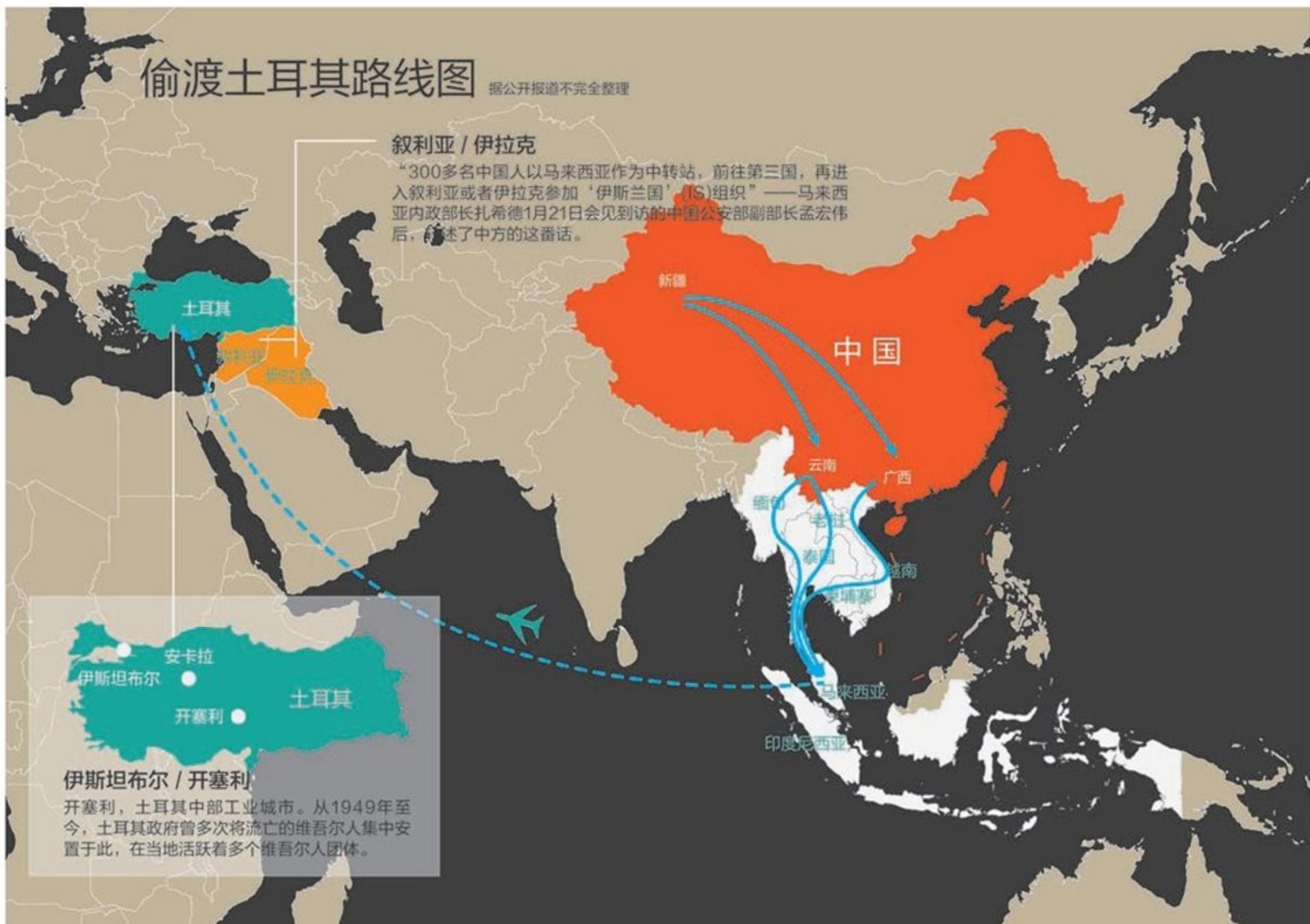
遥远的影响力

“作为穆斯林，都会向往穆斯林国家。”维吾尔族外科医生阿里木，出生在乌鲁木齐，来土耳其一年多了。“来之前觉得（土耳其）很华丽，新疆有很多土耳其产品，



土耳其不少人称中国新疆地区为“东突厥斯坦”，许多人甚至只知有“东突厥斯坦”而不知有新疆。





纺织品花花绿绿的，特别好看。”阿里木说，“人会想生活在适合自己的环境，包括饮食、文化和信仰。所以那时觉得伊斯坦布尔是最好的。”

生活在喀什的苏莱曼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街上出售盗版光盘的店铺，已被土耳其电影和电视剧占领了。苏莱曼对于这些影视作品并不感冒，“水平不太高”，喜欢好莱坞电影的他这样评价。但他无法否认，这些影视作品对新疆多数维吾尔人的影响巨大。

“近十年来，土耳其文化对新疆的影响非常大。很多维吾尔人在家里看的都是土耳其的电影和电视剧，他们觉得土耳其的生活比较好。”由于同属突厥语民族，维吾

尔人在文化上对土耳其容易形成虚幻的归属感。加上土耳其语与维吾尔语非常接近，

“60%能听懂，学3个月之后就能听懂90%以上了。”苏莱曼说。

通过私自架设卫星电视，以及购买盗版光盘的方式，许多维吾尔人潜移默化地感受着他们心中的土耳其。“汉族看韩剧是一种时尚，维吾尔人看土耳其电影、电视剧，会觉得更亲近，文化上更容易接受。”阿里木说。

热合买提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土耳其是许多维吾尔人所谓的“promised land (应许之地)”。马来西亚也不错，但语言障碍太大。在土耳其，一个勤快点的维吾尔小孩，高中过去，学个3—4个月的强化班，就

可以通过高考，很多人分数还不错。”

美国《华尔街日报》曾采访过一些偷渡到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一位名叫穆罕默德的男子说，2002年世界杯期间他还在大学读书，当时中国队与土耳其队被分在同一小组，结果自己选择支持土耳其队，汉族学生感觉受到了冒犯，双方还为此打了一架。另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维吾尔男子则说：“我想念我的祖国，那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但我在土耳其很快乐。”

土耳其的“两泛”思潮

1923年，凯末尔建立土耳其共和国之后，展开了一系列世俗化改革，奠定了土耳其现代化的基础。此后的土耳其一直坚持



印度尼西亚-波索

2014年7月，3名维吾尔男子因持有伪造的土耳其护照，并在印度尼西亚意图加入伊斯兰极端组织，被当地法院判处6年监禁。

泰国-宋卡府

2014年3月，泰国警方突袭该国南部宋卡省的偏僻营地时，从人口走私犯手中救出了300多名疑似来自中国新疆的维吾尔人。泰国当局判定他们非法入境。2015年6月30日，土耳其政府接走173名因偷渡而被拘押在泰国的维吾尔人。7月9日，100余名维吾尔族偷渡者从泰国被遣返回中国。

越南-北风生

2014年4月18日，16名中国公民在中越边境入口处被扣押，当越方准备将这些中国偷渡者遣送回中国边境时，部分偷渡者抢夺了越方人员手中的AK-47步枪并射击。一名越南警察当场死亡，一人因为伤势严重死亡，另有4人伤势严重。越南守卫的办公室在枪战中被完全破坏。越南警方曾要求偷渡者们交出武器投降，包括女人携带的刀具，但是他们继续射击。最终，5名中国人在冲突中丧生，死者中有部分人是跳出窗户自杀身亡，其他人则是被越南警方射杀。

以世俗化为目标，防止宗教势力的干政。打上了凯末尔烙印的土耳其军方成了维护世俗化的坚定力量，甚至不惜为此多次发动政变。

居住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热合买提告诉记者，军方在世俗化原则上的坚守到了不近人情的程度。“有些学生会用阿拉伯语说Assalamu alaykum（愿真主赐予你平安），（军人）发现这种情况就让学生站住，说‘你必须用突厥语问好’。”

今日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曾因“反世俗罪”被判处4个月监禁，剥夺政治权利5年，他当时所在的政党也被取缔。

除了对抗泛伊斯兰思潮之外，军方在对待泛突厥主义方面也采取了压制态度。

凯末尔在世时，在国内建立“土耳其人国家”的身份认同。当时的土耳其是世界上唯一以突厥民族为主体的国家，泛突厥主义在外交上无法带来实际益处。

随着苏联解体，中亚和高加索的突厥语国家纷纷赢得独立，土耳其在当时的“突厥国家”中，无疑有着最强的国力和最完善的体制。一夜之间，土耳其从古老民族仅存的硕果，一跃而成新兴突厥世界的领袖。泛突厥主义也成了土耳其联系中亚、高加索国家，进行外交合纵的重要意识形态。

2000年，土耳其主管中亚经贸事务国务部长柴伊建议，土耳其应仿效阿拉伯联盟体系，与宗教、语言及习俗上渊源极深的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及吉尔吉斯斯坦等五国，建立一个突厥国家联盟。这一表态引起俄罗斯外交部的强烈抗议，称这是一项非友好的表示，与双方目前友好关系发展相抵触。

埃尔多安上台后，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弱军方力量。2010年土耳其公投通过新宪法，削弱军权和司法权。2011年，土耳其军方总参谋长以及陆海空三军司令被重新任命，奉行世俗化的军方遭到前所未有的压制。美国《时代》周刊曾如此评价埃尔多安：“他表面是个世俗派，骨子里是个伊斯兰保守派。他总是西装革履，也主张妇女在公共场合不要蒙面纱，但他的妻子不论什么时候都会用头巾严严实实地裹住自己的头发。”

土耳其不少人称中国新疆地区为“东突厥斯坦”，许多人甚至只知有“东突厥斯坦”而不知有新疆。

在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土耳其迅速走出之前经济持续低迷的状态，还实现了年均经济增长率7%的历史最高水平。这使得土耳其人自奥斯曼帝国衰

落后久违的大国意识得以觉醒，民族自豪感与日俱增。“土耳其觉得自己是突厥国家的老大，穆斯林的保护者。”乌穆特说。

随着埃尔多安个人权威的增长，土耳其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也出现回潮。一些激进组织对突厥语民族的国家或地区情况抱有极大关注，有成员参与车臣和科索沃战争，在“东突”组织的反华示威活动中也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政策制定上，土耳其政府也遵循突厥人和穆斯林优先的原则。突厥民族的移民相较于其他民族更容易获得土耳其国籍，据热合买提介绍，其他民族除非和土耳其人通婚，否则想入籍非常难。此外，土耳其还通过提供奖学金名额吸引突厥人才。“奖学金一般只给突厥语学生或是穆斯林地区的人，巴尔干地区只给科索沃、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或者塞尔维亚的学生，必须证明自己是穆斯林。”热合买提说，而汉族学生大多数都是自费留学。

外交层面上，“两泛”思潮也促使土耳其政府积极将手伸出国界，更多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在2010年第10届突厥语国家峰会上，时任土耳其总统居尔喊出了“六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口号。

埃尔多安不仅公开支持哈马斯并接见其领导人，还在2009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当众谴责以色列总统佩雷斯。他也坚定支持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谴责军方政变。在2011年叙利亚国内局势出现动荡后，土耳其不仅在外交上谴责阿萨德政府，甚至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并采取诸多行动支持叙利亚反对派。

土耳其的做法，引起相关国家的不满。以色列国防部长巴拉克曾谴责其为中东“穆斯林兄弟会轴心国”的领袖。此前土耳其对待“伊斯兰国”(IS)的暧昧态度，也遭



到国内外的广泛诟病。土耳其的反对党共和人民党曾指责埃尔多安纵容和包庇邻国的恐怖主义活动。

这种突厥人优先和倾向伊斯兰的外交政策，自然也影响到土耳其在维吾尔人问题上的立场。

偷渡者的变迁

据称，曾经有过偷渡到土耳其的汉人比维吾尔人更多的时期。作为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土耳其是这段漫长旅途的中转站。来自福建福清或浙江青田的中国人，在这里作短暂的停留，然后前往欧洲。

“那时的偷渡客大多是汉人，维吾尔人很少。”热合买提不愿透露是如何获知这些细节的，只是说，在偷渡环节上，中国人不分民族，曾经建立起分工明确、地域广泛的合作——负责管理、运输、看管，或者在

里面做翻译挣学费的，多是维吾尔人；在保加利亚、希腊接他们的是汉族人，也有些维族人跑去欧洲做“蛇头”。“一些温州人上世纪90年代初就到土耳其了，每当有偷渡客在边境被抓，就去赎人。这些人稍稍有点面子、后台，赎完人再卖给‘蛇头’”。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本世纪初。在一次抓捕中，土耳其警方在7个城市200多个地点同时行动，“土耳其人、汉族人、维吾尔人，只要是和偷渡相关的一锅端掉。”热合买提说，“自那之后，（偷渡）就比较少了，再加上中国大陆经济越来越好，想去欧洲的人少了。”

然而，近年来，东南亚各国多次扣押欲取道本国偷渡往土耳其的维吾尔人。许多偷渡者被扣押后往往自称是土耳其人，他们多经由中国西南边境偷渡，大部分经由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辗转来到土耳其。

中国西南边境形势与新疆截然不同。新疆与邻国的接壤地带，往往存在严寒、高山等严酷的自然环境，跨境通道非常有限，加之近年来边防管控的日趋严厉。许多偷渡者便将西南边境地区作为自己出境的理想通道。和先前的汉人偷渡者不同，土耳其是许多维吾尔偷渡者的终点站。而部分偷渡出境的维吾尔人甚至持有“土耳其护照”。

据英国BBC7月14日报道，3名维吾尔男子因持有伪造的土耳其护照，并在印度尼西亚意图加入伊斯兰极端组织，被当地法院判处6年监禁。在审讯中，他们先是声称自己是中国新疆的维吾尔人，后又改口称其来自土耳其，于是被当庭要求唱土耳其国歌，未果。

去年3月12日，泰国警方曾在该国南部，毗邻马来西亚的宋卡府扣押了213名偷渡者，

2014年3月15日，泰国南部宋卡府，来自中国的偷渡者被泰国移民局送到当地法院。此前泰国警方对位于南部山区的一处丛林营地进行突击搜查，拘捕了300多名有可能从中国偷渡的维吾尔族人，其中许多是妇女和儿童。

他们藏身于一个橡胶种植园。据报道，这些偷渡者有高加索人的体貌特征，女性都以头巾蒙住面部，只露出一双眼睛。这些人拒绝承认是中国公民，以避免被强制遣返。

偷渡之旅充满艰辛，“对‘蛇头’而言，维吾尔人意味着现钞。如果你是个越南人，他们收1000美元，但如果你是一个维吾尔人，价格就会上涨5倍，有时甚至10倍。”一名54岁的维吾尔偷渡者告诉路透社。

7月9日，中国警方从泰国遣返回国109名偷渡人员和组织偷渡团伙成员。几天来，在乌鲁木齐的留置场所内，多名偷渡人员向大陆媒体讲述了自己在境外恐怖组织的蛊惑和操纵下，变卖一切偷渡出境后沦为“蛇头”赚钱工具，继而一无所有、妻离子散的悲惨经历。

大陆警方的介绍称，这批从泰国遣返的偷渡人员与境外恐怖组织“东伊运”及国际反华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组织想通过各种手段将这批人运输到土耳其，再去叙利亚加入IS等恐怖组织，进行“圣战”。

维吾尔偷渡者逐渐成为中、土、泰三方在外交领域的一个敏感点，并演变出一场外交拉锯战。中方指称部分偷渡者试图前往叙利亚参加“圣战”，希望泰方按照国际惯例将这些人遣返回中国。土耳其则基于“民族和宗教感情”，对偷渡者抱以同情态度，希望为他们提供庇护。

去年11月28日，时任土耳其外交部长达武特奥卢曾就非法滞留泰国的400多名新疆人发表言论：“有泰国官员知会我们，该国发生人贩活动，涉及一些自称土耳其公民的人员。我在纽约和北京期间，分别提请泰国外长和中国外长关注此事，并告诉他们土耳其愿为这些人提供庇护。”

泰方在近期将200多名扣押的维吾

尔偷渡者分别遣返中国及土耳其，引来土耳其官方的谴责，并点燃了土耳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泰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因此受到冲击。联合国认定的国际恐怖组织“东伊运”头目阿布都卡德尔·亚甫泉甚至对依照国际法通行规则实施遣返行为的泰国发出赤裸裸的威胁：“对泰国的罪行，我们会寻找适当的时机反击，这是不可饶恕的。”

土驻外使馆提供便利

年长的维吾尔人告诉阿里木，四十多年前的维吾尔人是如何骑着毛驴从新疆来到土耳其，“从新疆到西藏腹地，再到巴基斯坦，最后来到这里，连护照都不用”，阿里木说。

随着各国边境管控日渐规范，骑着毛驴去土耳其不可能再发生了。但是土耳其对这些外来者的开放姿态却一直未变。无论是民风、传统还是在法律上，土耳其对外来非法移民的态度一向宽容，并非仅限于维吾尔人。

“只要你入境了，随便找个担保人，就可以拿到六个月居住权。到期后再由内政部批文，每年允许几千人拿到居住证，几千人拿到国籍。没拿到就继续等。”热合买提说，他在土耳其从未听说有偷渡者被遣返一事。

土耳其人有好客传统，尤其是对被他们视为兄弟的突厥语民族和穆斯林。当地人时常会开着卡车来到开塞利的捐赠点，卸下桌椅、食用油、衣物和无数西红柿。据阿里木观察，现在安卡拉街头的乞丐变多了，土耳其朋友说，他们都是周边国家来的难民。“在土耳其，非法入境的人太多了，光是叙利亚就有100多万人在这里。只要不犯罪，用新疆的话说，尽管去挣你的‘馕钱’。”

在这种开放性姿态的基础上，加之以

民族和宗教情结，便不难理解土耳其驻部分东南亚国家使馆工作人员为偷渡提供便利的情况。

据大陆媒体报道，去年10月以来，中国警方已在境内抓获22名土耳其籍犯罪嫌疑人，他们受土耳其境内“蛇头”指挥，组织偷渡，而假造、变造土耳其护照的地点也在土耳其境内。

去年9月，土耳其驻某东南亚使馆工作人员曾直接参与营救被当地执法部门扣押的中国籍偷渡团伙头目，谎称此人系土耳其公民，多次施压要求放人，最终成功将其送往土耳其。

今年2月，被抓获的组织偷渡者吾布力喀森·麦提如向警方供述，他拿着偷渡者的照片和编造的土耳其名字，在土耳其驻某东南亚国家使馆办理了500多份土耳其身份证明，得以使400多名中国籍偷渡者以土耳其公民名义进入土耳其。今年6月，中国警方与东南亚国家展开联合行动，在一犯罪嫌疑人住处查获653本土耳其护照。专家称，上述护照均系伪造，偷渡者却能够持此类护照顺利入境土耳其。

土耳其最大的英文媒体《今日时代》今年4月引述当地《迈当日报》的报道称，一位名为Nurali T的维吾尔人一直向外国激进主义者提供假护照，使得他们得以抵达土耳其，进而进入叙利亚加入IS。Nurali T靠着这一门生意赚取了1300万土耳其里拉。

报道指出，大多数持有假护照入境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会在土耳其机场被警察发现，当收缴了假护照之后，就会被释放。热合买提告诉《凤凰周刊》记者，近期由于国际压力，土耳其警方加强了土叙边境的管控，“在边境城市抓到一些维吾尔人，到伊斯坦布尔再放掉”。

土耳其驻外使馆的工作人员在维吾尔

人偷渡的过程中也发挥了作用。据路透社披露，一份名为“土耳其共和国外地人紧急旅行文件”的东西曾被发给维吾尔偷渡者，这份文件只对到访土耳其有效。而在成功偷渡到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中，有一名4个月大的婴儿。他的母亲声称，她与孩子被人蛇集团从中国运出，辗转柬埔寨、越南和泰国，最终通过土耳其驻吉隆坡大使馆的外交官得到了这份文件。文件显示，这名年幼的偷渡客出生在新疆吐鲁番，国籍一栏填着“东突厥斯坦”(East Turkestan)。

今年7月泰国抓获偷渡者后，在土耳其一家电视台的节目中，“东伊运”头目亚甫泉也证实了这一点。据《新疆日报》报道，他在访谈节目中称这批偷渡者在泰国被抓获后，“‘东突厥斯坦’通过‘外交’手段极力营救，无论是我们还是别的组织，每个人都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没有效果。”

对安卡拉而言，这是个棘手而尴尬的问题。一直以来，土耳其官方从不讳言其乐于为那些已进入土耳其国境的流亡者提供庇护，但却否认曾直接在国外协助维吾尔人离开中国。

中国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处长童碧山对此表示，土耳其在其位于东南亚的大使馆向维族人提供旅行文件已经被提到“高层”，“土耳其政府整体态度不差，但我们看到的是，土耳其大使馆的员工有提供协助。”

复杂的土耳其维吾尔人江湖

土耳其存在着各种维吾尔人流亡团体和组织，或世俗或宗教保守，彼此之间亦存在分歧与斗争。一些团体主张“圣战”解放“东突厥斯坦”，一些团体则避免公开支持暴力或恐怖主义。

共同的是，他们长期以来，通过各种方式谋求“东突厥斯坦”的独立。由于这些团

体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社会中颇为活跃，即便是对政治不感冒的维吾尔人，有时也不得不与之打交道。

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的“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出于对突厥语民族和穆斯林的照顾，土耳其政府对一些突厥语、穆斯林国家(地区)来土求学的学生给予优厚的奖学金。获奖学生只要通过土耳其大学选拔考试，不但可以免除学费，还能享受医疗、住宿，甚至还有交通费用的减免。但这些奖学金项目，几乎都掌握在“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手中。“自费的学生管不着，但只要想拿奖学金就得接触(他们)。”热合买提说。

由于存在这样一层关系，“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得以进行宗教意识形态的输出。该协会组织能力极强，每年暑假或寒假，他们会把很多国外的维吾尔族学生请到土耳其的山上开讲经会。据中国官媒报道，这些讲经班时常为恐怖组织物色、培训人才。

“在土耳其每一个维吾尔人都清楚这个，它就像个大部分人虽然反感，但是不会直接戳破的气球。”热合买提表示。

大部分偷渡至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信奉保守的瓦哈比教派。“但并不代表他们就都是恐怖分子，一些人只是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就像苦行僧。”热合买提说，这些保守的穆斯林们，初到土耳其时，会惊讶于其世俗化。后来就慢慢适应，各找各家，物以类聚。

“比如和田人居住在一个区域，喀什人居住在另一个区域。一般来说，北疆来的维吾尔人比较世俗，走极端路线的人少，融入环境很快，经常往中国跑，生活也不错。”

在伊斯坦布尔，每个区之间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比如一个区全是戴面纱的女性，再往下走2公里就是红灯区。“你走个几公里就能看到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彼此

之间互不干涉。”热合买提说。

49岁的新疆维吾尔人Adil Abdulgaffar承认，他们知道有人穿越土耳其国界进入叙利亚，加入IS，但数量很少。他告诉路透社，那些武装分子引诱他们，声称会训练他们以维护维吾尔人的福祉，会给他们武器，来对抗北京。“有人离开土耳其去叙利亚，他们希望这些承诺会被兑现。但我也知道他们很后悔，希望回来。”

据《新疆日报》8月4日报道，在最近一批被从泰国遣返的偷渡人员中，许多人坦承自己受了欺骗和蛊惑，听信了“迁徙圣战”的理论。

“那个叫阿巴拜克热的人说，不搞‘迁徙圣战’会下‘火狱’，‘圣战殉教’可以进‘天堂’。我就信了他的话，想进‘天堂’。”一名被遣返的偷渡者说，阿巴拜克热反复叮嘱，如果途中被抓就说自己是土耳其人。在被欺骗的人中，有人文化程度较低，连借条也不会写，更不懂伊斯兰教义，很容易便信了蛊惑者的话，走上了“圣战”之路。

此类谎言并不罕见，就在7月9日，还有人借此煽动被遣返人员中的一部分人在登机过程中袭击中泰两国警务人员。

至于那些最终成功到达了土耳其的人，他们对于“圣战”的态度也并非如外界所想那般充满热情。

热合买提认为，赚取“钱”是这些背井离乡者最迫切的需求，这和来自他国的流亡者并无不同。

医生阿里木没有参加7月的游行，这段时间他选择不出门，尽管维吾尔人是示威者声援的对象。“你不知道会不会被扔酒瓶或催泪弹。”他说，“况且，我在国内做过10年急救工作，如果看到中国人(受伤)，我肯定要救他，但他们(示威者)一看肯定会问：你这么做，你是什么人？”



Biem Ifdkkk
比音勒芬



中国国家高尔夫球队指定品牌

www.biemlf.com



关注比音勒芬官方微信

新疆问题阴影下 微妙的中土关系

外界普遍认为，土耳其不会为了干预维吾尔人问题，而牺牲与中方的友好关系。作为丝绸之路两端的有影响力大国，在经贸、反恐等一系列问题上展开务实合作，将为两国带来更大的现实收益。

记者/吴如加

随着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7月30日结束为期两天的访华行程，月初发生在土耳其的反华事件为两国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似乎正在消退。

埃尔多安于7月29日抵达中国，开始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埃尔多安自去年8月就任土总统以来第一次访华，也是他自担任土耳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下称正发党）主席以来第三次到访中国。在其出访前，多位学者向《凤凰周刊》记者指出，7月初的排华事件仍或带来影响，中方迟迟没有对其发送邀请通知，而是土耳其媒体单方面提前宣布这一消息——直到埃尔多安从安卡拉飞往北京的前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才予以公布。

随同埃尔多安一同出访的有超过100名土耳其各界商人，但与2012年他作为总理出访时的400人豪华阵容相比，甚为低调。这位性格强硬的领导人全程表情严肃，显得忧心忡忡，会谈期间也未接受任何媒体的提问。

7月初爆发的反华游行，令埃尔多安的此次访问气氛多少有些尴尬；而自己执政多年的正发党在6月7日的议会选举中由于所获票数未过半，面临与其他政党组建联合政府的局面；而面对当下土耳其经济增速放缓的现实，他也希望进一步深化中土两国经贸关系，吸引更多中国投资。

同时，双方在文化上的交流也日益加深。2012年、2013年，中土两国互相举办文化年，秦始皇兵马俑在托普卡珀皇宫展出，

中土高层领导人交往

1971年8月4日，中国和土耳其建交。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两国高层互访增多，双边关系发展较快。

2008年—2012年

这几年，土方重要来访有：托普坦议长（2008年4月）、居尔总统（2009年6月）、埃尔多安总理（2012年4月）。中方重要出访有：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2008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2010年4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10年10月）、国家副主席习近平（2012年2月）。

2014年5月

土耳其总统特别代表、外长达武特奥卢来华出席亚信上海峰会。

2014年8月

习近平主席特使、水利部部长陈雷赴土耳其出席土总统埃尔多安就职典礼。

2014年9月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访问土耳其。

2014年10月

土耳其外长达武特奥卢来华出席阿富汗问题伊斯坦布尔进程第四次外长会。

2014年11月

习近平主席特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访问土耳其，其间会见土总统埃尔多安、副总理巴巴詹、内政部长阿腊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哈哲穆夫提奥卢。

2015年7月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访华，并与习近平主席共同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土耳其经贸论坛”。此次访问是埃尔多安去年8月就任土总统以来第一次访华，也是他自担任正义与发展党主席以来的第三次中国之行。

以土耳其为背景的歌剧《后宫诱逃》则在中国国家大剧院上演。

埃尔多安的明确表态

短短两天的访华行程中，埃尔多安针对恐怖主义，尤其是中国关心的“东伊运”，进行了强硬表态。他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强调：“土耳其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东伊运’等针对中国的恐怖主义行径，愿意就此加强与中方的合作，决不允许中土战略合作关系受到破坏势力的干扰。”

这被大陆官方媒体视为土耳其政府在“东伊运”问题上最为公开、清晰的一次表态。因此，埃尔多安遭到了来自土耳其国内包括共和人民党、民族行动党等反对党的批评，认为埃尔多安仅仅为了向中国传递友好姿态，发表上述观点是不合适的。

次日凌晨，新华社发布消息称，土耳其当局开展打击恐怖主义行动，在全国34个省份逮捕1050名关联“伊斯兰国”（IS）和“库尔德工人党”等组织的涉恐人员。报道引述土耳其官员的话称，仅7月27日一天就有256人落网，包括在首都安卡拉逮捕的15名关联IS人员和在迪亚巴克尔省、马尔丁省逮捕的135名“库尔德工人党”涉恐人员。

偷渡者通过土叙边境进入叙利亚参加“圣战”，是中国的主要担忧。中国公安部处理打击非法偷渡和移民问题的前线工作人员童碧山在一次专访中表示，这些偷渡的维吾尔人“很容易被当地势力控制，特别



像‘东伊运’等恐怖组织，会把青壮年进一步组织起来洗脑，然后让他们去前线打仗，实际上是当炮灰”。

据其披露，偷渡者到土耳其后，接应的不止一个恐怖组织，可能是两三个。由于缺人，这些组织之间还会抢人。“恐怖组织会给偷渡者钱，相当于招兵，每人至少2000美元。”

土耳其和叙利亚有着911公里的边境线。西方国家一直指责土耳其对边境管控不力，导致大量恐怖分子经由土耳其流入叙利亚。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土耳其一直奉行以“推翻阿萨德”为优先目标的对叙政策，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大量帮助，甚至默许外国“圣战者”从土耳其越境进入叙利亚。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土耳其与叙利亚之间的边境非常容易渗透，无论是难民还是武装人员，都可轻易进出。在叙利亚境内发生大战而损失惨重后，反对派武装

↑
2015年7月29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访华期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会将伤员送入土耳其。土耳其救护车会将他们送往医院救治。

另据大陆媒体报道，土耳其边境城镇的咖啡馆里和街道上，甚至一度挤满了蓄着长须的外国“圣战者”。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管尼古拉斯·拉斯穆森今年3月称，迄今已有将近2万名外国人到伊拉克和叙利亚加入了IS，这些人大多取道土耳其。甚至有IS的高级指挥官将土耳其描述为“圣战者”偷渡时的“高速公路”。

由于担心库尔德武装在抗击IS的战争中崛起，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并不热衷于对IS的围剿，甚至一度拒绝美国空军使用其境内机场作为打击IS的基地。当时土耳其表现得犹豫不决的另一原因在于，去年6月IS在伊拉克攻城略地时，绑架了土耳其驻摩

苏尔领馆的49名外交人员。如冒然参与对其围剿，很可能置这些人质于险境。最终，据《泰晤士报》报道，土耳其以180名被俘“圣战者”及其家属，换回了本国人质。

此次换俘行动虽然招致欧洲国家的不满，却也使得埃尔多安可以放下顾虑施展拳脚。随着人质的释放，以及大批叙利亚人因IS的暴政而入境土耳其避难，土耳其的态度开始发生改变。2014年9月30日，土耳其政府向议会提交提案，要求议会授权对IS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埃尔多安还呼吁国际社会，在对IS目标实施空中打击的同时，应该发动地面攻势。与此同时，土耳其加强了对在边境地区的巡逻管控，并将疑似“圣战者”入境黑名单扩大了5倍。

近日的一系列针对土耳其的恐怖袭击，使得土耳其政府下了最后决心。7月20日，IS“圣战士”在土耳其边境的苏鲁奇制造了针对库尔德人的恐怖袭击，炸死32人、伤100



多人，为土耳其多年来最严重的爆炸事件之一。23日，“圣战士”枪击土耳其边境哨所，造成1名土耳其士兵丧生、多人受伤。土耳其政府随即召开安全会议，决定对IS实施空袭。同一天，土耳其警方部署约5000名警力在全国13省采取行动，逮捕数百名极端或反政府武装嫌疑人，被捕嫌疑人中还有数十名外国人。此前，土耳其已允许美军使用其境内的空军基地，用于打击IS。

随着土耳其反恐态度的转变，预期中土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将有更广泛的合作前景。

中国就像是一整个大洲

“十五年以前，两国的经贸关系水平很

↑
2014年7月25日，由中国建设的土耳其“安卡拉—伊斯坦布尔高铁”正式通车，时任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偕众要员试乘首趟高铁。

土耳其学者认为，平衡进出口额对土耳其而言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其缺乏自然资源，也没有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可供输出。因此，土耳其在工业半成品方面对中国有着严重依赖，中国也成为土耳其经济得以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低。”北京大学土耳其学者乌穆特·艾尔古苏向《凤凰周刊》记者表示，根据土耳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01年中土双边贸易额仅为11.3亿美元，2014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277.4亿，14年间膨胀了24.5倍。“虽然时间不长，但贸易额增长迅速。”

2010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土耳其期间，双方提出将在2020年使双边贸易额达到1000亿美元的目标；2012年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土耳其时，又重申了这一目标。

除了贸易数字外，中国企业在土耳其也日渐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公司承建了土耳其安卡拉至伊斯坦布尔的二期158公里



高铁工程，它是迄今中国高铁走向世界真正落实的少数项目之一。2014年7月，这段高速铁路通车，埃尔多安亲自试乘了首班车。这是中国企业在海外承建的第一条高速铁路，也是近年来持续升温的中土关系的一个注脚。

此外，土耳其的最大发电机组由中国制造，土耳其电信市场的一半以上份额被中兴和华为占据。

“对我们而言，中国就像是一整个大洲。”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如此表示。

在双方经贸往来愈发密切的十余年间，地处亚洲两端的中国和土耳其，国内的经济也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根据土耳

中土经贸往来

1974年

中土两国签订了贸易协定，规定以现汇进行贸易，并成立了贸易混合委员会。

1981年

中土两国签订了贸易协定书，并规定了双边在经济、工业和技术方面的合作细节。

1999年

中土双边贸易总额为

6.84 亿美元

2014年

中土双边货物进出口额

277.4 亿美元

据土耳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土耳其对中国出口28.6亿美元，占土耳其出口总额的1.8%;土耳其自中国进口248.8亿美元，占土耳其进口总额的10.3%。

2014年赴土的中国游客

20 万人次

其统计局数据，土耳其的GDP从2002年的2325亿美元，增长至2014年的8001亿美元，在中东、北非国家中排名第一，并成为世界第十八大经济体。

土耳其安塔利亚将在今年年底主办G20峰会，此次访问时埃尔多安也谈及即将举行的峰会情况。以色列海法大学的王晋认为，土耳其迫切希望中国能够以较高的规格参加2015年11月在安塔利亚举行的G20峰会，以此改善土耳其的外交形象。

自2002年正发党执政以来，中土之间经贸往来大幅增长，去年中土双边贸易额达到277.4亿美元，中国成为土耳其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国。目前已有600多家中国企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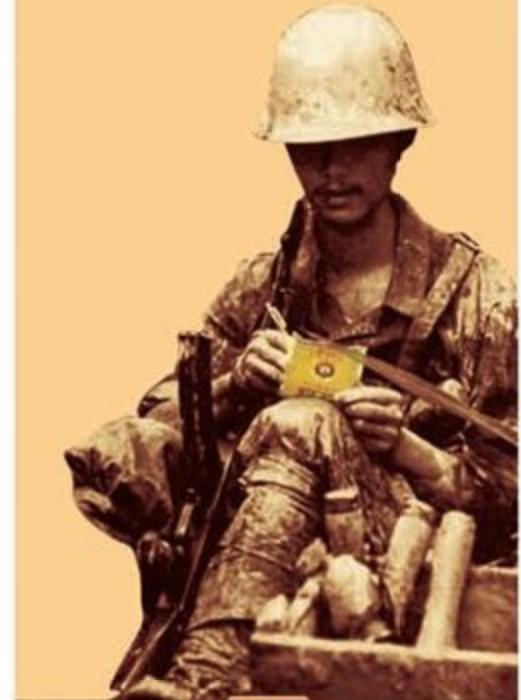


九九归一·义重情长

— 经典重启 —

一个品牌，
承载着百年重九起义的深厚记忆，
凝聚着一代人实业救国、
振兴民族工业的爱国魂，
饱含着浓浓爱国情、兄弟情、战友情.....

悠悠岁月，义重情长，
穿过百年的烟云，
我们追寻着关于重九的记忆，
演绎着新的经典与传奇.....



(详情敬请登录 www.hyhhgroup.com)



在土耳其运作。

此次在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会谈中，埃尔多安明确表示，土耳其愿意进一步提升双边贸易投资合作水平，欢迎中方加大对土耳其基建、能源、信息通信、金融、航空、工程等领域的投资和合作，土耳其愿意成为中方企业生产、物流基地，期待与中方一道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

贸易逆差与军事合作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巨大的贸易逆差成为土耳其政府的一大困扰。不生产石油是重要原因。

在土耳其的贸易逆差中，中国亦贡献颇丰。2014年，土耳其对中国出口28.6亿美元，进口达到248.8亿美元，土方逆差为220.2亿美元。乌穆特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土耳其从中国进口的主要是一些半成品和

零部件，而出口至中国的主要是一些大理石。土耳其制造业的最大问题是研发层面，水平不够高。所以，很多产品零部件还得靠中国制造。”

伊斯坦布尔文化大学学者Fatih Furtun提醒道，维吾尔问题使得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缺乏信任，阻碍两国关系进一步提升。土耳其应该明白，保护维吾尔人的文化权利，不等于保护打着维吾尔人旗号活动的恐怖分子。

中国是土耳其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地，但在后者的出口市场中，中国仅排在第十九位。土耳其卡迪尔哈斯大学从事东亚研究的经济学家阿克米克（Ali Akkemik）认为，平衡进出口额对土耳其而言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土耳其缺乏自然资源，也没有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可供输出。他强调，土耳其在工业半成品方面对中国有着严重依赖，而中国“已经成为土耳其经济得以发展的最重要贸易伙伴之一”。

这也引起土耳其政府的担忧。

“土中之间的贸易逆差不可能短期内解决，”乌穆特表示，因此土耳其政府希望通过其他途径缩小两国间经贸的不平衡，



九九归一·清甜香醇

— 经典重启 —



造物钟秀，含英咀华，
土壤、阳光、雨水……
天时地利的谐和，
高原玫瑰、薰衣草、迷迭香……
香料植物相伴种植，
品质天成的自然意境，
尽显清甜香醇。

“一个办法是吸引中国公司来土耳其投资，另一个办法就是提升旅游业，就算不会效果那么大，起码可以缩小差距”。今年5月，中国工商银行斥资3.16亿美元收购土耳其纺织银行75.5%的股份。这次并购也是中国对土耳其迄今为止最大的单笔投资。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郁红阳则说，工行此次成功并购对中土两国深化金融合作、实现共建“一带一路”的资金融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目前中国在土投资还远未达到对方的期待。郁红阳在接受土耳其《世界报》采访时说，截至2014年6月底，中国在土耳其所有投资额是8.46亿美元。但同一时间，中国对越南的投资已达到80多亿美元。

除了紧密的经贸关系，中土之间的军事合作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10年9-10月，中土两国空军在土耳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这是中国首次与北约成员国举行此类军演，标志着双方之间军事关系的深化。2013年，土耳其国防部宣布，将从中国采购价值34亿美元的导弹防御系统，引起美国和北约官员的警觉。在盟国的施压下，土耳其随后表示，将延长招标期限。

此次访华前，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对中国改善后的远程导弹防御系统投标持开放态度。“最合适的是来自中国，但是某些进展导致此事被推迟。我们将在此次访华期间重新考虑这些事项。如果我们收到改善的投标方案，我们将对此持积极态度。”

土耳其是唯一公开洽谈购买中国红旗-9导弹防御系统的北约国家。美国曾就此向安卡拉施压。路透社引述一名土耳其国防工业局官员的话称，关于导弹防御系统谈判的最大障碍在于中方不愿进行技术转让。有土耳其官员表示：“如果这一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该项目将获得批准。”

基于此，有分析认为，为服务于G20峰会、合作反恐等都是表面文章，土耳其方面的真正意图是要借助中国攀入大国行列，而中国方面的真实意图则是借助土耳其打破北约的武器体系。“这是中国继亚投行，从经济方面突破之后，从武器角度突破欧盟的又一战略。”

维吾尔人问题上的反复

多领域的合作之外，维吾尔人问题几乎是中土之间唯一重大的问题所在。土耳其接纳维吾尔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共建政之前。

1949年中共建政前后，包括前“东突”领导人在内的八百多名维吾尔人越过中印边境，离开新疆，在旅途中54人丧生。同年年底，土耳其议员来到印度，向维吾尔人承诺提供就业机会、资金和住宅，说服他们前往土耳其。当时这些维吾尔人的中国护照已经失效，于是他们获得了土耳其护照，很快到达土耳其。1952年，又有数千维吾尔人离开中国进入巴基斯坦。土耳其政府积极介入，并让1850人移居土耳其。这些新来的维吾尔人被安置在土耳其中部城市开塞利，土耳其政府为他们修建了房屋，并且给予其工作和公民权。

上世纪50年代，土耳其作为联合国军的一员参加朝鲜战争，5000多人的土耳其旅损失了3216人，其中721人阵亡，在联合国军中排名第三。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有一些流亡维吾尔人加入了土耳其旅，在战场上与中国人民志愿军性命相搏。其中以贝根(General Bekin)为代表，他在土耳其旅中的野战炮兵营担任中尉。从朝鲜归来后，贝根在土耳其政界、军界均担任过要职，同时也是第一位在北约军队中服役的维吾尔将军。土耳其军方、警方中不少高层正是他当年的学

(详情敬请登录 www.hyhhgroup.com)



2015年6月3日，2015“一带一路”国际经贸投资系列论坛来到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的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

方面拒绝赋予库尔德人自决权。”

中土两国互访在这一时期持续增加。2000年4月，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土耳其，与时任总统苏莱曼·德米雷尔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在反恐问题上开展合作。2004年1月，时任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以正发党领袖的身份访问中国，承诺将尽全力反对恐怖主义。2009年6月，时任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在中国进行了为期6天的访问。对于总统级别的访问而言，这算相当长的时间。

桥梁还是障碍：危险的筹码

然而，一个月后，乌鲁木齐发生的“7·5”事件让土耳其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土耳其希望继续提升对华关系；但另一方面，土耳其与维吾尔族在文化和宗教上联系甚密，且同属突厥民族，这让普通民众对维吾尔人抱有深切同情。在土耳其民间不断高涨的舆论压力下，埃尔多安发表了强硬声明谴责中国，并形容此次骚乱为“屠杀”。时任土耳其工业部长尼哈特·埃尔格甚至提议抵制中国产品。

该事件在持续发酵的过程中，土耳其媒体表现得咄咄逼人，甚至犯下了许多错误。例如将被殴打至死的汉族人的照片错当作维吾尔人放上了报纸的头版。这些进一步加剧土耳其民众对中国的负面情绪，并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反华游行。

当土耳其人热情减退并重新审视此次事件时，来自伊斯坦布尔文化大学的学者Fatih Furtun在2010年撰文指出，“事实的真相与土耳其人所看到的并不相同。尽管中国安全部门对待维吾尔示威者的措施较为强硬，且中国司法也是值得诟病的，但一些重要的事实被土耳其人忽略了，例如，暴乱的煽动者多为维吾尔人，而死伤者中的多

生或下属。以准将军衔退伍之后，贝根声称“我已尽了我对土耳其共和国的义务”，随后便投入了“疆独”活动，先后担任“东突民族中心主席”、“东突基金会会长”，一度被视为最高领袖。

1971年土耳其和中国正式建交，但并不意味着两国关系的改善。伴随着冷战结束，1990年至1997年，土耳其依旧向有独立诉求的维吾尔人提供支持。

苏联解体后，中亚的突厥民族纷纷独立建国，土耳其认为这是突厥民族复兴的前兆，并希望借此机会在中亚地区发挥自己的影响力。1992年3月，土耳其总统图尔古特·厄扎尔在伊斯坦布尔会见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前领导人玉素甫·阿布甫泰肯。图尔古特甚至说，苏联解体后，该轮到“东突厥斯坦”去赢得独立了。

据美国东西方中心的报告《民族外交：中土关系中的维吾尔障碍》所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土耳其向入境的维吾尔人提供住宅和公民身份，并且允许他们参军。但实际上，大多数维吾尔人一直过着普通日子，设法养家糊口，避免参与政治。

1997年，为了进入高速增长的中国市场，以及换取中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支持（注：塞浦路斯岛北部37%的面积为土耳其所占领，并自称为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该政治实体目前仅有土耳其一国承认）等，土耳其希望与中国和解，因此采取了许多积极举措，改善对华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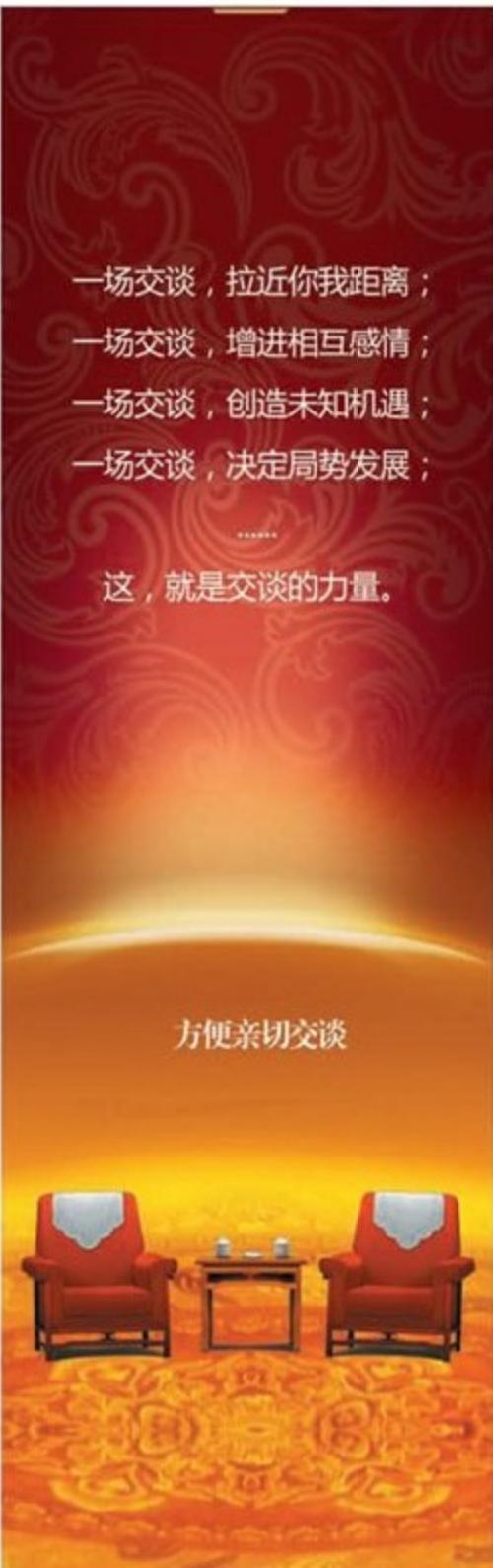
据土耳其最大英文媒体《今日时代》的报道，在1998年与中国签署的第36号秘密备忘录中，土耳其承诺限制“东突”分离主义者在其境内的活动。时任土耳其总理比伦特·埃杰维特明确指出，维吾尔问题不应该成为影响中土两国关系的绊脚石。随后，10名“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成员被逮捕，该组织是由一名从新疆和田逃到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建立的。负责与国外突厥社会关系的国务部长哈卢克·恰伊坦承：“我们必须奉行现实主义的政策。”此后，“东突”组织在土活动有所减少。

土耳其对维吾尔人政策的转变，也和其国内的库尔德人分离势力影响有关。东西方中心的报告一语道破其尴尬之处：“土耳其不能一方面支持维吾尔分离主义，另一



九九归一·方便交谈

— 经典重启 —



数则是汉族人。”

土耳其驻华大使埃森利也承认这点，“当土耳其读者看到照片上那些可怜的汉族人时，误以为是维吾尔人遭到攻击。虽然有很多维吾尔人生活在土耳其，但土耳其人确实不会分辨汉族人和维吾尔人，就像很多中国人看不出土耳其人与希腊人、意大利人或叙利亚人之间的区别。”

“维吾尔问题使得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缺乏信任，阻碍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提升。”Furtun进一步提醒，“土耳其应该明白，保护维吾尔人的文化权利，不等同于保护打着维吾尔人旗号活动的恐怖分子。”

“7·5”事件虽然导致中土关系趋紧，但现实利益很快又将两个国家拉近。2010年9月，中国空军应邀与土耳其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同年10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土耳其，双方达成了许多合作协议，中土关系就此回暖。

中土建交40周年之际，埃森利在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表示，“土耳其的一些维吾尔族人有时会对中国发出挑衅的声音，但更多人与中国的关系非常亲密，所以不能说土耳其的维吾尔族人都对中国抱有敌意。”谈及维吾尔人问题时，他说：“我们希望他们成为连接土耳其和中国的纽带。我们还希望中国的维吾尔人积极参与国家建设，成为这个富有活力的社会的一个重要部分。”

2012年4月，埃尔多安对中国进行了为期4天的访问。这是27年来土耳其总理首次访问中国，也是土耳其总理首次访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在改善与中国关系的同时，一些“东突”组织仍在土耳其继续活动，土耳其也是他们最重要的庇护所。尽管一些持有土耳其护照的维吾尔人卷入了针对中国的“恐怖活动”，但是土耳其从未将他们引

渡回中国。

“对维吾尔人的姿态就是埃尔多安的外交筹码。他不停表示关切，也是希望在中国获得更多利益，他觉得抓住了中国的软肋。但这是很危险的做法。”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者郑亮向《凤凰周刊》表示，继续这样会深深伤害中土关系。“土耳其在乌鲁木齐有自己的工业园，在新疆覆盖率很高。中国政府给他们开很多绿灯，还允许他们开工业园。中国政府是希望土耳其在维吾尔问题上发挥作用，所以才给了这么多优惠。”他表示，希望土耳其能领会中方的善意。

土耳其高峰大学(Zirve University)中东研究中心主管Gökhan Bacık也表示，“土耳其不希望以中土友好关系为代价，在新疆问题上冒险。土耳其更愿意将新疆视为连接中土两国的桥梁而非障碍。”

“这对土耳其而言是个困局”，《征服者的后裔：突厥世界的崛起》作者、美国学者波普(Hugh Pope)认为，“一方面是血缘的纽带，(维吾尔人)他们是突厥人，从伊斯坦布尔一路东行，一个土耳其人可以随时下飞机，和任何人进行某种程度的交谈；另一方面，(土耳其)官方多数时候必须在国内政治上迎合民意。虽然印象中，(土耳其)总理对新疆的关注程度并不会超过加沙。”

对于埃尔多安过去在维吾尔人问题上的同情姿态，乌穆特告诉《凤凰周刊》，土耳其领导人的演讲，主要是给老百姓听的。

“正发党和民族行动党在意识形态上有相似之处。民族行动党说支持维吾尔人，如果正发党不回应，他的支持者可能会转而给民族行动党投票，所以政治平衡非常重要。”

埃尔多安访华期间对“东伊运”的强硬表态，似乎印证了乌穆特的说法：“经济是土耳其外交的主要动力，而不是意识形态。”

□ 编辑 漆菲 □ 美编 青年

(详情敬请登录 www.hyhhgroup.com)

骆驼湾村脱贫攻坚记

习近平走访过的特困村悄然变化

记者/孙杨

“**不**要把车窗摇下来，外面灰大得很。”汽车经过阜平县城时，在207国道跑了半辈子的老客车司机这样提醒第一次造访这里的乘客。

地处太行山中段的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位于晋冀交界，虽仅有一山之隔，景象却有天壤之别。西麓是大陆佛教风景名胜五台山，一年到头香客不断；东麓阜平县则被列入燕山-太行山连片特困区，人均年收入不足千元。

保阜高速公路上满是往返五台山的游客，207国道才是阜平当地人联通外界的通道。特别是偏远村镇的村民们，进县城办事必须依靠此路。但这条路上真正的主角是大型运煤卡车，作为晋煤东运的主干道，运煤卡车几乎排满国道。每到颠簸或转弯处，就会扬起漫天煤灰。搭载村民往返的班车司机，早已练就一手左冲右闪的“高超车技”，在这条双向两车道的公路上见缝插针地超车。

位于这条国道河北段最西端深山区内

爱心热潮只是一阵风，单纯靠捐款捐物的“输血”不可能真正解决村子的实际问题，怎么能让村子拥有自己“造血”的能力，才是检验脱贫成果的标准。

的骆驼湾村，是这片特困区中的特困村。2012年12月30日，履新中共中央总书记仅一个半月的习近平，将阜平县作为“访贫”首站，走访了骆驼湾村和顾家台村两个贫困山区的典型代表村。

“窥一斑知全豹，到这里就是要了解我国的真实贫困状态。如果能看到真贫，从

北京三个半小时的路程就值了。”习近平如此评价此次考察。

新任总书记专程进山去看“穷”在当天即成为全国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也令骆驼湾村一夜之间从太行山深处默默无名的特困村变成全国瞩目的脱贫攻坚试点，在总书记考察后的长达半年的时间内，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心和关怀如风暴般席卷而至。从阜平县到保定市再到河北省，更是高度重视，拟定一系列的脱贫计划。

2015年4月，《凤凰周刊》记者特地启程前往阜平县采访，观察骆驼湾在这场扶贫攻坚战中悄然发生的变化。

突如其来的慈善热潮

每天早晨跟着日出起床，先准备出一天的主食——把用玉米面和野菜捏成的团子和土豆一起煮上，然后喂院子里的一头猪、几只鸡，再去半山坡上那几亩种着土豆和玉米的自家田地里拾掇拾掇。周末的时候，已经在

乡突然成为全国瞩目的脱贫攻坚试点。

正如习近平的“窥豹”说，骆驼湾村可谓大陆贫困山区的典型代表。恶劣的自然条件从进村的道路两侧就能感受到。山区田地少，且大部分都是位于半山坡的旱地，播种机、收割机开不上去，甚至连引水上山的渠道都没有，所以耕作仍要依靠原始的手工劳作。虽然是盛夏正午，仍可以看到上了岁数的农民弓着腰在山坡上的农田里除杂草。

因为土地贫瘠，所以村民们大部分只能种些玉米和土豆，一年一收，主要供自家人食用。也有人尝试种植大枣、核桃，但大部分产量不高。

记者从保定向西的一路上发现，保定市至阜平县之间浅山区的山头上，防火护林的标语随处可见，但是因为过去长期的过度开发，大部分山头都是光秃秃的，并没有多少树林可护。而从阜平县城继续向西到龙泉关镇的深山区，反而植被茂密，甚至有溪流瀑布。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骆驼湾村一带一直欠缺开发的实情。

当地人认为，地理位置过于偏僻，令村子与外界严重缺乏联通，也没有项目愿意进入，是村子欠缺开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村民告诉记者，骆驼湾村原本是一个行政村，下属9个自然村，因为贫困和落后，年轻人纷纷打工出走。现在，骆驼湾仅剩下2个自然村，共245户人家，其中190户都是低保户，大多是留守的老人和幼童。

《凤凰周刊》记者见到村民唐荣斌时，他的老伴顾保青在准备午饭，主食是一早就做好的土豆和玉米面野菜团子，配菜是加了很多酱油、颜色深得发黑的萝卜汤和炒



豆芽。看到记者到来，她特意从柜子抽屉里掏出两个鸡蛋来炒，房间里一下子腾起了呛人的油烟味。

“尝尝吧，习主席也吃过我烤的土豆呢。”顾保青热情地说。和两年半前习近平到来时一样，唐荣斌夫妇仍然住在那栋破旧的土坯房里，不同的是，屋子东头桌子上多了一台32寸的国产平板彩电，西侧床边墙上添了几幅中共领导人的宣传画。最大的两幅分别是窗边的七常委头像，以及床头的习近平、彭丽媛夫妇出访合影。

2012年12月30日，习近平走进这个屋子，和激动得不知所措的唐荣斌夫妇握了手，然后盘腿坐在炕上聊起家常，问粮食够不够吃、过冬的棉被有没有、看病困不困难。

当天晚上，唐荣斌第一次从电视里看到了自己。他以为，新闻联播一结束，事情将就此打住。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从第二天开始，看望和慰问的人群几乎踏破了他家的门槛。有的人询问唐荣斌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有的人进门就给唐荣斌夫妇手里塞钱，好心人送来的米面让两人吃了大半年，一位自称从吉林赶过来的男子，更是直接把一台32寸的平板电视摆在他家桌子上。

唐荣斌至今还记得，最初的半个月，每天都有访客在门口排着队，一拨人刚走出去，下一拨人就立刻进来，先由村干部简单介绍，然后送东西、握手、寒暄、合影。再之后的几个月，则是隔三岔五有人过来探望。直到半年以后，热情的人群才减少。

村委会更是热闹。时任村支书的顾润金回忆，习近平离开后，村里开始接待各式各样的来访者，包括各级政府部门工作人员、部队领导、社会组织、企业领导、开发商、农林专家、文艺演出队、志愿者、热心

人士等。

据负责登记接收钱物的村干部统计，仅一周时间，村委会便累计收到捐款近20万元。另有大量的米、面、油、毛毯、羽绒服、棉被等生活用品，以及笔、本、图书等学习用品。2013年，每位村民平均摊到了700元善款。

来考察和洽谈合作项目的企业、开发商也排起长长的队伍，村干部经常一天要带着好几拨人参观。

直到2013年下半年，这股爱心热潮才随着人群的消散退去。据龙泉关镇的工作人员透露，来这里的企事业单位考察的多，确定合作的少，很多都是热闹一阵，就没了下文。

“输血”易，“造血”难

“这是你家的面。”就在午饭快要准



孙少影 摄影

备好的时候，唐荣斌家的门突然被推开，一个身材清瘦、大嗓门的壮年男子扛着一袋面粉，径直走到唐家存放粮食的柜子前卸下来，一看就是非常熟悉这里的情况。

男子名叫任二红，是骆驼湾村党支部委员，也是《凤凰周刊》记者在村子里采访时所遇到的除村支书和村长外唯一一位壮年村民。

几年前，任二红曾经在北京城南一家家具店内做散热器生意，近来母亲身体不好，才回村照顾。村党委见状，立刻将这位难得的“壮劳力”吸收成为组织里唯一的委员。

“家家户户都没有年轻人，能帮就帮一把喽。”任二红说。作为村支部成员，他每天的工作主要是帮着腿脚不便的村民送粮送菜、打扫院子。这位村民眼中“见过些世面的后生”认为，爱心热潮只是一阵风，单纯靠捐款捐物的“输血”不可能真正解决村子的实际问题，怎么能让村子拥有自己“造血”的能力，才是检验脱贫成果的标准。

“以前进村只有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现在变柏油路啦。”任二红说。总书记到访后

的两年多来，村子里最大、最实际的变化是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得到了改进。2013年，驻河北的38集团军战士来到这里，给村子铺出一条柏油路，之后还在路边陆续立起了多个靠太阳能发电的路灯。去年，骆驼湾还完成了自来水管改造，每户人家都能用上自来水。

“有路，车、人和物资才能进来；有水，才能改造农田。”任二红说。在他看来，这些是实现“造血”功能的基础条件。

任二红所说的农田改造，指的是村里发展农业经济的新举措。2015年初，村里辟出了两块共100亩面积的耕地，作为苹果种植基地。“省里的农业专家说我们这里海拔适合种苹果，口味和产量都会不错，应该不愁销路。”任二红说。

新任骆驼湾村党支部书记陈国进也认为，苹果种植园应该是未来改变村民收入的重点项目之一。陈国进原本是骆驼湾村所属的龙泉关镇林厂的厂长。因为镇里研究后认为，骆驼湾村若要脱贫，必须依靠山林资源，而陈国进懂林业，所以就派他来兼职，从2015年2月起，接替退下来的老支书。

↑ 和两年前习近平到来时一样，唐荣斌夫妇仍然住在那栋破旧的土坯房里，不同的是，西侧床边墙上添了几幅中共领导人的宣传画。

站在山头上，陈国进指着一片片插在土地上的纤细枝木说，“这是今年开春后，村合作社在省农科院派来的专家指导下种的苹果树苗，预计三年后有收成。”

“种植园的土地是经过流转来的。”陈国进说，土地流转，村民可获补贴800元每亩，按照计划，等三年后销售苹果有了收益，村民还可获得20%的分红。

按照陈国进的计划，苹果种植基地还要深入开发，未来计划在苹果树下种植柴胡、黄连茶等中药材。为此，村里已经在地势较高处修建了蓄水池，方便引水灌溉。将来还要打井，并开辟出更多的地种苹果。另外，村后山还有一片核桃林，但是因为地势偏僻，没有路，施肥和灌溉困难，产量很低。陈国进计划将通往核桃林的路铺平，把水电都通上去，提高产量。

不过，在陈国进看来，发展传统农业顶多可以脱贫，想要致富，从根本上改变村民的生活水平，还是要引进新产业、发展服务业。俗话说“靠山吃山”，最佳途径就是发展旅游业。

前些年，邻近的天生桥镇开发了“天生桥瀑布”旅游景点，每逢节假日便游客爆满，着实给村子带来不少收益。骆驼湾村不远处的辽道背，同样风景秀丽，植被保护得好，虽一直未被开发，也经常有“驴友”慕名而来。村镇领导都觉得，如果就势开发成旅游小镇，一定能为村子带来不小的收益。

“2014年天津泰达曾经派人过来考察过几次，说是有意开发。”任二红说，村民们对此充满期待。

陈国进等村干部都希望，能够拉到好项目“吸引年轻人回来”。龙泉关镇主管扶贫工作的马吉军也表示，今年，阜平县被列入金融改革试点县，将开展惠农担保贷款、惠农保险业务，可以一定程度地解决村子在以往发展中因为缺少担保而难以从银行贷到款的困难，弥补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

陈国进还告诉《凤凰周刊》，为了配合旅游开发，今年村里计划给所有村户的院落进行整修，方便开展农家乐。记者看到，很多院子已经修整好，有的铺了石砖，有的抹了水泥，每户院子都留出一片空地种植花草。至于费用，“一部分由村里统筹，一部分由村民承担。”

阜平县一直对媒体保持低调，因为总书记考察后，省里的领导曾经嘱咐，现在全国都看着这里，你们一定要低调，多做事、少说话，等有了成绩再宣传也不迟。

唐荣斌家前后邻居的院子都已改造完成，只有他家还没动。陈国进告诉记者，迟迟不动是因为考虑到，“毕竟是总书记考察过的地方，修成什么样要慎重。如果修得不好，影响也不好。”

低调而艰难：注定长期的脱贫攻坚

“谢谢你们的关心，但是领导交代，真的不能接受采访。”面对特意登门拜访的《凤凰周刊》记者，阜平县委宣传部的一位工作人员面露难色。

从2015年4月起，记者多次致电、发邮件、传真，甚至亲自登门，希望就骆驼湾村乃至整个阜平县正在进行的脱贫攻坚战采访阜平县委、县政府，但均被婉拒。

一位接近县委县政府的人士告诉记者，两年来，县里一直对媒体保持低调，因为总书记考察后，更高层级的（省里的）领导曾经嘱咐，现在全国都看着这里，你们一定要低调，多做事、少说话，等有了成绩再宣传也不迟。

总书记的到访，让骆驼湾村和阜平县一夜之间获得全国性的关注，大家都希望看到这个贫困地区的典型能够早日脱贫致富。但贫困既然是长期形成的，也不可能在短期之内轻易消除。对此，阜平县官方有着清醒的认识。

作为国家级贫困县，阜平县一直位于河北省一百三十多个县市经济排名的倒数十名之内，有很多个骆驼湾一样困穷的村子。

“造血”功能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

《凤凰周刊》记者从多位阜平县本地人口中了解到，阜平县为了脱贫一直在努力和尝试，但是地理位置等条件先天不足，决定了找出有效的“出路”实在艰难。

前些年，看到毗邻的山西省发展煤炭业，

县里也计划利用晋煤东运的道路之便，将阜平打造成煤炭中转站，开办过煤炭营销园，也开发过煤矿、建过钢铁厂，但是这几年，煤炭行业不景气，所以效益并不理想，加之开矿涉及土地使用权、还会产生污染，所以引发诸多矛盾纠纷，很多小厂子逐渐被关停。现在，县里将生态旅游作为主力发展方向，更是注重环境保护，禁止矿产开发。

如今，阜平县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外部支持，这将为当地注定长期持续的扶贫攻坚战役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2013年，国务院扶贫办会同17个国家部、委、办、局，成立“燕山—太行山片区阜平试点”协调小组，负责协调推进阜平县扶贫攻坚工作。同年7月，国家旅游局还正式授予阜平县为国家旅游扶贫试验区。

交通部、财政部、农业部、国家林业总局、国家气象局、国家文物局等部委，也在政策和资金上都给予支持。据大陆媒体报道，仅2013年一年，阜平县获得专项资金就高达12.61亿元，是当地年财政收入（2.38亿元）的数倍。

当然，来自北京的重视也让省、市、县、乡各级政府承受了不小压力。河北省专门针对阜平成立了扶贫攻坚领导小组和阜平扶贫攻坚指挥部，由省委副书记任组长，保定市市长任指挥长。河北省委、保定市委还决定派出驻村工作组对阜平进行为期三年的帮扶。

“不光村民着急，干部们更急呢！谁不想尽快看到实实在在的成绩呢？”上述阜平县委人士说。对阜平官方来说，最显眼的一个担忧是，两年多来，县里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很多项目比如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一段时间之后才能见到成效。

虽然面对媒体不愿多说，但是记者还是在阜平县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发现了一些阜平县取得的成绩和面对的困难。

2015年4月18日阜平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代县长刘靖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将2014年称作阜平扶贫攻坚纵深推进、卓有成效的一年。“全县坚持脱贫与建小康两步并作一步走。但是当前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不足和问题需要解决，如立县产业项目少，园区承载能力弱，富民产业规模小、效益低等。”焦虑与难处显而易见。

报告还将2015年定位为阜平实现“三年大见成效”目标，转入“五年稳定脱贫”阶段的关键之年。

“若不尽快脱贫，年轻人都走光，再过几年，骆驼湾也会像其他村子一样，慢慢自然消亡了。”一位骆驼湾村民说。

□ 编辑 李光 □ 美编 黄静



大学生创业热调查

经济下行，就业压力凸显。在此背景下，大陆政府力推大学生创业，其效果还有待市场检验。

记者/马军

今年夏天，莫萃岛刚刚从清华大学新闻系毕业，手上已有两个创业项目：一个名为FRANKMOK的服装品牌，以及一个名为“光圈”的手机社交应用APP。根据莫萃岛的观察，和他一样从清华毕业即创业的同学不下10%，创业成为继读研、出国和就业之外，清华毕业生的又一选项，并逐步掀起热潮。

“FRANKMOK是我自己原创的品牌，品牌塑造和营销都用了互联网思维，光圈则是我跟着几个学长一起做的项目”，新闻系出身的莫萃岛无论是选择进入手机应用领域，还是将传统行业与互联网思维联系起来，都是看中了国家近年来对“互联网+”领域的投入和推动。在莫萃岛的清华创业者圈子里，有一多半的创业者都在从事互联网领域的创业。

去年开始，大陆官方掀起一股鼓励大学生创业的热潮，教育部提出鼓励大学生“休学创业”的种种措施。今年上半年，大陆官媒中央电视台播出了“90后”大学生创业者余佳文凭借一款手机应用身价上亿的消息，更是点燃了民间对大学生创业热潮的关注。

在某些媒体上，大学生创业甚至背上了促进中国经济顺利转型的沉重“历史使命”。但实际上，无论是从创业人数，还是创业的领域和成功率，中国大学生创业热潮都才刚刚起步，中国社会为大学生建设更好的创业环境还任重道远。

“还是有一点水分的”

“1.2%，这是总理来我校视察的时候，我们向总理汇报的数据。实际上，这个数据还是有一点水分的”。东部某省某知名

高校创业指导部门负责人李玫（化名）在回忆起今年年初接待李克强总理视察时，对《凤凰周刊》记者表示道。根据该校创业指导中心统计，2014年该校的6000多名毕业生中，有84个同学选择创业，占整体就业比例的1.2%。

虽然在官方媒体的报道中，中国大学生创业已成风潮，但数据显示，中国大学生创业比例还很低，更不能称之为“风潮”。大陆官媒新华社消息称，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再创新高，达749万人，而往年仅有1%左右的大学毕业生选择创业。

然而，在这样艰困的情势下，人社部、教育部等9部门却将“4年内引领全国80万大学生创业”作为其联合实施的新一轮“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的目标。

对此，教育部在去年12月发布的《关于做好2015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中坦承，2015年宏观就业形势面临多重压力，高校毕业生规模进一步加大，就业创业工作任务十分艰巨。因此，教育部要求强化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大学生就业创业比例。

“在中国，无论是政府效率、公平的商业环境以及融资的便捷程度，真正形成大学生创业风潮的也就是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常年研究中国大学生创业生态的哈尔滨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教师杨修表示。

中国社科院网站发表的《教师对大学生创业态度的实证研究》显示，高校教师对于大学生创业的态度较为谨慎。大部分教师认为缺乏经验是阻碍大学生创业最主要的原因（69.8%），其次是缺乏社会关系（62.1%）和缺乏资金（58.4%）。大学生自身缺乏风险意识（43.8%）、心理承受能力不够（40.3%）也是教师们认为阻碍大学生创业比较重要的原因。

《凤凰周刊》记者走访发现，在北京诸如中国传媒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一本高校的创业者中，占大多数的还是补习教育、餐饮、服装等传统行业。而根据教育部直属75所大学公布的《2014

年毕业生就业报告》，仅有7所高校将“创业”单独作为项目对毕业生走向进行统计。而且，大学毕业生创业比例很低：中央财经大学3000名毕业生中仅有5人创业，兰州大学5000名毕业生中创业者只有7人……

有关人士认为，官方力推大学生创业，其背后是中国经济下行造成的严峻就业压力。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GDP增长7.4%，预计2015年GDP增长7%左右，新增就业人口1000万人。按同等就业人口计算，除去升学、出国深造等路径，2015年仅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人数就超过了全部新增就业人口的一半。

与中国大学生就业压力大并存的一个问题是，由于体制、产权等问题的桎梏，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率比较低。以成都为例：成都市拥有53所大学，重点学科超过60个，在校大学生70万人，每年毕业生28万人，对于人口1400万的成都市来说就业压力很大。但与此同时，成都市高校的科技转化率仅有10%左右，高校科研成果既无法转化成真金白银的GDP，更无法为社会创造就业机会。

“以前，大学教授和研究生在学校的发明，知识产权归学校所有，现在我们放开了政策，增加了教师和研究生的收益比例，鼓励他们拿着自己的发明去市场上融资创

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再创新高，达749万人，而往年仅有1%左右的大学毕业生选择创业。

业，这样既能够多转化‘睡’在实验室的那些发明，也能让教师和学生多赚到钱”，成都市科技局局长唐华表示。

但在职业投资人看来，在整体缺乏创业环境的中国，这种政策的成效也比较有限。“政府这种做法是对的，但是由于太多的高校师生，尤其是理工科师生缺乏商业的基本知识，他们的发明很难转化为经济效益”，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风险投资人对《凤凰周刊》表示，“现在政府推动大学生创业，好多院校和科研院所开始陆续找

到我们要投资，但是他们连最基本的商业计划书都不会写，直接把学术论文丢给我们，我们接触到的‘奇葩’案例里，大多数都来自于这种情况”。

“我看到过一个案例，一个研究生代表他导师来找我谈投资，说他的项目能够颠覆整个中国石油行业，路数跟当年‘水变油’的骗局非常像”。该投资人表示，中国风险投资界实际上非常重视大学内部发明的转化，但情况并不如人意：“我们也知道，高校很多的发明都是为了写一篇论文评职称，从一开始就没有考虑过将来有一天投放到市场去，如今政府鼓励大学生创业，大家都想试试拿这些东西变现，创业哪有这么容易？”

政府是第一推手

李玫今年只有25岁，但已经是其所在高校创业指导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创业工作原本是该校就业指导中心的一个小部门负责，但在大学生创业的热潮下，去年独立成为和就业指导中心平级的行政单位。

在目前的高校大学生创业指导过程中，行政手段依然是最大推手。近两年来，中央和各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众多扶持大学生创业的优惠政策，涵盖税收、社保、工商注册、贷款、财政补贴、学籍管理、创业指

导等方面。如国务院办公厅在5月4日发布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中就提出，将高校创业课程纳入学分管理。

莫萃岛介绍，清华大学的创业课程是2个学分的校选课，他的团队中就有成员选修了这门课，并不存在“政治任务”。但是在其他高校，就存在着为“数据”进行任务摊派的现象。

“我们学校目前有一个创业园，今年8月要按照上级的意思更名为‘众创空间’”，李玫

表示，“此外，按照上级要求，我们还请创业成功者和投资人在学校开了课，设置了三个学分。省里面要求我们每年必须完成500人听课的任务，因为有学分可以拿，所以这个任务还算比较好完成。但是估计接下来上面还会要求我们每年必须促成五笔以上的投融资，这个任务估计就比较难了。”

在全国各地，将学分与创业挂钩，已经成为了政府鼓励大学生创业的“标配”。各地政府为了提升创业领域政绩，也放宽了对“大学生”这一身份的认证：以天津市为例，原本最多只可休学两年的在校大学生，如果创业，休学期可以延长至4-6年，并且给予学分奖励。此外，政府将大学生（不限毕业地）创业扶持期由原来的3年延长至7年，换句话说，只要是大学文凭、30岁以下的创业者在天津市都会被视作是大学生创业，不仅能够得到政策扶植，还能拿到天津市户口。

实际上，李玫所在的学校还算是较早成立创业指导中心的院校。中部省份某985高校毕业的一位创业者向《凤凰周刊》记者表示，其母校在省内也是属一属二的高校，至今尚未成立专门的部门指导大学生创业工作，仅是将学校内部的几个店面低价承包给毕业生用于经营，在该高校的对外文宣上，这几个店面被命名为该校的“创业大街”，成为本校扶持大学生创业的成绩。

而在北京市中关村创业大街上，也仅有北大、清华两家院校的创业指导部门进驻，位于大街中部的“北京高校大学生创业服务中心”在今年三月挂牌成立，但直至七月底，仍无人入驻，甚至看不出有即将装修的迹象。

政府的强力推动，对各高校形成创业文化、提高大学生创新能力有着明显作用。麦肯锡研究院《2015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在国家对大学生创新创业政策的支持下，高校对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成果开始显现。一年前有创业意愿的学生占在校学生总数的3.2%，今年已经翻倍，到了6.4%。

但同时，政府的强力推动、官媒的持续宣传也让整个大学生创业心态出现了误区

与扭曲。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引导之下，舆论几乎将大学生创业等同于高科技创业，在李政的学校，学校扶持的项目中有60%以上都是互联网和高科技企业，很多传统行业不被学校纳入到统计范围。“因为国家和学校现在都在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们也自然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创新的项目上。”

而该校一位创业者向记者表示：“60%的互联网企业只是数据看上去好看，学校把很多传统行业不算入统计范围，为的就是做一个好看的数据出来。”实际上，该校毕业生创业仍集中在传统行业。

根据智联招聘网站给出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大学生创业项目中，最流行的并非科技、金融等“高大上”的创新项目，有超过一半的学生认为，会把“送外卖”这种“接地气”的工作当做是自己的创业首选。2014年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集中的行业是教育业(13.0%)和零售业(11.1%)。从原因来看，就业困难不是毕业生选择创业的最主要原因，大学毕业生的第一创业动因是“理想成为创业者”，“有好的创业项目”。

对此，新东方集团创办人俞敏洪对媒体表示，在他见过的大学生创业者中，仅有5%的项目存在着创新。但俞同样认为，即使在美国，创新项目占整个创业项目也是大概这个比例，对于大学生团体的创业，过度讲求创新并非好事。

与创新能力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大学生创业项目同质化严重，这是导致创业成功率极低的一个主要原因。如社交APP“陌陌”在美国上市后，国内短时间内就出现了成千上万的类似社交APP，完全不考虑市场等因素。

在职业投资人李远(化名)看来，目前的中国大学生创业走入了一个十字路口。如果这轮创业潮成功了，中国又多了几家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级别的公司，那无论是对创业者本身，还是对整个国家的经济转型，都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如果这轮创业潮失败了，也许会坑了一部分创业者，这些人三十几岁再进入市场时，竞争力会是一个问题。但作为高校



教师，杨修更担忧的是行政力量推动下，中国是否能够形成真正的创业氛围？

“我有一个同学，985高校毕业，毕业后去了东北一个省会城市工作，在政府没有大规模推‘互联网+’概念时，他认为风险投资行业就是传销，跟骗子没什么区别。如今我这个同学被上级安排指导当地青年的创业工作，可以说是什么都不懂，一有事情就打电话问我。”李远已经不知道多少次被同学叫去担任创业大赛的评委，他认为，如果地方政府还是按照老思路，只靠盖几座楼，办一些不疼不痒的讲座和比赛，是无助于打造青年创业环境的。

不应是“全民运动”

28岁的方鼎(化名)从美国退学后，回国创办了一家科技公司，制作一款手机APP。方鼎认为，他和他身边的一些创业者都是一些不愿意考公务员、不愿意进外企、不愿意给别人打工的社会“边缘人”。在方鼎看来，乔布斯、比尔·盖茨、马云和马化腾都是他眼中的“边缘人”。

持同样看法的还有杨修。杨修表示，中国目前青年的创业成功概率还是很低，不论是从事业的角度，还是从个人发展的角度，创业都不应该是一项“全民运动”。

根据杨修的统计，中国大学毕业生创业成功者，绝大多数为高学历者、官二代、富二代。杨修认为，这些青年起点高，接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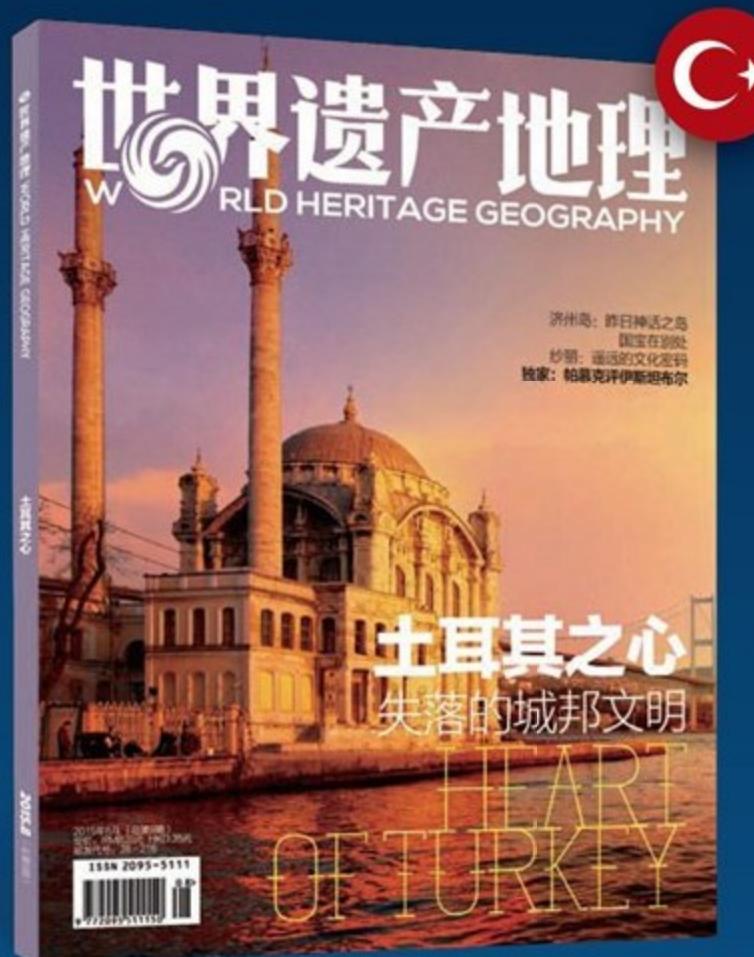
互联网早，视野也开阔，即使创业不成功，也有退路。而家里经营医药生意的方鼎，正是杨修眼中的富二代。

在中国的青年创业者中，存在着一个有趣的悖论：家境殷实的青年创业成功率较高，但其中以套现为创业目的的比例也较高；无背景、低学历的创业者成功率较低，但真正把心思放在产品上的往往是这个群体。换句话说，产品做死了不意味着创业者赚不到钱，一心做好产品也不意味着一定能赚到钱。创业致富，这一被视作是打破阶层流动的最佳手段，居然也陷入了富者恒富，贫者恒贫的“马太效应”。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投资基金经理向《凤凰周刊》解释道，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投资圈的特有逻辑。“在政府鼓吹大学生创业的风口上，投资变成了股市一样的博傻行业，比如一家天使投资机构花100万投了一个大学生创业项目，他的目的不是等这个项目赚钱回收投资，而是等这个项目名气大了、下一笔更大投资进来之后变现离场，即使这个项目最后做死了，只要你不是最后一笔投资，你就不会亏钱，甚至还能赚好几倍。”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大学生创业才会出现一种与现实不符的浮夸风。大家热衷的不是项目本身，而是讲故事，只要故事讲得好，下一笔投资就会到位，创始人和之前的投资方就能随时提现走人。那些一心扑在项目上的创业者，反而会随着项目的失败陷入破产的窘境，因为毕竟大学生创业成功率实在是不高”。这位投资经理表示，“你看网上疯传的身价上亿的‘90后’总裁，那就是包装出来的，也许投资商只拿了200万元投资他，占有他10%的股份。但这个数字可能会被故意炒作到1000万元占10%股份，这样一来他自然就身价上亿了”。

“只可惜，这个道理只有那些人脉资源丰富的‘二代’们懂，反而那些怀揣创业梦想一心想做点东西出来的草根创业者们不懂，很容易掉到坑里。”讲到这里，这名投资经理一声叹息。



TURKEY

探寻失落的城邦文明 揭开土耳其的神秘



在这里

出你的私属之旅

微信号:jycd

伊斯坦布尔：失落的城邦文明 / 博德鲁姆：罗马文明与骑士文化的碰撞
番红花城：大帝国的袖珍礼盒 / 济州岛：昨日神话之岛
国宝在别处 / 纱丽：遥远的文化密码

为遗产预约未来
RESERVE FUTURE FOR HERITAGE

“大师”王林的建寺大业

这里一度是王林与显贵往来，甚至聚敛钱款的重要活动场所，它们的兴建和落成，纠结着王林的精明和矛盾，是他游走江湖数十年的浓缩剧。

记者/郭天力

一场大雨之后，闷热再次将芦溪包裹起来。位于芦溪城北圣岗岭上的两座寺庙，像往日一样访客寥寥。

这两座庙一座叫圣岗寺，旁边紧挨着的叫建勋寺。两座寺庙在王林那座著名“王府”的东北面，距离不过几百米。作为显赫一时的“气功大师”，王林的名字和他的特异功能在过去两年传遍大陆南北。

他一度也是在政商两界呼风唤雨、教人趋利避凶的超级掮客。原本，他的错综复杂的人际交往和帝王般的生活隐秘无闻，普通人无缘窥视，但这份低调被2013年7月底的一次会客活动打乱。当天，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和知名影视演员赵薇造访他幽深阔大的私宅，“大师”王林从此被闪光灯不断拍摄。

王林生于江西省萍乡市东部小城芦溪，曾因多种罪名入狱15年。坐牢是他一生挥之不去的污点，也是他结交三六九等的机遇。有报道称，在监狱期间他凭借教狱警杂耍技巧把自己包装为气功大师，并借此接触到了政法系统的大小官员。后来，他取得了香港身份，又回到了出生地芦溪，乃至在这里收下关门弟子邹勇，与他结缘，终又结怨。

他们师徒二人的恩怨纠葛引发舆论大哗。王林头顶上的“大师”光环，也随着报道的一步步深入逐渐黯淡。他涉嫌的非法行医、非法持枪等罪名，被媒体持续追踪。2015年7月15日，王林因涉嫌弟子邹勇命案被警方羁押。

回顾王林的种种生意和人际结交，大多在芦溪的这两座寺庙里留下印记。这里



建勋寺大门。门口的狮子原本在王林的“王府”门前，后移至建勋寺。

一度是王林与显贵往来，甚至聚敛钱款的重要活动场所，它们的兴建和落成，纠结着王林的精明和矛盾，是他游走江湖数十年的浓缩剧。

庙里的和尚

圣岗岭上原本只有圣岗寺。当地的宗教研究者陈上吉收集的史料显示，圣岗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原本为纪念东晋将军甘卓而建。实为道观，并不奉佛，只是当地人见神就拜，将佛道混为一谈。圣岗寺原本规模不大，仅有山门和院中一列堂舍，但一直香火不断，直到文革时期被彻底拆毁。1986年，当地各村集资重建寺庙，村民们又有了上香的地方。

李文清住在旁边的牌坊下村，常常到

寺里参拜。1996年的一天，他正在街头散步，忽然前方一辆从没见过的小轿车冲他呼啸而来，又在距他很近的地方急刹车停住，车窗伸出一个脑袋对他笑：“这不是李文清吗？还记得我不，我是王林。”

这是李文清记忆里第一次见到“发了财”的王林回村。李文清曾和王林一起上过3年小学，之后多年未见，“只知道他曾进了监狱，出来后很快发了财”。第二年，王林来到圣岗寺告诉守庙的村民们，他准备把寺庙拆了重建，并请和尚过来住持。

和尚这个词，在王林曾经的弟子邹勇口中，是王林童年不甚光彩的记忆：“（王林）养母和庙里和尚关系暧昧，那个和尚教给他五花八门的手艺。”这些杂耍手艺成为王林后来进入杂技团的启蒙教育，且是他富贵的源

头——乘着上世纪80年代中国气功热潮，王林把自己包装为气功大师，开诊所为达官显贵们治病。赚得第一桶金后，他又投入90年代的海南房地产淘金潮，那轮退潮后，王林

“衣锦还乡”，回到芦溪，出现了李文清记忆中的那一幕。

村民们和王林商议重建寺庙的结果是，将圣岗寺重建，拆除和重建的费用由王林负责，但建好后仍由村民管理。作为交换，王林可以以扩建圣岗寺的名义，在旁另建新寺，也就是此后的建勋寺。

政商都烧香

2000年元旦，圣岗寺落成，一面山墙上刻着《圣岗寺记》：“王林先生，乃中华异士也，桑梓之情，常存拳拳”。在先期建成的“圣岗古寺”墙壁上，刻有14个捐款者姓名。这些捐款者来自香港、宁波、海南等地，以外地商人为主，尚未见本地商人和官方人士署名。一位参与此事的村民回忆，重建圣岗寺时，邹勇等当地富商还未完全进入王林的朋友圈。

5年后，规模更大的建勋寺开始建设，并于2009年9月19日落成。建勋寺占地约50亩，是圣岗寺的5倍。前后共三座大殿，每座大殿前均有形制不同的香炉数个，有的是铁制，有的

是紫铜。香炉上刻有全国各地的捐款者姓名，但是均未标明捐款的具体金额，仅仅粗略称为“巨额捐款”。多数圣岗寺墙上捐款者的名字也仍出现在建勋寺。

在萍乡本地商人中，邹勇曾捐献巨款。邹勇与王林初次相识于2002年的一次普通饭局，两人在此后的13年中关系逐渐升温，在进入沸点后，最终势同水火。邹勇的前妻李芦萍向《凤凰周刊》记者回忆，邹勇曾向建勋寺捐过不少钱。邹、王两人闹翻之后，曾于去年有过最后一次对话。媒体曝光的对话录音显示，邹勇曾捐出20公斤黄金给王林。王林称用这些黄金塑了佛像。以2006年金价约为150元计算，邹勇至少捐助了300万元。

除了商人，因捐献巨款而在建勋寺留下名字的还有不少地方官员和国企负责人，包括沿海某市的一位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另有大陆媒体报道，广东省政协原主席朱明国任职广东省委副书记期间，梁锦华曾与朱一起到芦溪王林家中拜访。朱明国在海南任职时被人举报，遭遇仕途危机，委托王林助其化解危机，朱在顺利过关之后，见到王林时即当众下跪。但王林的“法力”显然没能始终庇佑朱明国，2012年11月28



日，中纪委宣布朱明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来自海南的陈锋也是建勋寺的金主。陈锋曾是大陆知名航企海南航空董事长。王林在自费出版的书中描述：陈锋对其非常仰慕，他曾在陈锋的总裁办公室里“高谈阔论，总裁（书中的错别字，应为‘裁’）听得句句入神，频频称道。”值得一提的是，陈锋捐款建寺后的2007年，辞去海航董事长职务。

谭曙耀在香炉上被注明为湖南朋友，这个名字也曾出现在王林公布的一份与邹勇经济纠纷的材料中：“找到我的朋友唐建国、谭曙耀作见证”。谭曙耀本为萍乡一企业老总，后来出任萍乡市公安局缉毒支队政委，可谓大幅度“转身”。芦溪县财政局局长吴启循也是留有姓名的捐助者，本刊记者数次致电已退休的吴启循，但此人电话始终处于“转入秘书台”状态，记者给其发短信亦未见回复。

大小香炉之外，“建勋殿”前的一块石碑上刻有十几位捐赠者的名字，其中最醒目的是被尊为“北京善主”的王菲和李亚鹏。

除了这些有名有姓的捐助者，王林还获得了其他隐秘捐款。其中一笔230万元的捐款，可能涉及湖南省怀通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原经理余小年受贿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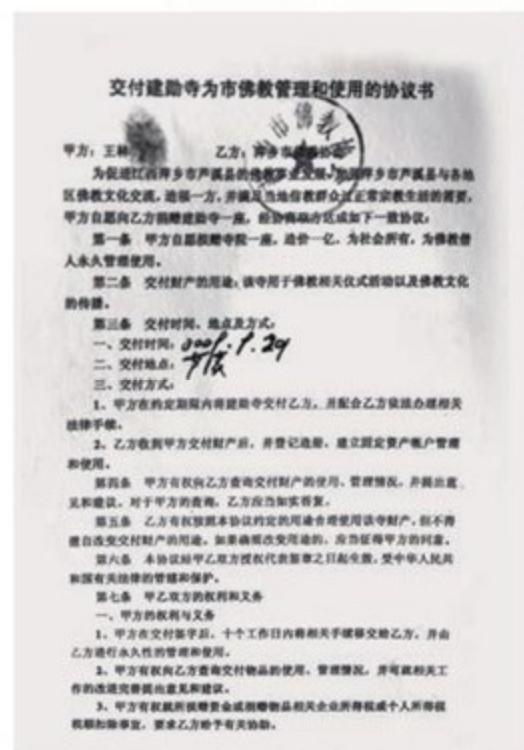
这座名流显贵云集的建勋寺在当地百



姓中却没有影响力，几乎没有周边村民去上香，以致于记者在街头问询建勋寺，一些老人摇头称从未听说。建勋寺之名由来如何，目前无人知晓，王林的资料中，与“建勋”二字有关的是其早年在深圳开办的一个公司中，有一名叫刘建勋的自然人股东。该公司是王林离开南昌，南下深圳发展后成立。工商注册信息显示，深圳市科豹事业发展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为王林，王林占股47%，刘建勋持股51%，另外一人持有剩余股份。

开光仪式的10元午餐

建勋寺修建初期曾在周边村中大规模征地。牌坊下村的村民告诉记者，当时这一带有大片的坟地，王林建寺首先要迁坟。王林儿时的玩伴宋儒生（化名）回忆，他家在圣岗岭上有两个坟地，当年他向王林提出了两万元的迁坟费用。“王林把钱给了我，但是指着我的鼻子骂我说：你今天朝我要两万块，改天我要搞死你！”



王林和他的客人们在开光仪式结束后去了高档酒店，让其他人在现场吃露天饭，而且，还要每人交10元饭钱。

寺院建成后，王林不遗余力地举行了盛大的开光仪式。2009年9月19日，赵薇、李冰冰、谭晶等影视歌明星来到现场，政界高官则是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宋晨光前来捧场，中国佛教协会也寄来了贺信。当天芦溪动用了大量警力维持治安。

当日的场景至今仍被芦溪本地民众反复回忆：当天，王林容光焕发，一手拿着一个金灿灿的小佛像，一手拿着DV机到处拍摄。建勋寺有三个大殿：建勋殿、大雄宝殿和观音殿，并配有东西两侧僧房，各种设施一应俱全。邹勇和他的妻子李芦萍也在开光现场，并在仪式结束之后与那些平时只能在电视中看到的人物共进午餐。见证了此次开光仪式的邹勇，在三个月后带着333,333元现金，正式投入到王林门下，学习用小板凳敲后背的法术修炼。

建勋寺大门外，早早摆上了100多张桌子。“当时王林估计现场能来一千多人，所以准备了100多个桌子。”当日赴宴的芦溪人李晓光记得，“王林和他的客人们在仪式结束后去了高档酒店，让其他人在现场吃露天饭，而且，还要每人交10元饭钱。大家一看中午的饭菜没什么油水，还要交钱，就纷纷离开。”李晓光回忆，主持者一看场面尴尬，赶紧说不要饭费了，这才坐够五十来桌。这座寺院一直没能给王林在当地民众心中增加名望：“王林总说他捐建了寺庙，”一位村民颇有不满，“实际上他从中究竟得了多少便宜，外人谁知道？”

大陆媒体曾报道王林把修建勋寺的工程承包出去牟利，《凤凰周刊》记者了解到，在建勋寺4年的建设中，至少有湖北和福建的两家一级承建商参与，一位业内人士介绍，寺庙工程与普通工程不同，工程招投标缺乏有效管理，暗箱操作的地方很多，且建勋寺无法查询到任何承包单位信息。

香炉长了草

萍乡市佛教协会一位法师告诉《凤凰周刊》，根据大陆有关规定，佛教建筑的新建和改扩建，均应由地方佛协出具相关手续，向宗教局提出申请，并报送上级同意。

但是建勋寺的建设中，地方佛协几乎没有出具任何手续。但“既然建起来了，也是弘法的好事，我们也便接受了这一事实。”至于萍乡民宗局向上级报备的细节，该局以话题敏感为由婉拒采访。

2009年8月，王林和萍乡市佛教协会签订了一个协议，协议中称建勋寺造价1个亿，王林将此寺庙捐献给萍乡市佛教协会。一位当地佛协的工作人员向《凤凰周刊》介绍，开光仪式后，萍乡佛协延请了法师前往住持。同时，王林也委派了他一个亲属担任保安员。但是，法师一方和王林亲属时生龃龉，后来法师及其余僧众全部退出建勋寺。王林自己又找了一位和尚前往住持，“目前在建勋寺的僧众均未按照规定在萍乡佛协备案。”

寺庙门口张贴的告示显示，寺庙内本有僧侣6人，但记者采访的几天中，寺庙中连6人也不够。僧侣们对来访者并不欢迎，只说没有见过王林，王林之前在寺中的亲属也数月未曾出现。寺庙里几个写有捐款者名字的香炉里如今长满杂草，一座大殿里的电子音响循环播放出单调的念佛声。

在深受舆论冲击时，“芦溪官员找到王林，让他把‘王府’门口的石狮子搬走”，一位曾与王林有过往来的人士称，“这次王林没有发火，只悄悄地让人把石狮子搬到了建勋寺门口。”而这里也完全没了人气。可即使在王林的形象濒于崩溃时，芦溪当地仍然对王林抱有幻想，“去年年底，芦溪县官方的人还专程去深圳找王林，希望王林回来在武功山再捐一座道观，连名字都想好了，叫济公庙。但是王林和邹勇正打的不可开交，哪里还有心思管这些？更何况，即便王林想建，当年捐建勋寺的朋友们，谁还会给他钱？”

当地民众再次听到王林的消息时，他正陷入了邹勇的命案中。2015年7月15日，准备回到江西宜春与一干知青好友团聚的王林，在宾馆内被警方羁押。彼时他的“功法”没有施展，建勋寺里那些刻着名字的贵人们也沉默无言。◎ 编辑 路琰 □ 制图 美编 黄静

大师“门客”与权贵“门生”

打着各路神仙幌子招摇撞骗的“大师”，与权贵者之间形成一张“门客”和“门生”的关系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记者 / 刘荣

“气功大师”王林的大戏，在喧嚣两年过后终于落幕，看客们似乎仍意犹未尽。毕竟，无论何时，像王林这般打着气功的幌子招摇撞骗的“大师”，在政商学娱各界通吃的现象，总是不多见的。

王林的朋友圈中，位高权重、声名显赫者之众之精，令人咂舌。不独王林，前些年的道长李一、“国师”曹永正，以及更早期1980年代的诸多“气功大师”，都有着最上层的社会关系网络。从来难登大雅之堂的巫婆神汉，成为官商顶级俱乐部的会员。

如果深入剖析“大师”与权贵们的交往过程，可发现他们之间撑起了一张“门客”与“门生”的关系网，互相依附、互相利用，水涨船高。“大师”们投至权贵门下充当“门客”，从而获取垄断资源和利益，而更低层级的官商或社会名流，投至“大师”门下充当“门生”，在“大师”提供的平台上各擅胜场，形成立交圈。

自春秋战国始，中国就有“门下客”之说。客投主，主纳客，都有明显的义利之想，以对方的独特资源和利用价值为求。尤其是门客的效力，很大程度取决于权力能带来多大的想象与实现。从“王府”占据两层大墙的名人合照，以及王林一再强调自己与众多权富明星的结交经历来看，他十分清楚“合影经济”价值几何。

在他自费出版的重达8斤的《中国人》影集中，收录了他与党政军各级官员、明星与社会名流的623张合影。由公安部前党委副书记田期玉撰序，包括多名省部级官员及央企老总、数十名各地军区与武警部队高级军官和中央领导人直系亲属；还有邵逸

如果深入剖析“大师”与权贵们的交往过程，可发现他们之间撑起了一张“门客”与“门生”的关系网，互相依附、互相利用，水涨船高。

夫、郑裕彤等富商，以及外国名流如印尼的苏哈托。伪大师们在后改革时代受到了精英阶层的信任和保护，十分类似于一种门客与主人基于互惠的选择。

古来门客，良莠不齐，有苏秦、张仪这样合纵连横的座上客，也有孟尝君豢养的“鸡鸣狗盗”之徒。主人选择门客，基于名气和能力，还看重回馈的价值。而王林这类“大师”，今日作为权贵门客的价值，更像是一个整合高端资源的平台。除了观赏气功表演、治病，往往还要求开示算命，更重要的是拉拢人脉，结交朋党，搞项目，托关系。

“大师”通过将自身“工具化”，达成与权贵之间豢养与被豢养的关系。逐利之本质，大类学者王学泰笔下的江湖“游民”，都是游荡于社会边缘的人，寻找自己的归属；但是不同于追求道德自律的“士”，门客基于买卖关系，流动性很大，与权力方并未进行紧密联合。因此，虽然王林与刘志军以及原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宋晨光关系很好，然而，当两位权贵先后倒台入狱，树倒猢狲散，王林却依然在自己的“王府”中享受着名利兼收的快乐，不受牵连。

拉开出入“王府”的名流名单，不难发现，并非所有“大师”的簇拥者都欠缺理性意识

和科学常识，但他们最终成为了为“大师”站台的“门生”。相当多的名人最初可能是基于对“大师”外包装的好奇踏进“王府”，上一位名人的引荐会加大下一位名人的信任，一而再再而三，形成雪球效应。坐收渔利的“大师”，借着“名人合影”，名声一再被强化和扩大。

由于无信仰传统和缺乏权力制约，使得享受了既得利益成果的权贵，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中国权富的盲信和迷信已不是秘密。2010年，中组部要求2000多名司局级官员年内在7所院校完成至少40个学分的选课任务，报名人数最多的分别是“周易智慧”、“道家思想与老庄智慧”和“佛教禅宗与人生”。

在没有宗教信仰的环境中，以“术数”为主的风水、命理、法术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放大企业家和官员的内心依赖，如此紧密地与“权力”联系在一起。长期置身权力崇拜中的权贵们，极易转为另一种个人崇拜，当“大师”们用各种高明的“神通”消解了权贵者最初的心理戒备，取得了信任，权贵们会自觉地在心理上产生对“大师”的依赖和崇拜，所以企业家邹勇等人会不惜巨资拜倒在王林门下，成为其弟子“门生”。

在王林的现实中，追求权力财富稳固也好，追求精神解脱也罢，在这些各怀所需的“门生”中，当红明星、企业家和政客纷至沓来，“大师”只要能用个人魅力满足权富们的心理期待，就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老师”与“门生”的关系。权贵们不问苍生，问的是鬼神。然而，“大师”王林非但保不了“门生”的安稳，自己也沦为阶下囚。◎

社交软件或增加性工作者被害风险



赵军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教授

过去，“高级会所、桑拿、洗浴中心、发廊、小休闲”等实体机构是性交易的主要平台，小姐们借以与客人结识、谈价、直至交易。五年前北京警方突袭查封“天上人间”等涉黄夜总会，拉开近几年来最大范围的扫黄序幕。警方严打之下，实体机构被查获的概率大为提高，性交易被迫转向更为隐蔽的方式。

与此同时，以微信、陌陌为代表的手机社交软件普及开来，颠覆了过往国人的社交模式。而性交易本就是一种市场行为，其从业者的市场嗅觉非常敏锐：通过手机可以直达客户，省却实体媒介的运行费用，降低性工作的经济成本。在某种程度上，这也算是顺应了

“互联网+”的时代潮流。更为现实的考量是，这种新的性工作模式降低了从业者在实体色情场所被警方查获的风险。

在警方严打与社交方式转变这两种因素的叠加影响下，性交易方式发生转变，由“线下”转为“线上”，性工作者的被害风险也大大增加。尽管目前没有针对这一特定人群犯罪的统计数据，但在我们的实地调查中，多地基层民警均有这样的感受，也破获了多起性工作者在“线上交易”过程中遭遇犯罪侵害的案件。只是这些案件没有形成新闻热点，鲜为大众所知。

性工作者被害案件频发

2014年7月5日，张某某酒后通过网上招嫖信息到达某小区1号楼931室准备进行嫖娼，后与卖淫女（独处一室，18岁）因嫖资发生口角纠纷。张某某先用手掐卖淫女的颈部，因卖淫女大声呼叫，遂张某某因害怕又持房间内的无线网络路由器的电源线将卖淫女勒死后，抢得死者钱财逃离现场。

这一典型案件是这一新趋势的反映。不过就本质来说，性工作者遭遇犯罪侵害的机理并未改变。

地下化运作使得性交易双

方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均难得到保障。尤其是更为弱势的女性性工作者群体，她们被杀害、被抢劫、被绑架、被勒索的恶性刑事案件在许多地方频繁发生，这已成为近年来困扰警方的一个重大难题。

美国犯罪学家菲尔逊和科恩的“日常行为模式理论”认为，犯罪的发生是通过以下三方面要素同时同地结合而形成的：一、潜在的犯罪人；二、合适的犯罪目标；三、足以遏制犯罪发生的监控者不在场。

就性工作者被害的具体情境而论，过去，在“一人店”、“准一人店”或“炮房”等无第三人监控监护的私密的封闭空间与客人进行性交易，以及向客人提供“出台”服务、前往客人指定的未知地点，正好满足了“足以遏制犯罪发生的监控者不在场”这一关键的被害要素。相反，那些不提供出台服务，在老板、妈咪、服务员、保安等熟人监控的状态下为客人提供性服务的性工作者，则因欠缺这一关键被害要素而极少被害。

越是脱离、不依赖实体场所，被害概率越高。这在“线上交易”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当性工作者将地点选择权交到客人手中，“单枪匹马”与客人交易

以手机社交软件为载体的线上交易日渐兴起和扫黄风暴的持续推进，正在加大性工作者的遇害风险。

时，其对性交易过程的掌控居于劣势，被害风险旋即加大。

另一方面，这种“线上交易”模式还扩大了性工作群体的被害范围。过去，“小姐命案”中的被害人多为站街小姐、发廊小姐等低端或接近低端的性工作者，被害场所多为“一人店”、“炮房”等无第三人监护监控的私密封闭空间；“小姐劫案”中的被害人多为发廊小姐、KTV小姐、应召小姐等具有一定经济能力并提供“出台”服务的性工作者；那些聚集在中高档桑拿、按摩、洗浴中心或休闲会所，在场所包房里从业的性服务小姐，在调查中未显现出明显的被害倾向。但现在，在脱离实体场所的“线上交易”模式下，性工作者群体类型间的界限被打破，更多的性工作者不得不陷于“无第三人监护监控的私密封闭空间”，被害风险大为提高。

回归模型数据显示，在控制年龄、文化程度、被害报警、求警意愿等4项变量后，小姐为客人提供服务的地点从工作场所的包房、到“不一定”、再到离开工作场所到其他地方，每上升一个层级，性工作者被害发生比就会增大2.117倍。

研究表明，犯罪情境不一定是预先设置的。除了不幸遇

到那些有预谋的、职业的犯罪团伙、犯罪分子之外，很多性工作者是在突发的遭遇性情境中被害的。在性交易过程中，双方因交易价格、服务质量、甚至人际互动中的小小摩擦所引发的纠纷、口角都可能在特定环境下触发犯罪。一些人在平时与他人发生矛盾时可以控制自己的，因为他周围有其他人。但是在特定的无第三方监控的情况下，他就有可能失控，实施犯罪，这些人甚至是没有任何前科的。

以“线上交易”来防范警方的查处，这和过去从发廊、休闲店的按摩间转到小区里的“炮房”进行交易是一个道理。“炮房”是指老板在发廊、休闲店附近租用的专门供性工作者接客的房间，“站街小姐”供接客使用的房间也叫“炮房”。这类场所往往设立在“实体店”以外，目的就是防备警方的突袭检查，但这种脱离实体场所监控的交易空间却把性工作者置于了更易于被害的危险境地。

边缘化的权利

从预防犯罪/被害的角度看，性工作者要做的是尽量避免进入易引发犯罪/被害情境，如果不得已需要进入存在潜在风险的地点，也要制定一些救济性的预案。譬如，通过“线上”模式交易的性工作者，要通过短信、微信等方式与同伴保持联系，让同伴知道自己的动向，并尽可能获取、保留交易对方的通讯信息。有时候，一个装模作样告知同伴自己所处地点的电话，就有可能避免一次性命攸关的犯罪侵害。另一方面，



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相关的行业人员，都应该认真研究预防犯罪的新手段，减少性工作者的被害几率。

研究性工作者被害预防的手段、方法、措施，无论在法律还是在伦理上都是站得住脚的。生命高于社会风化，即便性工作是非法的，也不能构成我们放任这个群体被杀、被抢、被绑架的理由。

目前的现状是，性工作者的权利在事实上已被严重边缘化。虽然她们和其他公民一样，其人身权、财产权在形式上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在中国，警察与性工作者的关系比较特殊。按照道理来说，警察负责性工作者被害案件的侦办，性工作者遭到不法侵害，应首先求助于警察。但从

另一方面来说，警方也是扫黄工作的责任主体，对性工作既有程序上的调查权，又有实体上的处罚权。更具特色的是，中国警方在法律上有权不经过司法程序，直接决定对性交易双方实施收容教育，期限短则6个月，长则2年。

性工作者常将警察理解为与她们对立的社会及角色。按照法律规定，“卖淫者”轻则面临10—15日拘留、5000元以下罚款，重则接受6个月至两年收容教育。因此，性工作者遭遇不法侵害后，往往不敢报警。而根据刑法的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管制；情节严重的，可能获刑5年以上，组织卖淫的处罚就更重了。由此，“妈咪”、“鸡头”、老板基于自身法律风险的考量，通常也会劝阻遭到

犯罪侵害的性工作者报警。被害之后不报案，侵害她们的犯罪分子就会逍遥法外，这个群体就会成为犯罪分子的“热点产品”，其合法权利的保护就是一句空话。

不过，除非受到舆论的干扰，警方其实极少对报案的性工作者进行处罚，即使是老板、

“妈咪”报案，通常也不会处罚。当然，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警方不会也不敢公开、明确地对外承诺不处罚报案的卖淫者或组织卖淫者。社会舆论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在性工作及扫黄问题上体现得较为充分。

过去，也有个别地方的公安机关尝试过转变。他们将防范“小姐被害”的策略打印成宣传资料提供给辖区内的“从业小姐”，督促她们因地制宜地展开被害预防；升级“‘小姐’被害防范系统”，在“小姐”易于被害的从业场所安装了与警方信息系统相连的报警装置，以实现案发后的快速反应。后来，这些举措被当地舆论批评为“警匪一家”，为色情场所提供“保护伞”，最终不得不偃旗息鼓。

性工作者的合法权利难以得到充分、有效的保护，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主流社会对边缘群体的忽视，反映了社会的法治化水平还不够，人权状况有待进一步改善。

无论性工作本身的法律性质如何，警方围绕性工作者被害所展开的防范措施都是合理、合情、合法的。这其实是警方的职责所在。◎

（采访整理 记者 / 徐佳）

□ 编辑 李光 □ 美编 青年



台湾苗栗 负巨债陷“破产”边缘

县财政缺口高达百亿新台币，欠债超过600亿，已经穷到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

记者/马军

“拜托大哥，请在政论节目里向刘政鸿县长呼吁一下，让他赶紧把苗栗国际艺术季的费用结了吧，我知道县财政紧张，但国际艺术家的钱如果不付，台湾会在国际上丢脸的。”2014年苗栗国际艺术季后，迟迟拿不到演出费用的活动主办方无奈之下，只得给各路政论名嘴打电话，寻求舆论上的帮助。

舆论压力并未让主办方就此拿到尾款，他们只是得到了苗栗县政府优先支付的口头承诺。由于财政紧张、负债高企，苗栗县政府已经无力支付近亿元的演出费用。去年“九合一”选举后，国民党籍县长刘政鸿卸任，同党县长徐耀昌接任，苗栗财政空洞才浮现众人眼前：苗栗县财政缺口高达百亿（新台币，下同），欠债更是超过600亿，遑论国际艺人的演出费用，苗栗已经穷到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临近破产状态。

前任留下债务大坑

国民党内名不见经传的徐耀昌，去年的“九合一”选举中当选苗栗县长。作为为数不多延续下蓝色血脉的县市，蓝营对徐耀昌期待满满，希望他能治理好苗栗这个仅有56万人口的客家山城，维持住国民党的执政口碑。

但徐耀昌上台后发现，前任县长刘政鸿留下来的却是一个烂得不能再烂的摊

子。过去八年，前任县长每年花掉260亿元，支出和有80万人口的屏东县几乎持平。更严重的是，这笔钱中不少都是借债而来，徐耀昌接管苗栗后发现，县财政“没有半粒米可以下锅”，前任还给自己留下了648亿元的巨额负债。

苦苦支撑半年多之后，徐耀昌再也找不到资金来源维持县府的运行。今年7月，苗栗县账面上只剩4亿资金，但下半年公务员的工资和退休金都有12亿要支出，苗栗政府已经穷得连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不得不裁员时徐耀昌才发现，县政府已经超编1000人，这些人都是前任县长安插进来的约聘人员，解约还要付额外的解约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徐耀昌才砍掉其中的300人。

面对财务危机，徐耀昌只能从软柿子下手，删减警察和消防人员的超勤津贴。面对县政府财政的窘境，苗栗消防队员也很无奈，“被砍掉几千块薪水没关系，总比发不出来要好吧。”

不仅公务人员发不出工资，县政府向民间厂商的一些应付账款也面临违约的风险。今年下半年，苗栗至少要结清欠厂商的三十九亿应付账款。苗栗县政府官员表示，如果这笔钱无法及时结清，很有可能造成厂商周转不灵甚至倒闭的困局，苗栗县经济或就此陷入恶性循环。

2005年底，刘政鸿从傅学鹏手中接过

根据马政府审计部门公布的《2012年度苗栗县总决算审核报告》，

至少2008—2012四年间，苗栗县的支出都是远大于收入，且财政预算和实际情况相差甚远。

以2012年为例，苗栗县原计划该年度财政能够结余2亿，但最终结果是亏损56亿，相当于计划与实际有58亿元的偏差。



1/ 2012年10月10日晚间在苗栗后龙以“客家山城迎国庆、缤纷同花喜迎宾”为主题，施放逾8万发绚烂烟火照亮夜空璀璨夺目。

2/ 苗栗县在后龙高铁站区规划北势溪环境营造工程中的“客家圆楼”，于2014年10月25日开幕，在夜间灯光照映下，显得格外亮眼，也让高铁站区呈现独特风情。

3/ 瞬间5年后来台，“月光女神”莎拉布莱曼9月14日应邀参加2014苗栗国际艺术季活动，在苗栗开唱，现场逾5万名观众听得陶醉入迷。



2



3

苗栗县时，县政府总共负债202亿元。刘政鸿上任之后，不到十年债务增加两倍。虽然台湾官方并未公布具体数据，但根据苗栗县议会公布的历年预算统计，苗栗目前总负债为648亿新台币。

苗栗县财政困局已经让公务员领不到薪水，在政治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江明修看来，这种情况在财政制度已经十分健全的台湾“根本不应该发生”。

“公教人员的薪水是预算里已经编列的项目，也就是说当初在做预算的时候就应该知道这笔钱该从哪里出，怎么可能发不出薪水呢？”根据“马政府”审计部门公布的《2012年度苗栗县总决算审核报告》显示，

至少2008—2012年四年间，苗栗县的支出都是远大于收入，且财政预算和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以2012年为例，苗栗县原计划该年度财政能够结余2亿，但最终结果是亏损56亿，相当于计划与实际有58亿元的偏差。

该报告指出，“苗栗县政府未能积极达成赤字目标，持续赤字，须举债因应，致公共债务金持续上升，并超逾法定债限比率甚多，亟待检讨改善”。

“没有用的，台湾历史上就是‘重预算，轻决算’，民意代表们在电视上可以为了预算书吵架甚至大打出手，但是年底决算的时候民代也不管，媒体也不管。一年到头预算书是不是严格执行，财政是结余还

是欠债，这些问题没有人关注”，前“监察委员”马秀茹向《凤凰周刊》记者表示道。

穷地方的大手笔

“让世界看见苗栗，让苗栗赚进商机”，2009年台湾《远见》杂志将刘政鸿评为五星级县长，在接受专访时，刘政鸿讲出自己诸多大手笔建设就是为了在世界面前让苗栗曝光。

此后，苗栗多次大手笔活动甚至让台北都黯然失色。一年一度的苗栗国际艺术节上，卡雷拉斯、多明戈、莎拉布莱曼先后献唱，每年花费近1亿元；2011年举办的台湾灯会花费5亿；2012年的“国庆”烟火，苗

栗更是破纪录地连续施放二十二场，直接“烧”掉1.8亿……

除此之外，台湾知名的“马屁工程”、“政绩工程”也都齐聚苗栗。出生于香港的马英九为了表示融入台湾，每年选定在苗栗客家马家庄祭祖，这也让刘政鸿有了“拍马屁”的机会：先是宣布修建“马英九奋斗馆”，后来又斥资2.6亿修建“马家庄游客服务中心”，甚至出资找学者撰写论文，证明马英九家族与台湾苗栗的马家有血缘关系。在花费了几百万的科研经费后，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马英九和苗栗马家没有关系。

去年11月，就在刘政鸿卸任前一个月，其还在为刚刚落成的客家圆楼剪彩。实际上，刘政鸿任内已经修建了一座“客家大院”，两个建筑总造价超过2亿。伴随着刘政鸿的大手笔，其本人的声望也直线上升，2009至2012年，刘政鸿连续四年获得《远见》杂志评选的五星级县长，期间也连续位居《天下》杂志县市长评比的前三名。梳理刘政鸿的得奖记录，《凤凰周刊》记者发现，苗栗县负债率增加越多的年份，刘政鸿的评分与名次就越高。

曾在苗栗县长选举中败给刘政鸿的民进党“立委”吴宜臻表示：“苗栗县民就认刘政鸿这一套，越穷的县越认这种大手笔，刘政鸿可以通过发包工程的方式满足地方桩脚的利益，他自己的选情也会因此得利，民望也会提高。”

无论是《远见》还是《天下》，评价方式都是以民意调查为主，专家意见所占比例极小。准确地说，这些评鉴都只是民意支持度，测不出执政者的具体能力。台湾资深民调专家戴立安表示：“全台湾医疗满意度最

财政危机下地方政府向“中央”的求助，“马政府”至今并未给出明确态度。出于财政问题、蓝绿政治、人际关系等多重考量，“马政府”无法在短期内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高的地方在台北，但这不能说是郝龙斌或者柯文哲做得好，只能说是台北的大医院多，民众就医方便而已。”

虽然大手笔让苗栗在国际上屡次曝光，但对刘政鸿式大手笔的质疑声也从未间断。几年前台湾《商业周刊》就曾给全台所有县市的地方财政进行了评估打分，当时得出的结论就是全台总共有七个县市财政“病危”，一个县财政“脑死亡”，这个“脑死亡”的县市就是苗栗。并且预言几年后苗栗的财政状况将成为一个炸弹引爆全台。

苗栗爆发财政危机，宣布7月后发不出

公务员薪资之后，绿营执政的云林县也步其后尘，表示公务员薪资只能发到10月份。此外，宜兰、花莲、屏东、彰化、嘉义、台东等地均爆出或大或小的财政危机，由苗栗引发的公共财政危机或就此引爆全台。

为了给“中央”政府施压，徐耀昌在自己的个人社交网站上呼吁“一人一信救苗栗”，全县民众写信给马政府陈情，要求“马政府”给苗栗增加统筹分配款，但截至记者发稿时止，“马政府”对于是否救苗栗还未有明确态度。

一向与刘政鸿关系要好，被视作是刘政鸿最大靠山的台湾副“总统”吴敦义对媒体表示：“苗栗破产是危言耸听，接下来苗栗很多工程都要完工，会有收入进账，缓解目前的窘境”。但吴宜臻表示，“苗栗县政府花钱大手大脚背后就有‘中央’的支持，‘马政府’独厚苗栗等国民党执政县市，给了好多钱支持，这才让刘政鸿敢这样肆无忌惮花钱。”



→ 2012年，马英九初二在“行政院”客家委员会主委黄玉振、苗栗县长刘政鸿以及马氏宗亲陪同下，进入马家庄扶风堂祭祖。

财政危机引发台湾“希腊化”隐忧？

台湾当下各地政府的最大财政支出是人事开支，经济情况不景气的当下，只有公职人员的薪资收入比较稳定，人们纷纷跑回来考公务员，跟以前的情况大为不同。

记者/马军

苗栗爆发财政危机濒临破产之后，在云林、花莲、宜兰等地掀起骨牌效应，云林情况最为接近苗栗。云林县长李进勇表示，接下来半年需要发放退休金8.5亿（新台币，下同），公务员薪水7.5亿，而县库只有5亿元存底，缺口有11个亿。如果公有地标售得不顺利，10月份起云林也发不出薪水来了。

财政危机下地方政府向“中央”的求助，“马政府”至今并未给出明确态度。出于财政问题、蓝绿政治、人际关系等多重考量，“马政府”无法在短期内梳理当前地方政府财政困局，并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舆论对“救蓝不救绿”的猜疑，台行政部门发言人孙立群表示，“‘中央’独厚哪一个地方政府是不可能的事。”

实际上，造成台湾县市政府债台高筑的原因十分复杂，可能引发的政治效应不容小觑，在议会失效、蓝绿政争的环境下，单纯的财政危机背后隐藏着复杂的逻辑链条。地方财政危机持续延烧下去，台湾未来甚至有“希腊化”的可能。

不过，台湾的政府债务所占GDP比重与外债所占GDP比重，衡量世界发达地区的状况，仍属于偏低水平，还算是优等生。政府债务所占GDP比重：美国101%、英国89.4%、法国95%、德国84.7%、日本230%、台湾36.5%；其中外债所占GDP比重：美国106%、英国406%、法国222%、德国145%、日本60%，台湾37.4%。希腊在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之前，经济已呈现负增长，台湾只要



↑ 2009年，延续高雄世运开幕典礼颇受好评的绚丽烟火，闭幕典礼再出奇招！白昼烟火——“彩烟”特效。

经济不断成长，不止于跌落到希腊的境地，而且希腊加入欧盟以后，丧失了货币主权。

地方制衡政治失效

就目前爆出的苗栗和云林情况来看，台湾地方政府最大的财政支出是人事费用。台湾各县市的人事费用都超过了当地总预算的四成，甚至高雄、基隆、新竹、彰化、南投、嘉义、屏东、花莲和台东等地，人事费用占据了政府支出的50%以上。

以云林县为例，云林县一年的人事费用大概有150亿，几乎等同于“中央”政府划拨下来的统筹款。换句话说，每年“中央”政

府划拨给地方上的资金，几乎都用来发放公务人员的薪资。

“台湾经济起飞的那段期间，社会上的人赚的比公务员多多了，那时候也没有谁愿意做公务员”，台北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罗至美对《凤凰周刊》记者表示，“最近十年来，台湾经济不景气，大家又都跑回来考公务员，根本原因还是公务员薪水高”。

根据台湾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台湾公务人员的年平均薪资为114.6万元新台币,与之相对的,45岁以下人士社会平均薪资只有54万,不到公务员的一半。而中油、台电等“国营”企业的平均月薪是9.4万,也是一般



台中市明年编列1.84亿元预算，并与辖内404家医疗院所签约合作，补助65岁银发族或55岁以上原住民装置活动式假牙，每人补助4万元，预计将有6,100位长辈受惠，所有需要装假牙的长辈都可获得补助。



社会薪资4.4万的一倍有余，更是大学毕业生起薪2.2万的四倍多。经济不景气的当下，公职成为了台湾民众最好的职业选择之一。在缺乏制衡的县市政府，人事的无限扩编是造成其庞大财政压力的首要原因。

此外，台湾地方政治的制衡机制失效也是财政纪律恶化的一大原因。整体上看，台湾已经建立起了完善的政治制衡机制，并且这一机制在“中央”政府层级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运行。但在地方政府，县市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关系并未如制度设计般互相制衡，地方政治人物也并不完全尊重和遵守这一政治秩序。去年“九合一”选举后，台南市长赖清德因不满国民党人当选议会议长，至今仍拒绝进入议会备询，却几乎从未遭致惩处或非议。

苗栗县被称作是全台议事透明程度最差的县，网络上根本查不到议会开会的记录，也看不到议会质询的录像。据台湾《商业周刊》披露，苗栗县议会已经有20年没有删减过预算，三权分立的政治制衡在苗栗的预算审查领域已经完全失效。

《凤凰周刊》记者梳理后发现，越是长期一党执政的县市，其内部议事透明度越低，财政纪律越差。此次爆出财政危机的苗栗、云林、花莲、屏东等地均长期由一党执

政，长久以来便形成了独特的政治默契：议员们对县市首长的预算案不予删减，县市首长为议员们专门编列“议员配合款”，数额从几十万到上千万不等。

2011年，高雄县市合并，升格为大高雄市。原每年只有200万配合款的高雄县议员狮子大开口，要求市长陈菊编列2000万元配合款，行情上涨十倍。

高额福利或拖垮台湾

为了选举，候选人也层层加码增进福利。在台湾，劳保、健保、老人年金和老人免费装假牙等福利由“中央”政府承担。地方县市长候选人只有在其他领域向民众变相买票。

台北市最早开展免费午餐计划，政府为中学生提供免费的营养午餐。此后全台效仿并层层加码，新北市提出免费有机营养午餐计划，云林提供免费营养午餐加牛奶计划，桃园市不仅有营养午餐，还提供营养晚餐……此外，云林还提供免费的子宫颈癌疫苗注射、免费的中小学教科书等福利。

但在地方财政困窘的情况下，这些福利也都最终不免“形象工程”的结局。新北市政府为节约开支，每周的午餐中只有两天的蔬菜是有机蔬菜；苗栗财政困局暴露后，要求家长每月自负一半的营养午餐费……

即便是“中央”政府提供的福利，各地也可以通过降低享受年龄、提高福利待遇等方式向群众示好。宜兰县长选举时，民进党候选人林聪贤便提出，要提升宜兰的生育津贴为每胎两万新台币，国民党候选人邱淑媞得知后，马上在自己的政见添加一条：当选后生育津贴为每胎三万。

“最扯的是假牙福利”，高雄市民林怡彦对《凤凰周刊》记者表示，“‘中央’政府为8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装一副假牙，台南和高雄就为65岁以上的老人免费装假牙，但是为了节省成本，那个假牙都是同一个size的，根本没法用，老人们只得自己再自费做

台湾主要县市负债表

县市名	总负债(新台币)	人均负债(新台币)
台北市	1403亿	5.2万
高雄市	2539亿	9.14万
台中市	648.6亿	2.4万
新北市	1138亿	2.87万
台南市	716.37亿	3.8万



一副。台南和高雄的这个政策，除了牙医之外，几乎没有人得到好处。”

此外，台湾承办的各项大型国际活动也成为了各地巨额债务的来源之一。2010年台北市承办了世界花卉博览会，总花费达122亿新台币。台北市公布的决算书显示，花费122亿举办的花博总亏损为120亿，几乎花多少亏多少，所投入的项目几乎没有回报。

而2009年的高雄世界运动会，仅主场馆就花费了130亿元修建。赛事结束之后，可容纳5.5万人的球场一年使用不到20次，超过万人以上参与的活动不到10次。无奈之下，高雄市政府将露天电影院搬入体育场内，免费邀请民众观影以提升场地使用率。仅此一项建筑，高雄每年就要花费超过6000万新台币进行维护。

目前，台北和高雄是全台湾负债最多的两个城市。截至今年6月底，高雄市负债2539亿元，平均每个高雄市民背9.14万元；台北市欠债1403亿元，平均每欠债5.2万元。

“说到底，还是选举闹的，台湾的选举太多了”，国民党“立委”费鸿泰表示：“如果你去屏东看看，你就知道候选人怎么开选举支票。烟火秀、跨年晚会就不要提了，光是屏东就修了好几个大型停车场，甚至农村都修了停车场，那些地方地广人稀，车子随便停路边都没人管，修这些东西根本就是浪费。如果不是财政危机，估计全台湾每一个县市都要有一个机场。”

如果说因选举支票而起的地方债务可称巨额，那台湾“中央”政府的债务数量则可称天量。去年年底，台湾“中央”与地方政府负债加起来已经超过25兆新台币，相当于人均背负107万元，换算成人民币已经超过20万。

至少从最近三年来，台湾当局总预算中福利支出已经占据了第一位，超过了预算总额的20%，有关经济发展的预算支出更是逐步减少。台“财政部长”张盛和曾表示：“目前台湾的福利支出已经占总预算的23%，就算有金山银山也有坐吃山空的一

↑ 2014年母亲节前夕，云林县国民党提名县长参选人张丽善公布“妈妈安心”政策，提出“免费国小营养午餐”与“免费施打子宫颈癌疫苗”政策。

天，更何况现在已经寅吃卯粮。”

2015年度，台湾当局总预算近两万亿元新台币，其中仅公教人员退休金一项就有1400亿新台币，占总预算的7.2%。在福利支出越来越多的“透支型”财政之下，台湾近年来诉求公平分配的青年运动、学生运动此起彼伏。诉求分配正义的“阶级矛盾”正在逐步取代诉求统独的“蓝绿矛盾”，成为困扰台湾未来社会的最大问题。

“马政府”曾在第一任期内试图削减军公教人员的福利，最终在反对声浪与连任压力下作罢。去年8月后，“马政府”再度尝试进行年金改革，最终依旧在“九合一”选举与2016年“大选”的压力下被无限期搁置。在可预见的未来，台湾依然会被财政问题长期困扰，台湾整体“苗栗化”甚至“希腊化”都非危言耸听。◎



更多资讯 更多阅读方式 尽在

鳳凰週刊

新媒体
New Media

微信

新浪微博

亚马逊电子书

官方网站

微信客户端扫描以下二维码
或搜索香港凤凰周刊
添加我们的公共账号吧
每天为您播报更多资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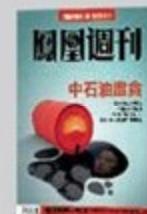
用新浪客户端
扫描以下二维码
赶紧 @ 凤凰周刊
随时获取更多即时资讯



扫描以下二维码
即可购买凤凰周刊
亚马逊 Kindle 电子书
获取更多资讯



登录以下网址或扫描以下二维码
您可以无障碍在线浏览精华内容
或在线订阅《凤凰周刊》
www.ifengweekly.com





缅甸大赦中国伐木工内情

打击中国伐木工人有着多方考虑，既可以阻断克钦邦少数民族武装的经济来源，也可以对缅甸森林形成保护，更为重要的是让中国人明白情况的严重性。

特约撰稿 / 尹鸿伟

↑ 2015年7月22日，缅甸北部的密支那县法院对155名中国伐木工进行了判决。除了两名17岁少年被判10年有期徒刑外，其余153人都被判20年徒刑。图为：中国伐木工被送往法庭。

刚被重判，又大赦了——今年以来，155名中国伐木工人在缅北的曲折遭遇，成为舆论焦点。

在缅甸克钦邦与中国云南省之间，凡是涉及木材生意的人都知道，近20年来许多中国商人靠缅甸木材发了财，缅甸一些地方民族武装首领也赚了大钱，但缅甸的森林也被破坏得非常严重。

“缅甸那边的人需要钱，而中国

这边的人需要木材。”一名长期出入克钦邦的云南籍木材商人告诉《凤凰周刊》，“以前站在中国边境就可以看见对面缅甸茂密的森林，现在想要望见森林，要开着大卡车在缅甸境内跑上六七天。”

不过，情况正在发生变化。2015年1月，缅甸政府军宣布抓捕了100多名中国伐木工人，其余近千名工人则

翻山越岭逃回中国。直到7月22日，克

钦邦密支那县法院根据《公共财产保护法》对这些中国伐木工人进行了史无前例的重判：其中两名17岁少年被判10年有期徒刑，余下的153人被判处20年徒刑。此外，一名被控同时藏有毒品的女性被判加刑15年。法院称，为了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才判处重刑，同时这些人有向克钦邦最高法院上诉的权利。

但仅仅一周后，缅甸总统吴登盛

却突然签署大赦令，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释放6966名犯人，其中包括这155名中国伐木工。随后他们被缅方送返中国。缅甸大赦多半借节日宣布，但这次等到中国伐木工案件宣判后一周才宣布，引发猜测。

长期存在的伐木问题

“森林王国”缅甸，其森林面积占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尤其柚木储量占世界的90%以上。

由于历史原因，克钦邦范围内至今武装派别林立，除了缅甸政府军，还有与政府军长期对抗的少数民族武装克钦独立军，以及由克钦新民主军改编的缅甸边防部队，另有同意归顺政府的“腊桑翁”克钦民团。目前克钦邦范围内至少包括四支大的武装力量，以及不计其数缅甸中央政府认可的地方武装小民团，他们虽然各自为政，但通过各种途径与中国商人合作砍伐森林获利却是相同的方式。

2006年以前，经常出入滇西地区的人会有这样的印象：公路上成群结队的大货车满载着巨大的原木或粗加工规格板材，一路从滇西方向向东行进，木材要么被直接运往广东、福建等地区，要么在云南省楚雄市广通火车站被转装上火车运往中国各地。这样的情况不仅仅局限于克钦邦，临近的掸邦、曼德勒省、实皆省等地区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这些木材95%以上是非法进口到中国，但当地老百姓却没有获得利益，因为他们没有说话的权利。据一名中国木材商人介绍，这样的情况延续了至少10年，在2000年后达到高峰。“我们喜欢缅甸的木材，因为质地非常好，我们会把它们加工成各种家具、画框，再转手卖去日本、美国。”

中国伐木工涌入缅甸，不但让

森林消失，更激起当地人的强烈不满。2005年8月，缅甸仰光的大学生走上街头，抗议缅北各种地方民族武装对森林、矿产的滥采滥伐，缅甸军政府的腐败和管理无能，其中也包括“中国商人对缅甸资源的掠夺”。这样的风波被一些国际环境组织形成报告，提交到联合国讨论，给中缅两国施压。

此后，缅甸政府开始派出军警进行抓捕和驱赶，并且多次拘禁中国在缅伐木工人。与此同时，缅甸政府为了打击内部腐败，除了对外采取更加严厉的管制政策，也对部分海关、外贸等政府执法人员和商人实施抓捕行动，导致一些缅甸老板纷纷出逃。

云南省则在2006年5月下发《关于云南省对缅木材矿产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强调中国木材企业申请办理《核准证书》，须提供经缅甸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或认可的木材、矿产合作开发合同（协议）和相关批准（认可）文件，力图表明中方的政策是不再希望商人们与缅甸地方民族武装“合作”，而意在配合缅甸中央政府的工作，消除不良国际影响。

2007年5月3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表示，“关于与缅甸的合作，中国政府的态度非常明确。中国政府从来不允许中国公民越境到缅甸从事非法伐木。”

虽然中缅两国政府针对森林砍伐、木材进口等情况进行了整治，但由于巨大经济诱惑的存在，始终无法杜绝。

“禁止政策不会长期延续下去，背后有太多人的利益受到影响，大家会千方百计进行突破。”据一名长期在中缅边境活动的中国商人透露，中国木材商人主要与少数民族武装合

作，但经常被政府军拦截，要么把木材扣下、罚款，要么把工人扣下。如果老板愿意拿钱去赎，工人们就可以回来，反之就将被投进监狱，但刑期一般都不长。这个过程中也经常有一些中国工人被打死打伤，但在缅甸的森林里没有人管得了。

不过，有克钦邦的少数民族武装领袖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我们也要生存，也要发展，不可能空守着这么多木材、矿产受穷、饿死。中国商人为我们修了许多公路、房屋等基础设施，教会了我们许多新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仅仅带走了我们的木材和矿产。”

缅方政治目的已经达到

缅甸2008年新宪法规定，总统有权实行特赦，缅甸的国际形象也由此得到了改善。自吴登盛2011年3月执政以来，已经大赦了71000多名犯人，包括至少350名政治犯。

“中国人对于缅甸中央的法律既不了解，也不在乎。这次教训应该会让他们知道，在缅甸也需要遵守当地法律了。”前述中国商人说，“此次缅甸方面重判中国伐木工人，显然政治因素的考虑更多。这表明缅甸政府要改变以往的处罚方式，将以更严厉的手段对付这些问题。”

一边是发展的中国需要消费大量的木材，一边是贫穷的缅甸各派别需要出卖资源来获得资本。长期以来，缅甸政府和各种少数民族武装彼此都在考虑自己的利益，如何扩大自己的实力和地盘，尤其对于各种地方民族武装而言，短、平、快地获取经济收入，是其维持武装继续生存的重中之重。与此同时，一些政府军和地方领导人同样不甘落后，也积极与中国人“合作”，大肆开采当地木材等原始资源。

据缅甸政府
数据显示

35000 吨

2013年4月-12月，
该国共罚没35000吨
非法木材和木制品，其
中包括5141.8875吨
柚木、6066.7399吨
硬木、11379.219吨其
他木材以及10883吨
木炭。

57%
20%↓

缅甸资源与环保委
员会秘书长吴登伦
指出，缅甸森林覆盖
率在1962年下降
为57%，2005年
为51%，2008年
为24%，目前仅为
20%左右。



中方难堪？

“吴登盛不会害怕中国的压力，密松水电站的事情比伐木工人大多了，但他仍然公开叫停，中国方面也无计可施。”仰光的一名政治分析人士告诉《凤凰周刊》，“打击中国伐木工人有着多方考虑，既可以阻断克钦邦少数民族武装的经济来源，也可以对缅甸森林形成保护，更为重要的是让中国人明白——情况已经发生变化，若再来缅甸砍伐，后果很严重。”

显然，缅方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继续在监狱里关押那么多的中国工人意义不大。既然中国方面一再要求释放中国工人，吴登盛便顺势把“包袱”丢回去，也避免过度刺激中国舆论。

在吴登盛签署大赦令前一天，中国新任驻缅甸大使洪亮向其递交了国书；同一天，其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表示，“缅甸和中国的关系尤其重要。”

大赦后争议仍存

由于同期中缅边境地区发生了许多事件：果敢同盟军（汉族）与政府军冲突造成大量难民、缅甸军机进入中国领空投弹、缅军炮弹射入中国等，给中方带来了不小的人员和财产损失，迫使中方宣布在边境一侧进行军事演习，以维护边境安全。这些情况与缅甸正在进行的民主转型、西方势力积极介入缅甸事务，以及缅甸大选等多重情况交织在一起，自然引发各种各样的猜测，甚至包括“缅甸正在去中国化”。

从积极方面看，缅甸消费者喜欢从中国进口的廉价商品，地方军阀则渴望中国商人把他们的资源变成现汇，以便于有能力购买维持生存最需要的军事装备，所以，尽管缅甸政

▲ 云南境内靠近中缅边境一侧，大卡车正在装运之前进口的缅甸木材。

来自缅甸克钦邦首府密支那的华人许先生说：“以前密支那的天气是很好的，气温适中，随着附近的树木大量被砍伐后，密支那的天气越来越热，夏天开始让人受不了。”他表示，密支那城镇附近的树木被砍伐得非常严重，柚木几乎见不到了。

这样的情况伴随着缅北持续的战火一直存在。2014年前后，一些中国商人与缅甸克钦邦政府边防部队和腊桑翁民团签订了木材砍伐合同，由中方支付500万元人民币给缅方，进行一定数量和范围的森林砍伐及出口到中国，同时打点包括缅甸政府军和克钦独立军等地方关卡。该合同获得了中国边防和海关的批准，也持续运行了一段时间。

由于克钦邦境内情况复杂，中国商人们在每个环节都要靠金钱铺路，没有任何法律与制度保障可言。随着缅甸政府军与克钦独立军，掸邦的德昂解放军和果敢同盟军等少数民族武装冲突愈加激烈，擅长险中求利的

中国人也难逃被波及的命运。

2015年1月，缅甸政府军突然在克钦邦大肆抓捕“不明国籍”的伐木工人。中国驻缅甸大使馆获悉后，积极进行外交斡旋，呼吁缅甸方面尽快结案，把人员全部交还中方。不过，缅甸方面不为所动，先以“非法入境”判刑6个月，后又根据《公共财产保护法》再次指控所有中国人。

值得注意的是，缅甸法院的判决得到当地舆论的支持，缅甸媒体甚至希望监督“法院是否只是走过场，不执行就把人员移交中国”。由此还引发了公众对中缅油气管道、密松水电站和莱比塘铜矿等中国参与投资项目的安全担忧，甚至包括缅甸国内排华情绪的风险。

正在各方为此热议不休，缅甸总统吴登盛的大赦令突然扭转了局势。随着中国伐木工人顺利回国，也给国际社会留下想象，究竟是缅甸政府惧怕中国，还是不想为11月即将到来的大选增加压力，或是以此让

府对这些行为一再表示反对，中国工人的伐木动作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一直向缅甸腹地和缅印边境推进。

此次缅方高调重判155名中国伐木工人，不但打乱了当地的利益格局，也可能影响到两国的传统关系，为外交纠纷埋下隐患。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海关和边防显然没有严格执行云南省2006年5月下发的有关规定，不但让中国伐木工人出境，也让缅甸木材进口到中国。

而缅甸中央政府也不承认自己认可的地方武装所作出的商贸决定，即认为地方武装没有权力支配国家资源。要知道，早在2014年4月1日，缅甸政府就正式宣布停止出口本国木材，但也由此导致“盗采走私猖獗”。

此外，由于中国方面一些人出言不够谨慎，造成缅方抱怨“中国企业

图干预缅甸司法”的新情况。缅方强调，必须确保缅北地区非法原木采伐的事件不再发生。

中国伐木工人被缅方判刑并非第一例，虽然他们通过大赦逃过此劫，但后续是否还会有中国人为利益涉足缅北丛林，无法定论。缅北非法砍伐树木的局面如果得不到改变，未来将还会有更多中国人被抓捕，甚至判刑。

中缅均有舆论指出，缅方没有抓捕真正的木材老板，只拿底层打工的人开刀，显然不公平。一名被遣返回来的云南省腾冲县劳工曾经向外媒披露：“许多被抓的中国工人莫名其妙就不见了，不知道是被老板赎走了，还是遇到不测。而缅甸的监狱里一直都有中国人被关着。”

遣返中国工人似乎成为常态。

2006年5月，缅甸政府向中国遣返800余名非法务工的中国劳工；同年6月17日，又有427名中国劳工被移交给中国；2007年8月11日，64名中国公民被缅甸政府遣返中国，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被一些不法商人雇佣，绕关避卡非法出境伐木、采矿而被缅方抓扣。在缅甸腊戌、八莫、密支那和曼德勒等许多监狱里，一直关押着在缅北地区从事非法伐木、开矿等工作的中国劳工，他们往往都被缅甸法庭以非法入境和非法居留判处数年监禁，吃尽苦头后被遣返回国。

不过，大赦中国工人并没有得到当地舆论的认同，《缅甸时报》7月31日的评论称：“中国伐木工逍遥法外，大赦令人失望。”◎

□ 编辑 漆菲 □ 美编 虎妹



香港凤凰卫视倾力打造 全球华人精品生活杂志

**《凤凰周刊》征订的读者
征阅全年《凤凰周刊》+《凤凰周刊·生活》
可享受690元优惠，即刻节省90元
单订阅《凤凰周刊·生活》全年240元
用户可免费获得凤凰精美礼品一份！**

征订热线：陈先生 0755-25934591

广告热线：张先生 0755-25469762

城市版合作：聂小姐 0755-25934586

征订传真号：0755-25934593

邮局汇款

收款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08号荔景大厦9层

收款人：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邮编：518001

银行汇款

开户名：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帐号：7705 5795 9990

开户行：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红岭支行

若通过银行汇款，请将汇款收据及您的详细邮寄地址一起寄回或传真至本刊发行部。

邮寄方式

平邮免费；挂号邮寄每本加收挂号费3元，
半年挂号费18元，全年挂号费36元。



菲难以打赢南海仲裁

据学者预测，仲裁庭不太会做出实质性裁决，因为该案兹事体大，关系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很多条款的澄清和解释。

特约撰稿 / 白羽

随着菲律宾在南海与中国展开对抗，菲总统阿基诺三世7月27日发表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时向国民呼吁：“为了守护我们的权利，团结就是关键。”虽然他避免点名批评中国，但表示“对方的影响力、经济规模和军事力量强大”。《菲律宾星报》更于8月1日援引该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奥的话说，中国不久将在



黄岩岛进行填海造地，建造空军和海军基地来保护巴士海峡的出口。

一个月前，在菲律宾经过了两年的“艰难历程”、提交了近万页的材料后，国际仲裁庭将于今年就南海议题迈出第一步：决定是不是对这一议题具有管辖权。

在7月7日的首次口头辩论中，菲方派出了一支豪华的代表团出席，代

表团由菲律宾外交部长德尔罗萨里奥牵头，成员包括菲律宾司法部长、国防秘书等高级政府官员，以及菲律宾自美国、英国聘请的律师团。出发前，司法部长德利马更是信心“爆棚”，称菲律宾在该案上争取做到“一轮定胜负”。

中国大陆一直将这一仲裁视为闹剧，始终保持“不接受、不参与”的态度。而对于菲律宾来说，他们有理由欢欣鼓舞——如果能使国际仲裁庭迈出这一步，则可成功地实现其南海问题国际化的野心。而假如仲裁庭做出不利于中国的判决，也有可能让中国承受极大的道德压力。

然而，这真是一场对于菲律宾志在必得的胜利吗？

菲方狡猾的诉求设定

从法律权限上说，常设仲裁法院只是解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实际应用，但不能决定海上争议岛礁的主权问题，更不会包括与此密切相关的海洋权益。判定领土争端通常是国际法院的职责范围，但需要争端各方都签署并批准接受最后仲裁的《特别协定》才能启动。

中方已经明确表示，如果涉及到领土主权、海洋划界、军事活动之类的争端，中国依据排除性声明，可不接受《公约》第297、298、299条规定的任何国际司法或仲裁管辖。

因此，在菲律宾首席法律顾问、被称为是“国际法中的大国屠戮者”的美国律师保罗·雷切尔(Paul S. Reichler)的带领下，菲律宾在提出仲裁时显得小心翼翼——既不要求海洋划界，也不要求仲裁机构解决两国对南海岛屿的权利主张重叠问题。

长期关注这一议题的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胡波对

《凤凰周刊》表示，菲律宾仲裁请求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请求仲裁庭裁决中国断续线不符合《公约》；二是要求仲裁庭对南海岛礁的法理效力进行解释；三是声称中国破坏了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权益，请求仲裁庭采取“强制措施”。

总之，菲方表面上绕开了主权、军事等问题，却招招指向本质的“海事权利”。

对于菲律宾的这些诉求，国际仲裁庭没有理由不慎重。因为鉴于《公约》本身的模糊性，这三点诉求都需要进行长时间的论证。

对于中国来说，南海断续线本身存在于《公约》签署之前，即便仲裁庭要求中国澄清断续线到底是什么，也只是把皮球踢给中国。可以预见的是，中方在短期内并不会做出澄清。

根据《公约》第121条的界定，“岛屿是四面环水并在高潮时高于水面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这一定义本身十分模糊。例如日本的冲之鸟礁到底是“礁”还是“岛”，中韩等国就一直与日本针锋相对。

胡波认为，单从法理上讲，菲提出的该案也会给仲裁庭构成严峻挑战，因为这涉及《公约》很多模糊条款的重新解释，它不仅会对南海问题造成重大影响，也会影响世界其他地区的海洋争端。“因此，除非仲裁庭认为自己没有管辖权，否则一旦程序启动，这个过程都不会轻松，也不会很快出结果。”

根据以往的经验，仲裁法庭的裁决有4种可能性，包括不受理此案、同意审视证据但不做出胜负裁决、对菲律宾的诉求做部分裁决，或完全同意菲律宾的诉求。

据胡波预测，仲裁庭不太会做出实质性裁决，因为该案兹事体大，关系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称

← 2015年7月7日，荷兰海牙，菲政府派出由本国官员和美国律师组成的豪华团队出席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听证会，就菲律宾的南海领土主张进行辩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重申，中国反对菲律宾提起和推进仲裁程序的任何做法。

菲律宾南海动作

基础建设



中业岛

修复机场，增建码头设施



中业岛周边所占岛礁

修建卫星基站，设置有指挥与控制能力的雷达监视系统



马欢岛

建造一个码头和直升机停机坪



马欢岛所属 9 个岛礁

修建海洋监视与侦察系统基站

◆ 2016 年 杨信沙洲、西月岛工程完工

◆ 2018 年 费信岛、司令礁和南钥礁工程完工

军事部署

西沙群岛

中沙群岛

黄岩岛

九段线

菲

律

宾

巡逻船 2 艘、海上侦察机 2 架

巡逻船 1 艘

北子岛

中业岛

双黄沙岛

南钥岛

太平岛
(台湾控制)

美济礁

仁爱礁

司令礁

巡逻船 1 艘

- 中方控制岛屿
- 菲方控制岛屿

来源：综合网络资料整理

《公约》很多条款的澄清和解释。况且，其他争端方也都没有参与。“如果出现不利于中国的判决，这是以《公约》为基础的海洋秩序的严重倒退，中国可以选择不承认、不接受裁决，至多不过是面子上不好看。”胡波说。

漫长而艰难的法律征程

虽然表现得志在必得，但从菲律宾将南海议题上诉到仲裁庭那一刻起，接下来将是一场漫长而艰难的征程。

对待南海仲裁这一有可能牵涉面最广、案情最为复杂的议程，国际海洋法法庭显得相当谨慎，生怕给外界留下“越权”的把柄。此前他们多次声明，中菲南海争端并没有提交至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公约》附件七的规定下，菲律宾提起的是仲裁程序。

从2013年菲律宾提起南海仲裁，到今年7月举行首轮听证会，这一案件用了两年才在仲裁庭得到初步启动。7月13日首轮听证会之后，仲裁庭发布书面声明称，“将尽快公布对南海议题是否具有管辖权，以及合理议题的可采纳性，预期将在今年年底做出决定。”

2013年1月，菲律宾向国际法庭提交4000页“申诉”材料，企图将南海问题国际化。对此，中国外交部去年底发表针对这一仲裁的立场文件，声明不接受、不参与该仲裁。对于中方的这份文件，国际仲裁法庭要求菲律宾于今年3月16日提交补充文件以回应中国的立场文件。4个月内，菲律宾最终整理出3000页的补充材料。这次首轮听证会后，针对辩论人员提出的问题，仲裁庭第三次要求菲律宾递交补充材料。

根据以往的经验，仲裁程序开始后，将会以书面提交材料、口头答辩的方式交替进行，直到仲裁庭法官认为证据和事实讲清楚为止。

“如果仲裁庭认定其没有管辖权，这场闹剧年底将收场；反之，一般情况下，仲裁程序需要2-3年。考虑到南海问题对于海洋法体系的敏感性和复杂性，时间还可能更长。”胡波说。

菲对华政策或变天

菲律宾如果想在这一战场上胜出，还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国

内的反应。2016年5月9日，菲律宾将迎来新一轮大选。根据菲律宾宪法，现总统阿基诺三世将无法再次谋求连任。目前看来，民调领跑的是刚刚和阿基诺三世“分道扬镳”的副总统杰约马尔·比奈(Jejomar Binay)。自被前总统、阿基诺三世的母亲科拉松·阿基诺提名为马卡第市市长后，比奈一直被认为是阿基诺家族最忠实的追随者。

然而，就在6月22日，比奈宣布从阿基诺三世内阁辞职。两天后，他正式宣布参加2016年的总统选举。当日，他还痛批阿基诺三世的执政表现，指责阿基诺政府让少数精英阶层获利却无视穷人痛楚、“歪曲公义”。在形容现政府时，他用了两个语气相当重的菲律宾词语“manhid at palpak(麻木不仁与笨手笨脚)”。

在南海问题上，比奈常常直接与阿基诺三世唱反调。据菲律宾媒体Rappler报道，不同于阿基诺三世力图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做法，比奈更倾向于通过双边谈判解决南海争端，这也是中国长期呼吁的做法。他曾在多个场合公开表示，希望与中国共同开发南海的油气资源，并说道：“中国有钱，我们需要资本。”他还暗示，如果当上总统，甚至考虑修改宪法，以吸取更多来自中国的投资。

在菲律宾派出庞大的代表团前往海牙仲裁庭后，他公开批评称，仲裁庭仅要求3人在庭上提供立场发言，但菲律宾派出了包括外长、防长在内的18人，“这耗费了大量无意义的资金”。

比奈是首位公开宣布竞选下任总统并与现政府唱反调的候选人，但多份菲律宾民调显示，他与议员格里斯·傅领跑第一梯队。而阿基诺三世“钦定”为继承者的现内政和地方政府部长曼努埃尔·罗哈斯则远远落

后于上述二人。

虽然格里斯在2013年曾参与了亲政府的竞选联盟Team PNoy，但目前看来，她对于阿基诺三世的外交政策也颇有微词。6月11日，在一个地区论坛上，格里斯曾当着美国驻菲律宾大使的面表示，南海问题中，菲律宾不应依赖于美国。“我们能依赖美国吗？我不这样认为，美国只会站在他们自己国民和国家利益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她还表示，菲律宾虽然应该将南海仲裁继续下去，但更重要的是“与中国在各方面维持良好的关系”。

中国：最凌厉的棋手

自从2012年中国海监船大举进入此前被菲律宾控制的黄岩岛海域以来，南海已成为国际社会空前关注的地缘政治热点。三年来，中国、美国、菲律宾、越南……这些地区与全球的主流玩家你方唱罢我登场，在空前的博弈当中深刻地改变了整个东亚地区的政治生态。

对于菲律宾来说，通过不断地炒作南海岛礁议题，其成功将该地区问题国际化，并让这个面积仅有30万平方公里、GDP仅为2720亿美元的国家获得了超出自身实力的国际影响力，同时巩固了美菲军事同盟，大有超过马来西亚、争当东盟老二的势头。

“菲律宾当然明白南海仲裁的不确定性，其期望值也比较低。”胡波解释道，阿基诺三世曾称，仲裁庭只要受理了南海仲裁申请，对菲而言就是胜利。“因此，菲律宾炒作仲裁闹剧的主要目的显然在于制造一种声势，而非一定要搞出个结果。”

对于美国来说，南海议题的持续升温也成为其巩固亚太盟友的一大借口，成为“亚太再平衡”战略最大的舆论推手，让美国将60%的海军力量重新投射到亚太地区显得名正

三年之内，中国由一个望洋兴叹的局外人，成为了地区局势的主导者。美国、菲律宾所有的“招式”似乎都是对中国高速“切香肠”般制造既成事实的回应。

言顺。借着南海议题的东风，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与越共总书记阮富仲成功历史性访问美国，美越这对昔日的死敌不仅成功握手言和，同时还大有政治军事合作全面推进的态势。

尽管如此，在这盘大棋中，中国出人意料地成为了最为凌厉的棋手。三年之内，中国由一个望洋兴叹的局外人，成为了地区局势的主导者。美国、菲律宾所有的“招式”似乎都是对中国高速“切香肠”般制造既成事实的回应。

一方面，中国以近乎“夸张”的速度兴建填出的人工岛，改变了整个地区的力量对比；另一方面，中方采用威慑与合作双管齐下，大棒与胡萝卜的交替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东盟的分化，让其始终没能在南海问题上发出统一的声音。

由于中国控制局面的能力增强，以及外交上的释放善意（比如“双轨”思路），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南海形势出现了缓和的迹象。据胡波观察，今年开始，美国加强了对相关事态的介入，使得局势更加复杂。但美国并没有动机、也没有决心在南海与中国发生战争。

胡波预计，未来的形势发展有两大趋势：一方面，有关各方当然会积极做好军事准备，但都着眼于威慑而非战争，在现场对峙中会越来越克制；另一方面，外交、国际法等领域的斗争将日趋白热化，在外交场合撕破脸的情况还会增多。◎

亚投行已经在做正确的事

——专访非洲开发银行行长唐纳德·卡贝鲁卡

记者/王衍

“我”想再次指出，非洲是一个拥有54个国家的大陆，不是一个国家；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合作不仅仅是在自然资源，还有更加广泛的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非洲开发银行（下称非开行）行长唐纳德·卡贝鲁卡（Donald Kaberuka）日前访华时反复强调说，在其与中国打交道近20年的过程中，感到太多来自中国的误解。

一身非洲精英气质的卡贝鲁卡，谙熟中国经济腾飞的发展之道。他出身于非洲小国卢旺达，但从先进的欧美国家，到如今崭露头角的中国，再到贫穷落后的非洲国家，多年来他游刃于诸多发展模式和经验当中，其观点在非洲领导层颇具代表性。

如今中国政府大力向海外推广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资、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等举措，与他着力非洲发展的重点不谋而合。为此，在今年8月即将卸任前夕，他专程再次到访中国。

已经建立了半个多世纪的非开行，与“初出茅庐”的亚投行之间究竟会摩擦出怎样的火花？前者对于后者又有何经验和教训可以提供？7月末，《凤凰周刊》记者在卡贝鲁卡访华期间对其进行了专访。

非开行和亚投行已开始合作

记者：你此前在媒体上说，欢迎亚投行和非开行展开合作。这次访华，你在这方面的收获是什么？

卡贝鲁卡：我们此行会见了包括财政部、外交部等不同政府部门和机构的人员，也有新成立的亚投行和金砖银行的相关负责人，讨论了他们的策略和商业模式，还有未来和非洲开发银行合作的可能性。

亚投行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组织，而非洲现在也需要（基础建设），所以两者可以在这方面进行合作，并可进行联合融资。2014年5月，中国与非开行建立了规模为20亿美元的非洲共同增长基金。这个基金最早的投资项目是在埃及建设世界上第二大的机场，而埃及也是亚投行的成员国。所以，（未来）我们会和亚投行有更多方式的合作。

记者：这么多年来，非开行有哪些可取的经验呢？

卡贝鲁卡：回顾非开行的历史，其在上世纪60年代建立时，已经有了世界银行了。但作为全球化与区域化的一部分，非开行致力于非洲地区的经济发展，范围比世界银行小，关注对象更为集中。不论是非开行还是同一时期建立的亚洲开发银行，情况相似的是，我们不仅借钱给各国政府，也给私人商业机构，只要这些机构达到一定标准。过去十年，我们一直像企业一样评估各种项目，并保持着AAA的信用评级，这使得来自市场的投资建立在一个有竞争力的信用基础上。目前我们的不良贷款在私人商业部分的比重低于3%。而我们的目标也不是商业性银行，这意味着不是只借出钱，而是要得到发展成果，让非洲的基础设施、贸易、教育、医疗等方面得到更好的发展。

记者：（非开行）有需要改进的方面么？

卡贝鲁卡：（笑）这一点我会和下一任非开行行长说，但不会对公众公开。

记者：你对亚投行有何建议？

卡贝鲁卡：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银行，它也是21世纪金融机构的一个范本。它从旧的组织模型中学，正在致力于建设新的、更高效的机构。我想我没有资格给他们建议，如果一定要提，我能给他们一些关于

● 非洲开发银行



1964年

成立于1964年，是非洲最大的地区性政府间开发金融机构，旨在促进非洲社会及经济发展，其成员国包括非洲地区内成员国53个和非洲地区外成员国24个。



1985年

1985年，中国成为非开行的成员国。
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与非开行签署了20亿美元的“非洲共同增长基金”融资合作协议，由中方出资，面向全非洲提供融资，由非开行推荐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系统、管理、产品，还有商业模式方面的建议。但在我看来，他们已经着手在做很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

做行长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危机

记者：作为非开行行长，过去十年，你经历的最有成就和最具挑战的事情是什么？

卡贝鲁卡：这是个挺难的问题。作为行长，通常要求你会处理危机，因为一次危机会把你之前的成就全毁了，只有成功化解危机，才能有最后的成就。过去十年，我重点推行的是发展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鼓励私有部门的发展，试图满足更多的市场需求。

这期间最困难的时刻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那时候，我们要研究如何将非洲国家的损失降到最低。我们要开发新的产品，使用新的系统来更加高效地工作。我们增强了银行的流动性，增加了银行服务和金融性产品，大股东们还同意用比以前三倍之多的金额进行融资，最后收效不错。这场金融危机就像一场瘟疫，让我们伤痕累累，现在仍在缓慢

地“复原”中。而增加就业率、解决债务问题都是结构性的长期难题，需要不同的处理方式。

但也有令人头疼的事情，例如2013年南苏丹爆发的政治危机，可惜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因为没有权力去干涉（内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悲剧发生。不过，令人骄傲的是，非开行成立这么多年，非洲国家的任一次动乱都没有终止它的作用。

记者：作为出身卢旺达的行长，如何拿捏卢旺达的利益和其他非洲国家的利益？

卡贝鲁卡：我会对所有非洲国家的态度一致。（作为行长）你必须要公平、平等。要知道，卢旺达对于非开行来说相当于尼泊尔对于亚投行。非洲国家的股东中，尼日利亚对非开行的投资最大，是最大的股东，但选行长并不是看候选人国籍。（但下任行长是尼日利亚人？）确实，尼日利亚现在有非法洗钱的可能性，但非开行并不是看选举人是来自尼日利亚、南非或者肯尼亚，还是看谁更加合适，只是碰巧选择了尼日利亚人。

记者：非开行成员国不仅有53个

非洲国家，也包括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中国等其他地区大国。如何处理这些成员国之间的关系？

卡贝鲁卡：非开行的资金来源有40%来自这些国家（亚洲国家中日本是最大股东），60%来自于非洲国家。不同国家有不同的需求和想法，争议有时可以化解，有时不能，这时你需要帮助他们达成协议。但总体来说，更多的时候大家是愿意合作的。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是，是否应该支持生物能源——如果有更多的绿色能源就能不再使用煤炭了。但很多来自非洲的成员国并不支持生物能源的使用。类似这样的问题上就需要进行协商。

记者：有批评说，虽然非开行发展这么多年了，但是对非洲当地民众、民间组织的关注度不够。你如何回应这一点？

卡贝鲁卡：这是比较正确的批评。我认为我们应当在这方面做更多努力。过去我们可能放了过多精力去接触政府、商人、国际组织，未来应更多接触当地民众。我觉得非开行在非洲不同国家的分支机构应该

粤动新高度



廣東南粵銀行
GUANGDONG NANYUE BANK

广东省第十四届运动会主合作伙伴及唯一指定银行

小微金融业务

每一次灵活的盘带过人，都是足球场上的靓丽风景。

广东南粤银行深谙灵活之道，在不断革新进取的路上，升级金融产品及服务模式，重点打造贷款额最高可达房产价值1.1倍的超值贷、信用速贷、超市贷等优质产品，通过灵活制定的解决方案，快速为客户解决资金周转问题。

客服电话：961818(广东)
4000961818(全国)
网址：<http://www.gdnybank.com>



广东南粤银行在法律许可范围内保留对本海报内容的最终解释权



丁大为 摄影

唐纳德·卡贝鲁卡

非洲开发银行成立以来的第七任行长。他在格拉斯哥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在英国南部的苏塞克斯大学任教并从事经济学研究，曾任卢旺达的财政部部长。在其领导期间，非开行飞跃成为非洲最有影响力的多边发展机构，并一直保持AAA的信用评级，资产连翻三倍。卡贝鲁卡于2014年荣获福布斯非洲终身成就奖。

多做宣传，在环保、艾滋、政府透明度等方面，跟当地人有更多接触。

非洲不能照搬中国模式

记者：在非洲，很多人表示羡慕中国在短短30多年的经济腾飞，你对中国的发展有这样的感受么？非洲国家能否套用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卡贝鲁卡：我第一次访华是1997年去香港，所以对中国的第一个印象是香港这样的国际金融中心。后来去了深圳、广州、上海和北京，还参观过包括华为在内的很多中国企业。中国每次都能让我感觉到惊人的变化。

谈到中国模式的问题，我想我们无法直接套用，只能从中学习，就像不能直接套用美国模式一样。非洲国

家跟中国太不一样了，中国是一个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非洲有53个国家，并且贫富不一。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基于中国特有的历史和现实决定的，非洲不能直接照搬。不过，在中国改革的经验中，有三点值得非洲国家学习，也都与邓小平有关：第一是1979年进行土地改革，将农村的土地承包给农民分散经营，这为中国提供了足够的食物；而让农民去城市务工，推动了工业化发展。所以如果想要加快工业化步伐，就要提高国家的生产效率。如今在越南，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效果。第二是作风务实。第三是发展经济特区。

记者：中国如今在非洲有很多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但我们也看到，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速度很快，当把

这些带到非洲时有些未必适用于当地，尤其涉及到环境等因素，你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卡贝鲁卡：确实，中国在非洲建设基础设施的速度很快，而且中国工人工作时间很长，又吃苦耐劳，我很敬佩这一点。但如果你问我，我们是否应该（为了建设基础设施）而牺牲民众（的利益）？如果把基建这些放在民众的对立面，那么我们会用严格的标准来保护民众的利益，因为这是他们的钱。环境方面也是一样，如果因为追求建设影响环境，所有的人未来都会受影响，因此国际组织或者机构对施工方设立很高的环境标准是对的。为了保护环境而延迟完工，我认为是值得的。◎

1 穿上旗袍去安仁，感受浓浓民国风



● 7月18日—7月26日，“2015穿上旗袍去安仁”活动在四川省安仁古镇举办。

据了解，该活动由成都文旅集团安仁文博公司契合安仁的历史文化资源特色而精心打造，已举办过两届。本次活动以旗袍为主线，融合多元民国元素，打造了游客身临其境互动参与的民国风情全体验活动。

安仁古镇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浓缩了川西近代史的百年风云。目前，安仁古镇保留有全国闻名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4A级旅游景区——刘氏庄园、27座极具建筑艺术价值的中西合璧的老公馆、中国最大的民间博物馆聚落——建川博物馆、现代博物馆（展示馆）35座、文保单位16处，有着“中国博物馆小镇”之名。

2 中国非遗文化海外第一股与“圣地亚”的“潮绣传奇”

● 公元805年，南粤一名叫卢媚娘的少女在一块一尺左右的绢面上绣出七卷“法华经”，逾粟粒而点划分明，细如毫发，其点题章法，无有遗缺。唐顺宗嘉其工谓之“神姑”。日月轮转，生生不息，潮绣传承，绵绵千年……

2006年5月20日，古老而神秘的潮绣被国务院正式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3年12月30日，北京冬日的阳光明媚而温暖。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中央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发表讲话：“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当代中国一个闪亮符号。而此时，在中国粤东古老的潮汕平原上，有一位努力践行国家文化战略，名叫姚瞻武的中国非遗文化的传承者，高擎中华文化之旗，以发扬光大中国非遗文化为己任，携带他创办的“圣地亚”及其惊艳世界的“潮绣”走出国门，登陆澳洲APX亚太证券交易所，敲响中国非遗文化海外第一股上市成功的锣声，使中华文化瑰宝在海外大放光彩。

这是一次中国非遗文化走出国门的世纪突破，这是一次中国文化复兴之道的有益探索，这是一次中华文化的世纪远行，这是一条中国艺术走向世界的创新之路……

3 一个“豪们基金”的诞生！

● 当许多人还在呼唤“资本经济时代到了”的时候，却有一个人站出来大声说：OUT了！中国已经进入了“资本+资源的整合时代了”！他，就是优格资本的创始合伙人，被誉为“中国网络游戏产业的开拓者和掌门人”的寇晓伟。

2015年7月22日，对于中国的互联网、文化媒体产业与投资界将注定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被称为“豪们基金”的优格创投基金在这一天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我们希望给到创新创业者的，不仅仅是钱，更重要的是产业资源，不仅仅帮助他们创业，更要帮助他们成长！从2014年底开始，我遍访互联网和文化产业界的大企业、大佬们，希望这个想法能得到他们的认同，并共同出资做一个资本与资源紧密结合的创投基金。这个想法很快就得到了雷军、陈天桥、陈一舟等两代互联网产业领军人物的响应”，寇晓伟激动地说，“有他们的参与和支持是我一生的荣幸！有人说这是一个‘豪们基金’，他们是很有钱，但不是土豪，他们是互联网产业的豪杰！”就这样，一个“豪们基金”诞生了。

寇晓伟和杨圣辉表示，优格创投基金的成立，仅仅是优格资本整体资本运作的第一步，一定会用心做，用好钱，投好项目，绝不辜负出资人和创业者的期望。

4 绍兴市第五届夏日冰雪旅游节8月1日启幕

● 为期一个月的绍兴市第五届夏日冰雪旅游节将在8月1日启幕。本届冰雪旅游节以“欢乐冰雪·助力申奥”为主题，由绍兴市旅游委员会和绍兴市柯桥区旅游局共同主办，绍兴乔波冰雪世界承办。冰雪旅游节期间，还将推出“市区联动”、“节会带动”、“城乡互动”、“产业促动”四大主题旅游线路，整合全市旅游资源，把冰雪旅游节游客引流至市、区各景点，乡村旅游点，工、农、商业游体验点，更好地打响绍兴冰雪旅游品牌，把绍兴打造成富有特色的旅游目的地城市。

5 中国避暑胜地——庆元

● 浙江庆元县荣获“中国避暑胜地”的称号。这是庆元县自获得“全国最美生态旅游示范县”后再次获得的国家旅游名片。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清凉”已经成为一种稀缺资源，“避暑”也成为一种时尚热潮。在煎熬的酷暑，庆元平均气温只有26度，与其挣扎在钢筋混凝土的城市热浪里，不如在庆元偷一日清闲与自在；让生活慢下来，让心静下来是快节奏的城市人向往的状态。背上行囊，骑上自行车，来转一转“连蜗牛都过的很幸福”的庆元吧。（高小影）

钱理群： 告别不了的教育 与青年

特约撰稿 / 孟繁勇



7月8日晚，一些学生约温儒敏聚会，温是原北大中文系主任。席间畅聊，一位同学无意间谈起钱理群夫妇要去养老院了。温和钱是老同学，之前也曾听得钱说过要去养老院养老，但消息传来，仍然不免有些失落和感慨。

翌日，温特意给钱理群打电话询问，电话那头，钱理群证实此事为真。还告诉温说，总是要走这一步，养老院条件还好，他把很多书都搬去了，到那边会继续写作。当晚，温儒敏在微博发了一条信息，也说明了钱为何去养老。他在微博中写道，“老钱结婚晚，无子女，夫妇感情笃好。平日家务全由嫂夫人操持，老钱只管读书写字，酱油瓶子倒了都不用他去扶。近年嫂夫人罹病，也是考虑万一，老钱总得有人伺候，这才不得不选择养老院。老钱通达，早已把生老病死看得自然，他身体很好，在养老院一样研究写作。”

这个消息犹如在平静的水面丢进一颗

石头，随即在网络引爆，均认为钱一生曲折，晚年却入养老院，多有感慨。钱理群回顾自己的人生时曾说：“这是一种充满苦难与屈辱的记忆，最不堪的记忆还不是外在的压力，而在于自己内心的动摇、屈服，以至叛变，自我人性的扭曲、丑恶，以至变态。我无法抹去这一切，它梦魇般地压在我的心头，像一座座坟……”

与父亲“划清界限”

或许有些传奇色彩，小学六年级，钱理群就做“校长”了。

当时钱还是中央大学附小（今南京师范大学附小）的学生。那时，老师和同学都叫他“钱大头”。回忆此事时，钱说：“因为我头特别大，目标显著，老师、同学觉得我很可爱，就喊我叫钱大头。”有一次，教美术的杨宏毅老师，在墙报上画了许多画，有飞行员、教师、科学家、工人等，标题叫“长大了做什么”，同学们都会在每一个职业下填上

自己的名字，钱理群填的是教师。

解放初期，当时社会上还有许多孩子是流浪儿，南师附小就号召学生将这些流浪儿组织起来，办“小先生学校”。钱的班主任吴馨直接告诉钱：“我们要办一个小先生班，现在学校任命你做小先生学校的校长。”听到此言，钱显然吓坏了，忙问：“老师怎么当啊？”吴馨却看了他一眼，说：“你自己去想吧。”由此，钱理群当了小先生学校的“校长”。

当小“老师”的经历，对钱影响巨大，他觉得，这是真正的教育艺术，对你表示一种信任，你自会产生自信，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而这正是做一个教师最重要的品质。后来有个学生是卖冰棒的，毕业时还画了一幅画送给钱，上面写着一句话：“送给敬爱的钱老师”。

教师的梦尚远，人生的磨难却随即而来。1953年，钱理群刚满14岁，向学校申请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称为“共



产主义青年团”),却被拒绝。钱的入团介绍人告诉他,想要入团,“必须从思想、政治与行动上与‘反革命’的父亲划清界限。”钱理群的父亲钱天鹤,1913年毕业于清华学堂高等科,抗战时期曾任国民政府农林部次长。1949年,钱天鹤意去往台湾,遭到妻子娘家人的反对,只得一人飞往台湾。中共建政之后,“与国民党划不清界限”的压力,始终笼罩着这个家庭。

为了说服钱理群,入团介绍人几乎在暑假期间天天来到钱家,钱理群说不出口,怎么能与父亲划清界限?这种精神折磨转化为巨大的压力。钱在后来回忆说:“父亲,你这时正在海峡的那边为台湾农业的振兴奔波,你当然不会想到,你竟使你的小儿子承受了这样的精神折磨!但我却因此而深深地怨恨你了。多少次望着那曾经挂过你的画像的白墙,我默默地想,要是父亲的形象也能像画像一样永远消失,要是我根本没有这样的父亲,那该多好。”

与“反动父亲”划不清界限,由此成为钱理群的罪名。也因此,在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贵州安顺地区卫生学校教书。于他而言,这是一种逃离,再也没有人来逼迫他与父亲划清界限了。他从母亲手中要来一张父亲的照片,放在行李中,这成为与父亲唯一的精神联系。

去往贵州,钱理群真正当上了老师,那年他21岁。接到分配通知之后,钱就把被褥托运,自己一个人登上去往安顺的列车。一路行程无言,到了学校,他没有将行李放进教师宿舍,而是直接搬到了学生宿舍。钱

想,要做,就做学校里最好的语文老师,和学生们打成一片,他做了一个不是班主任的班主任。但在后来的文革中,却成了钱的罪状之一——“对学生太热情”。

这段岁月对钱而言是珍贵的,他说:“也就是在和这些学生的共同生活中,我感到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常常想,如果没有这样一些学生,我肯定很难在贵州坚持18年,更难度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可以说我是和这些贵州的学生结下了患难之交、生死之交的。”

一生难忘“两宗罪”

钱理群这一代学者,都经历过文革,这也成为观察这代学者思想形成必要的背景。钱于1960年到贵州,至1978年考取研究生回到北京,21岁至39岁的人生黄金时期,都是在此度过。他在贵州经历了文革,也是在这里,犯下了一生中最大的两个罪过,其一,与他的父亲相关。

父亲在台湾,成为钱理群的罪证。红卫兵砸开钱理群的居所,将他的房间翻了个底朝天,结果从箱子里翻出父亲的照片。这正是他在来到贵州时,从母亲手中要来的照片。红卫兵们如获至宝,质问他为什么保留这张照片,为什么不和“反动分子”划清界限?钱理群面对逼问,无言应对。在“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逻辑下,钱理群只有低头认罪,他想割断每一个给他带来“罪证”的联系,父亲的照片,成为他不得不舍弃的亲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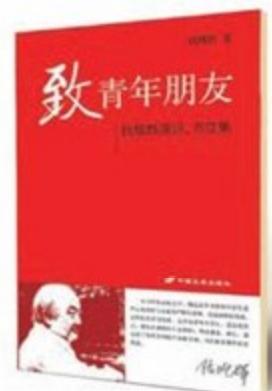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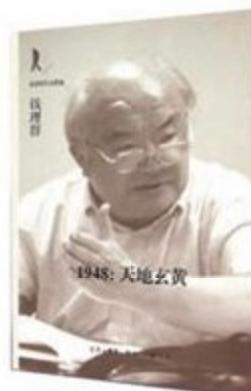
于是,这也成为钱理群一生挥之不去的“罪过”:他亲手烧毁了父亲的照片,火焰

燃起,一点点吞噬了父亲的面容,化为黑色的灰烬,留在钱的心中,久久不去。从此,和这个被红卫兵称之为“反动分子”的亲人,划清了界限。钱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已经心如死灰,以为人世间早已无感情可言,更不说父子之情。”直至1972年,钱理群得知父亲在台北去世,他才猛然意识到,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钱说:“我亲手烧毁了对我有着养育之恩的父亲的形象!我这大逆不道的、罪恶深重的儿子。”

但更坏的还未到来。文革开始,钱理群即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一天,发现房间里面挂着他送给学生的衣服,旁边却写着“钱理群,还给你的狗皮”,曾经的师生关系,转眼间成为敌对之人。钱理群回忆文革经历时说:“文革最可怕的地方,是发动你最近的人来揭发你。”那时一个和他最亲密的朋友揭发了他,说钱理群喜欢蓝色,特别是天蓝色,于是一位美术老师就此分析,钱理群为什么喜欢蓝色,因为国民党的旗子是青天白日,他不喜欢红色,因为他仇恨五星红旗,你看他多反动,是个死心塌地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孝子贤孙!

检讨成了钱理群的日常生活,他说:“逼你挖掘阶级根源、社会根源、思想根源,没完没了。我看透了他们是要逼我说谎,不说谎过不了关。我就横下心来,既然你们的分析、批判如此荒诞,我也可以胡编乱造。”

原以为检讨可以过关,却引来了更多的逼供,追问钱:“你这么反动,他们(指钱的朋友)怎么就不反动呢?”胡编乱造,钱以为可以



过关,没想到却要牵连他人,压力之下,钱开始编造关于他人的谎言。钱理群为此懊悔不已,他说:“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连累朋友,这就越过了做人的底线。我心里永远不能原谅自己,这正是文革最大的罪恶:它把人性中的恶诱发出来,让其恶性膨胀,使人不成为人,由此而造成整个社会的恶。”

这种恶,甚至可以使得一个年轻的生命凋零,让钱理群痛苦莫名。其时有一个女学生,出身地主家庭,钱理群被打成反革命之时,几乎所有人都对他敬而远之,没有人为他说话,也没有人同情他。这位女学生却站出来替钱理群说了几句话,随即被打成“为反革命分子钱理群辩护的现行反革命”,女生为此投湖自杀。

这件事给了钱理群巨大的震动。无数个深夜里,他在星光下审问自己:“即使我真的罪孽深重,与生俱来,也应由我一个人默默承受,为什么偏不甘寂寞要用青年的热情来慰藉一颗孤寂的心,结果却让他们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这岂不是用青年人生命之重来换取自己苟活之轻?”

自省使得钱理群不断地挖掘内心,他试图从这桩本不该发生的悲剧中寻找到答案。钱理群后来说:“我终于发现自己的责任,在无辜的青年面前我有罪!在贵州大地上的这样一个坟就永远地压在我的心上。后来我离开了贵州,在更大的范围内与年轻人、学生交往,我总觉得有一具沉重的死尸横埋在我和青年之间,向我警示着历史重新发生。”

这也构成了此后钱理群学术生涯中一个内在动力与心理背景,也促成钱理群教学与写作的驱动力,成为他学术的重要向度:为年轻人写作,做青年人益友。

学者的命与战士的心

1978年,在经历文革浩劫之后,各领域在缓慢恢复。钱理群被准许参加研究生考试,他已经39岁了,而规定考研的年龄上限是40岁。当接到准许考试的通知时,仅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其时报考学员七百多人,最终钱理

群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进入北大深造,求学于导师王瑶,走上学术研究之路。

钱的学术生涯,给予他知识和思想储备的仍然和贵州生活相关。从21岁到贵州教书那一天起,就利用业余时间,研读鲁迅作品,写了上百万字的笔记。正是靠这长期的积累,钱理群终于赶上了最后一班车。尤其是在文革中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对他的精神气质影响甚大。钱后来回忆时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心目中,永远是一种批判性、革命性的学说。我至今还记得,我在读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时,所受到的灵魂的震撼。这样彻底的批判精神,在我看来,是与鲁迅精神相通的,这几乎注定了我后半生的人生选择与学术道路。”

上世纪80年代,钱理群对鲁迅研究的成果在学术界引发较大反响,他提出的“历史中间物”概念,也引来不小的争议。在钱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心灵的探寻》中,他写道:“可以说,这是‘开放的一代’与‘封闭的一代’之间的隔膜,是具有怀疑主义的否定精神的一代与在形而上学独断论、绝对主义的时代文化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之间的隔膜。研究了几十年的鲁迅,现在终于发现,自己在一些基本方面(当然不是全部)与鲁迅是隔膜的,这自会引起一种难言

的、挖心掏肺的痛苦。”

隔膜感,始终存在于钱的世界。具体表现出来,即是学术和政治、学者和战士间的矛盾,也由此注定了钱理群一生的姿态。在钱的精神世界,战士与学者的不同身份,使他焦虑莫名。钱认为,精神层面的战士,即鲁迅呼唤与身体力行的“精神界战士”。他对现实的关怀,对政治的关怀,最后都转化为精神:学术的探讨、思想的批判与创造。

钱在自我剖析时认为,一直在“当学者”与“当战士”这两条道路中徘徊,矛盾、斗争,苦闷。一条“学者”的大道正在面前展开,他周围的同学都在奋力地走着这条路,周围的人也希望他走这条路。“然而我不能忘却过去,我无法安下心来,周围的一切政治事变都在我思想上引起强烈反应。我不能不忧国忧民忧自己。而且我研究鲁迅,如果安心于做一个不问世俗的学者,我就根本背叛了鲁迅,我的业务不能与政治分开。”

精神上的矛盾,也导致在一些人看来,钱理群是一个“怯懦的知识分子”,钱理群这样概括自我矛盾:“当学者,不肯。当战士,不敢。混日子,不愿。我承认并且自责我的自私与怯懦,我毕竟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过是一个知识分子中的理想主义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赵京华认为,钱理群所走的学术道路,抓住了20世纪中国的核心问题,那就是革命、社会改造和知识分子主体性的问题。他说:“我觉得他在反抗绝望的过程中,能够坚守批判的立场;在孤独痛苦的思索中,去追求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

这样一个学者的身影,自1981年钱理群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2002年退休,二十余载教学生涯,在无数年轻人的眼里,钱的反思与批判,却构成了求学时光的另一种精神食粮。

告别教育和青年

2002年6月27日,这是钱理群在北大的最后一节课。既是课堂,也是告别会,学生

66
我不能忘却过去,
我无法安下心来,
周围的一切政治事变都在
我思想上引起强烈反应。
我不能不忧国忧民忧自己。
如果安心于做一个
不问世俗的学者,
我就根本背叛了鲁迅,
我的业务不能与
政治分开。
55



↑2012年9月2日,北京,“孙郁对谈钱理群:活在当下的鲁迅”在字里行间书店举行。

们眼含热泪,钱理群激动不已,他告诉这些学生们,在刚参加工作时有两个目标,一是去北大教书,二是去南师大附中当老师。在北大退休了,但教师仍然是他的职业,并且,将会是他一生的职业。

随后,北京大学的同学们在“未名BBS”上发出600多个帖子。钱理群最喜欢其中的一个帖子,发帖者说:“钱老师该说的已经说了,愿意听的人也听了,不愿意听的也就不听了,也该退休了。”

退休却仍然“在岗”。钱与语文教研室的老师一起,给高中生开设“鲁迅作品选修课”。为什么钟情于中学教育?钱理群如此剖析:“第一,我觉得中国的问题最根本的是教育问题,是孩子的问题。我曾经说过,人到了老年一切都看透了,都很绝望了,唯一不敢绝望的是孩子,如果对孩子也绝望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还做什么。我要反抗绝望。第二,大学教师到中学去,这是五四的传统,鲁迅、周作人、朱自清都当过中学教师。”

南京师大附中是他的第一站。钱为此特意花费两天时间备课,重写教案,提前四

天来到学校,与老师们沟通。开课之际,教室挤满学生,甚至连过道里都没有空地儿。但令钱理群没有想到的是,随着一堂堂课讲下来,听课的学生越来越少,最后在教室里仅有20多名学生了。他百思不得其解,是自己的课讲得太差?四处询问,却一直没有找到原因。

一位学生后来写信给钱理群,道出缘由,信中说:“钱教授,我们不是不喜欢听你的课,而是因为你的课与高考无关,我们的时间又非常有限。我们宁愿在考上北大以后,再毫无负担地来听您的课。”钱理群思虑万千,给学生回信说:“这位天真的中学生哪里知道,今天的大陆大学教育,已经被绑上就业的战车,也迟早有那一天,凡是与就业无关的教育,都进不了大学的课堂!”

南京听课的少,钱理群又去到贵州。这里是她生活了18年的所在地,他带了自编的教材《贵州读本》,信心满满地踏上旅程。没有想到的是,钱理群谈民族文化传承,大学生们向钱提出的问题却是:“如何学好英语?”钱尴尬不已。学生们告诉钱,学了民族语言没有用。为了找份好工作,他们更需要学会如何熟练掌握汉语和外语。

2012年9月9日,钱理群在“寻找来自一线

老师的声音”座谈会上,说出了对中学教育的感慨:“现在已经不是教育理念的问题,是利益链条的问题。学校、教师、学生、家长都成了利益链条上的一环,谈理论他们也许会讲得比你还好听,但是做就是另外一回事。”

钱也就此作了深入分析,认为当下中国教育改革之所以陷入困境,就是因为只限于教育方法的改革和实验,而回避了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而且是在其他领域改革滞后、经济改革畸形化情况下,单方面进行教育改革。随后,钱理群宣布,将告别教育。他说:“现在不是教育大可作为的时候。”这句话由一位终身职业为老师的学者说出,莫名地使人伤感。意料之外的是,16个月之后,钱理群又将选择告别学术。

2014年12月12日,三联书店为钱理群举办的“《钱理群作品精编系列》出版座谈会”上,钱理群发言时宣布,除了告别教育,他也将告别学术界,告别青年。他说:“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要把最后的时间留给自己,留给家庭,过更平静也更本色的生活。

真正告别了吗?他是一个学者,更是一个战士,这样的人是不会离开的,并将一直在场。实际上,钱理群仍然在写作,他最新的作品,是自述性质的《一路走来》。

回顾这一生,钱理群感慨莫名,他说:“我的一生一路走来收获了两个东西,一个是收获了有缺憾的价值,我认为我的学术和教学是有价值的,这一点我有自信,但同时这是有缺憾的价值,我也很庆幸。另一个是收获了‘丰富的痛苦’。我还会继续走下去,还会一路走好,最后完成和完善我自己。”

□ 编辑 徐伟 □ 美编 黄静





征信中心

大陸個人信用體系或將重构

大陸首批個人征信牌照發放在即，在引入社會機構激活市場的同時，也伴隨着對個人信息安全的質疑。

記者/曹薈

原本被市場猜測在7月底發放的首批8家個人征信牌照並未如期而至。但根據目前的消息，這8家機構均已全部通過央行的正式驗收，獲得牌照只是時間問題。

今年1月5日，央行發布《關於做好個人征信業務準備工作的通知》，要求芝麻信用、騰訊征信、深圳前海征信、鵬元征信、中誠信徵信、中智誠徵信、拉卡拉信用和北京華道征信八家機構做好個人征信業務的準備工作，準備時間為6個月。

個人信用徵信是指，依法設立的個人信用徵信機構對個人信用信息進行采集和加工，

並根據用戶要求提供個人信用信息查詢和評估服務的活動。個人征信在個人貸款等方面有著廣泛應用。

然而，大陸個人征信領域發展相對滯後，並以央行的征信中心為主導，其發布的個人征信報告也是目前金融機構對用戶信用考核的重要標準。央行作為行政機構，在保障征信信息權威性和安全性同時，也形成了諸多徵信的空白領域。此次，監管機構向市場發放個人征信牌照，釋放了巨大的市場空間，引來眾多中外機構競爭。

一家獲批機構這樣描述未來的場景：一位客戶需要租房

時，房東要求其提供個人信用等級以確定押金的金額；在相亲網站註冊信息時，“個人信用”一項也會被標明；如果個人信用等級不高，很可能在預約酒店、餐廳、打車時受阻……

在激活市場的同時，社會各界也擔心個人徵信信息可能被徵信機構泄露和濫用。這也是首批牌照並未如期下發的原因之一。

5億信用“黑戶”

據官方數據，截至2015年4月底，央行徵信系統已收錄8.64億自然人，其中有信貸記錄的自然人為3.61億人。

這意味著，中國13.64億人

口中仍有超過5億人未被徵信系統覆蓋，大多數沒有信貸記錄的自然人信用記錄幾乎為零，他們的個人信用狀況，猶如戶籍制度中的“黑戶”，無迹可尋。

而在成熟的發達國家，作為金融體系基礎建設之一的徵信系統，這樣的信用“黑戶”比例要小得多。美國個人徵信體系已經覆蓋85%的人群，德國3/4的人口的信用狀況有據可查。

之所以如此龐大的群體沒有被徵信系統覆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長期以來，大陸的個人信用領域是央行徵信中心一家獨大。

2006年3月，央行徵信中心成立，負責企业和個人徵信系

统(即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又称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建设、运行和维护。2013年3月15日施行的《征信业管理条例》中,明确其国家设立的属性。根据官方资料,在征信中心收集的信息中,以银行信贷信息为核心,还包括社保、公积金、环保、欠税、民事裁决与执行等公共信息。

但是学生、农民工、个体商户等群体,在这些公共信息中几乎从未出现。若要真实反映这部分人的信用状况,需要更多的维度和更隐蔽的数据,对于一家官办机构来讲,显得力不从心。

与此同时,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又在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推动个人信用信息的需求,同时也让长期未被官方个人征信系统纳入覆盖范围内、但却在互联网领域有迹可循的自然人拥有了自己的信用情况,成为可能。

也正源于巨大的市场前景,国内多家机构对此垂涎,尤其是掌握大量自然人社交、网购等海量价值信息的互联网公司。这些公司在有能力为“覆盖死角”提供信用痕迹的同时,自身也存在对个人信用信息的需求,因此对获取牌照颇为积极。

监管机构此次开启非官方个人征信业务的大门,使各类民营机构开始进入市场补白,更多维度和更海量的个人信息被收集,大陆或迎来个人信用的迅速渗透期。

据悉,就在第一批仍未正式发牌的时候,百度、京东、快钱、拍拍贷等互联网公司和P2P平台传出消息,已经开始或有意

备战第二梯队。知情人士告诉媒体称,目前申请的机构预计超过30家。

“给一个名分”

首批8家获批的个人征信机构,基本可分为以鹏元、中诚信、中智诚为代表的传统征信企业和以芝麻信用、腾讯征信等为代表的互联网新贵两类。

在业内人士看来,几家传统的征信企业都在各自领域“底子很深”。鹏元征信在深圳地区拥有绝对的优势地位,据悉,深圳市个人信用征信系统都是由鹏元承建。

拥有国企背景的中诚信征信隶属于中国诚信信用管理集团,已经与银行、电子商务平台、P2P信贷、保险公司、移动通信公司、支付公司及其他工商企业等开展业务合作,在多个领域,拥有相对成熟的业务模式。

中智诚董事长盛希泰,是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副主席,且从事金融行业二十年,曾任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并且和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共同创立了洪泰基金,这样的背景对于主要面对金融领域的征信企业来说,优势可想而知。

中国平安旗下的前海征信,此前其一直在陆金所名下,后划归在平安集团的IT部门,据悉,其目标客户主要是小额贷款公司、网贷平台等。但背靠平安,曾有人推测,未来征信数据很大程度上将来自集团内部。

对此,前海征信CEO邱寒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前海征信扮演的是信息整合者的角色,有平安的数据,也有其他机

构的数据。但在系统的建设和内部管理的制度上,前海征信是沿用银行级别管理。

事实上,早在个人征信牌照尚未启动之前,传统的征信企业已经在各自领域深耕多年,只是在没有牌照的情况下,无法名正言顺展开拳脚,此次的牌照对于他们来说更多的是“给一个名分”。

醉翁之意不在酒

而以芝麻信用和腾讯征信为代表的“新型”征信机构,则并非如此。作为此前并未涉及过多个人征信业务的“新手”,在模式和布局的选择方面,无疑带有背后阿里和腾讯这两位大股东的印记。也因此格外引人关注,外界纷纷通过对二者的比较,对阿里和腾讯未来布局做出诸多猜测。

芝麻信用由阿里系蚂蚁金服全资控股,其合作的数据源覆盖了将近4亿实名用户和多个应用平台,这显然来自支付宝的注册用户和应用场景,而主推的大数据也是阿里系一直以来的强项。

“芝麻信用作为独立的

就个人隐私泄露风险而言,民营公司拥有个人信息并不必然比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拥有个人信息的风险更大。数据资源是征信行业的核心竞争力,不会轻易泄露。

第三方征信公司,蚂蚁金服旗下的网商银行、支付宝和其他合作机构一样,也是我们的客户,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源。”芝麻信用相关负责人对《凤凰周刊》表示。芝麻信用可用数据资源包括,中国规模最为庞大的电商交易数据以及互联网金融数据,还包含公安网、最高法、教育部、工商等公共机构的数据。此外,还有一部分重要来源,就是与酒店、咖啡厅、商店等消费应用场景的商户合作,还有用户自主上传的数据。

诸多迹象表明,芝麻信用显然不是单纯要做个人征信,而是阿里在金融领域棋局的一部分。比如,信用评分高的用户已经可以享受免押金租车,可以在签约酒店先住店后付钱;可以应用于金融借贷、租房、相亲等领域,甚至可能申请新加坡签证。

这些无疑在为打通阿里旗下蚂蚁金服,其金融闭环的重要关节做铺垫。

如果说芝麻信用的优势更多是在支付领域的应用场景,那么从目前的合作机构来看,腾讯征信则可能更多的集中在金融,当然,来自社交领域的大数据仍是其依托的利器。

在前不久召开的媒体沟通会上,腾讯征信总经理吴丹给出了腾讯征信的思路,“一开始我们的想法就很明确,为风险控制服务,要提高整个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水平,我们做的是给他们一套工具,能实时在线完成风险防范。”

腾讯相关负责人向《凤凰周刊》介绍,腾讯征信的征信产品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

反欺诈产品，另一类是信用评级产品。其中，反欺诈产品包括人脸识别和欺诈评测两个主要的应用场景；信用评级主要以星级的方式展现，共7颗星，亮的星越多表明信用评级越高。

腾讯征信主要依靠腾讯互联网平台的大数据，比如支付、社交等。这背后，是腾讯拥有8亿QQ账户、超过5亿微信账户、3亿支付用户，以及QQ空间、腾讯网、QQ邮箱、微博等多种服务上聚集的庞大用户。

当然，这也给腾讯带来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对社交数据到底能不能作为征信依据的质疑。一位业内人士坦言，人在社交工具中的真实性确实有待鉴别，因为毕竟社交工具存在一定的虚拟特征。对此，吴丹给出的解释是，每个人不是单独存在的，会和身边的人产生各种关系，包括交易、支付和社交，这些数据都是有价值的。

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腾讯

征信，同样也是腾讯互联网金融布局中的重要一环。“腾讯征信是在我们整个互联网金融布局里非常重要的业务与能力。”腾讯财付通副总经理林文钦对媒体表示。

数据安全隐忧

就在首批个人征信机构牌照即将下发之时，业内仍然存在多重担忧，最主要来自保护隐私和数据安全。有分析推测，这也是牌照并没有如期下发的原因之一。业内人士对一家陆媒透露，数据安全以及是否取得客户授权是央行验收工作重点。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醒，要警惕放开个人征信系统带来的个人隐私泄露风险，朱巍表示，普通的互联网数据具有不可识别性，而征信涉及的数据和普通互联网数据不同，可能会侵害到个人隐私。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赖小民在今年两会期间就曾对媒体表示，应对互联网征信数据的采集范围、使用原则和信息安全等问题做出明确的法律规范，防止个人隐私被侵犯甚至泄露，特别是对哪些网上信息可以采集、如何使用、如何维权等做出确切规定，要从立法层面完善征信信息安全和数据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

对此，获批机构，尤其是饱受质疑的互联网背景企业，纷纷做了明确说明。

芝麻信用的相关负责人对本刊称，芝麻信用涉及的所有数据调研都需经过用户允许，且这些数据的运转是在全封闭的环境下，所有的过程没有人工参与。

腾讯征信在媒体沟通会上表示，采用的社交数据，不会涉及用户隐私内容，更多的是用户活跃度、社交关系等数据。产品均是借助腾讯已有数据建模评测，不会触碰、分析聊天记录和交易明细等用户隐私；信用

评分提供给第三方机构使用，先须经客户明确授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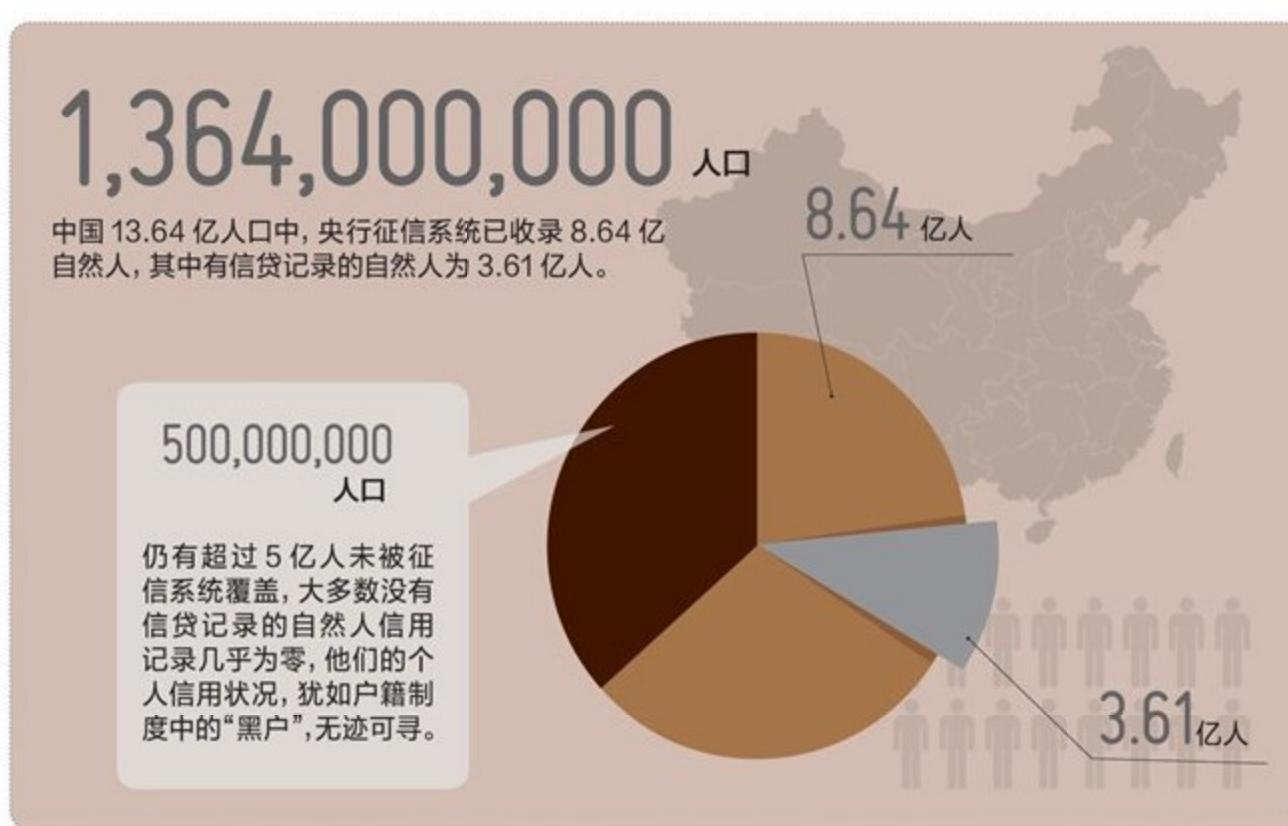
前海征信也曾对媒体称，极少数的相关人员只有在经过批准后且需按特定流程被全面监控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接触到个人的隐私信息。

《人民日报》此前刊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文章称，就个人隐私泄露风险而言，民营公司拥有个人信息并不必然比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拥有个人信息的风险更大。因为数据资源是征信行业的核心竞争力，民营征信公司一般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数据的采集、挖掘、处理和保护，不会轻易泄露。

此外，对于个人信用评估的公平性，公众也表示出疑虑。

由于各家采集的数据不同，很有可能出现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机构有不同的信用等级。对此，一位业内人士称，随着公众对个人信用的接受度逐渐提高，以及个人信用在社会生活中应用逐渐广泛，一个自然人可能授权几家不同的个人征信机构，这样可能会使公平性大大提高。

还有一种可能性，如同互联网行业一样，尽管多家机构有意进入个人征信市场，但最后可能只有少数两三家占据绝大多数市场份额，基数越大，公平的可能性就越高。广发银行信用卡中心相关负责人在腾讯征信的媒体沟通会上曾提到，美国的征信历程曾经有几千家，逐渐缩减到几百家，现在主流的就是三家。也就是说，这样的过程，很可能在中国复制。





股市重挫下的“减持”敢死队

大陆股市连续重挫。为稳定股市，监管当局严令打击违规减持，但仍无法阻止大股东减持套利，其根源在于制度的空白，这需要从法律层面加以规范。

记者/曹蓓

7月27日沪指暴跌8.48%，创8年来最大跌幅，两市超九成股票下挫，近两千股跌停。

这样的结果让监管当局难以接受，因为距离7月8日多部委强势救市，股市缓慢企稳，仅不到20日。27日深夜，中国证监会

发声称，市场猜测的“国家队”撤出完全不符合事实，不排除有人恶意做空的可能。

监管当局的良苦用心并未与所有上市公司取得一致，多家公司无视监管维稳目标，顶风违规减持。其中，中航资本成为争议的焦点。

根据证监会解释，违规减持行为包括超比例减持未披露、短线交易以及窗口期减持、违反承诺减持等。

中航资本7月28日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航投资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因其涉嫌违规减持

中航黑豹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之所以引发众多关注，是因为就在次日，中航资本召开董事会会议，免去杨圣军总经理职务。

有媒体称，杨圣军可能是A股史上因涉嫌违规减持而遭到罢免的第一人。更为尴尬的是，早在此前，其母公司中航工

业董事长林左鸣曾高调护盘，带领旗下子公司大力增持本公司股票。

遭遇监管核查的不止一家。据陆媒统计，7月份已有至少20家公司的大股东（或重要股东）因违规减持收到证监会《调查通知书》；而从年初至7月末，这一数字约为21起。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7月31日通报了针对违反规定和承诺减持上市公司违法行为的处理情况。其中指出，证监会集中处理了一批控股股东及高管违反规定和承诺减持本公司股份的行为，相关立案52起。

当头一击

经历了上一轮暴跌后的中国股市，已经如同惊弓之鸟。对于刚刚呈现出企稳迹象的市场，“7·27”的到来，意味着监管层此前强势救市举措和数千亿元资金的效果可能大打折扣。

对于救市资金的具体数字，路透社报道称，据估算中国总共筹划了5万亿元资金来制止市场的恐慌性抛售，资金额占中国GDP总值约10%。这意味着，政府可能付出了大幅高出预计的成本。但这一估算尚无中国官方信息印证。

对于此次下跌的原因，国内外机构和媒体众说纷纭，甚至有外媒因此对中国经济提出担忧，称其恐怕会影响世界经济复苏。但显然，此种有意或无意的悲观言论，并没有足够的理由支持，很快被国内外主流媒体驳回。

机构具有相对足够的理性，而散户则不会被类似于经

据估算中国总共筹划了5万亿元资金来制止市场的恐慌性抛售，资金额占中国GDP总值约10%。这意味着，政府可能付出了大幅高出预计的成本。

济数据这样的理由击溃。最有可能有如此号召力的因素，恐怕是“国家队”的退出。

据分析，在周一股市大幅下挫时，“国家队”未现护盘身影，有人据此猜测，这可能是监管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督促“国家队”撤离的情况下，对市场有意的试探。彭博社消息称，IMF已敦促中国最终退出为遏制股市市值被抹掉的跌势而采取的救市措施。

这或许是对市场承受能力的高估，所以才会有证监会连夜澄清，称“中国证券金融公司没有退出，并将择机增持，继续发挥好稳定市场的职能。”但即便随后的交易日“国家队”护盘迹象明显，仍引发了退出路径的担忧，按照业内人士的说法，毕竟如此巨量资金不会永远停留在资本市场。

无论如何，最终的结果是，监管层从政策和资金方面不惜代价的护盘，可能无功而返。

减持的代价

中国股市对政策强依赖的结论被再次证实，一方面更多的资金将持续进场，另一方面，更强硬的行政手段

陆续出台。

7月份监管层密集整治违规减持，就是其中之一。原本监管部门对违规减持的查处是常规工作，但如此高调，显然与资本市场未达预期有密切关联。

官方消息称，证监会近期集中处理了一批今年上半年发生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规定和承诺减持本公司股份的行为。目前，已对涉嫌超比例减持未披露、短线交易以及窗口期减持、违反承诺减持等违法违规行为立案52起、采取行政监管措施77项；证券交易所对上述行为采取自律监管措施91项，采取限制交易措施34项。

在此前的7月8日，也就是政府强力救市的开始，中国证监会连续发布了三个关于大股东和董监高增减持的公告，其中规定，“即日起6个月内，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持股5%以上股东（以下并称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市场统称重要股东）不得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公司股份。”

随后，大批违规减持的上市公司股东遭到立案调查，其

中有一部分是7月8日之前的违规减持，也有7月8日之后的顶风作案。根据陆媒统计，仅7月27日当天，就有不少于9家上市公司股东因违规减持而遭到证监会立案调查。

监管的高调显然意在起到警示的效果，然而目前情况下，仅以警告、批评教育、责成书面检讨等类似的方式，和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恐怕很难阻挡股市暴跌形势下股东顶风套利的冲动。

更重要的是，现行的《证券法》并未禁止上市公司重要股东增持或减持自己公司股票。按照《证券法》第四十七条，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但是，证券公司因包销购入售后剩余股票而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卖出该股票不受六个月时间限制。”

这就意味着，监管层的规定并未有法律上的强制性作用。这也是上市公司冒险违规减持难以有效禁止的原因之一。

原本是资本市场常态的大股东逢高减持，在股市大跌的情况下，对市场信心确实是极大的打击，尤其是在中国这样尚未成熟的资本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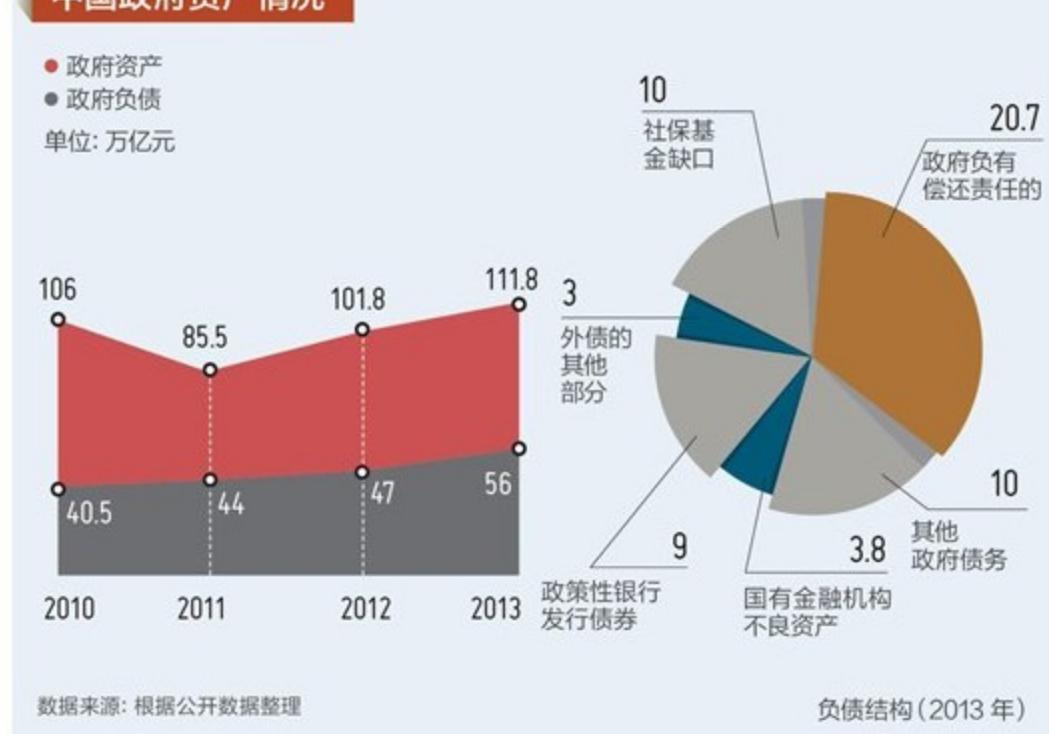
于是更严厉的惩罚措施，被业内呼吁，希望新修订的《证券法》将违规成本提高列入考虑范围。



↑ 中航资本总经理杨圣军可能是A股史上因涉嫌违规减持而遭到罢免的第一人。

链接 ↓

中国政府资产情况



解读 ↓

用土地出让金激活PPP
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本刊综合】为了避免发生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中央被迫采取债务置换的方式，给地方以喘息机会。只是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地方很难因为中央的救急而转变发展理念，而不再以负债的方式进行城市建设。反而又萌生出大搞土地财政的热情，继续在城市建设与房地产开发上做文章。现在，很多地方想方设法通过所谓的PPP（公私合作）模式，重拾土地财政，以此来拉动增长、拉动政绩。只是社会资本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冲动，因此，尽管地方推出了数万亿元的PPP项目，得到社会资本响应的却寥寥无几。激活社会资本参与PPP项目的投资热情，土地出让金是非常有效的一种“催化剂”。绝大多数项目只有在有土地出让收入做承诺和保证的情况下，社会资本才愿意介入，PPP模式也才有可能见效。所以，如何把土地出让收入的使用办法、使用目标、使用渠道等向社会公布，以此来打消社会资本的担心，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PPP模式的作用。

中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
应为小概率事件

【本刊综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杨等学者联合编制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杠杆调整与风险管理》于7月24日发布。该报告显示，按宽口径匡算，2014年中国主权资产总计227.3万亿元，主权负债124万亿元，资产净值为103.3万亿元。以窄口径来统计，即扣除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13.4万亿元，并以2014年的土地出让金（4万亿元）替代当年的国土资源性资产（65.4万亿元），中国的主权资产将由227.3万亿元减少到152.5万亿元。由此，窄口径的主权资产净值为28.5万亿元。李扬称，无论何种口径，中国的主权资产净额均为正值，表明中国政府拥有足够的主权资产来覆盖其主权负债。因此，在较长的时期内，中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应为小概率事件。但是，包括养老金缺口以及银行显性和隐性不良资产在内的或有负债风险值得关注。中国的主权净资产的增长动态有可能逆转。

焦点 ↓

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
负债已超56万亿

【本刊综合】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8月3日发布的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显示，截至2013年底，中国政府负债超过56万亿元，同比增长近两成。与此同时，中国政府2013年资产总额111.9万亿元，同比增长近一成，增速远低于负债增速。

根据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2015，2010年地方政府资产总计106万亿元，2011年资产总计85.5万亿元，2012年资产总计101.8万亿元，2013年资产总计111.9万亿元。相较于2012年，2013年政府资产增长近10%。而反观中国政府的负债情况，2010年政府负债总计40.5万亿元，2011年负债总计近44万亿元，2012年负债总计47万亿元，而2013年政府负债总计大幅攀升至56万亿元，同比大幅增长近20%。具体分析这56万亿的负债结构可知，2013年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约20.7万亿元，其他政府债务近10万亿元，国有金融机构不良资产3.8万亿元，政策性银行发行债券近9万亿元，外债的其他部分为3万亿元，社保基金缺口10万亿元。

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表示，中国的资产规模大、情况良好，足以应对政府债务。谈及2013年政府债务同比增幅近两成的原因，他表示地方政府债务的攀升可能是重要因素。目前，中国实行以收付实现制为核算基础的预算报告制度，主要反映政府预算收支等流量情况，不存在以一级政府作为主体的资产、负债的合并数据。中国目前尚无真正意义上的政府资产负债表。根据去年年底国务院印发《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方案》，2020年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需要向外界公开，资产和负债都将明晰。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中国政府负债增速较高，但政府拥有大规模优质资产。中国近几年来政府总资产规模均为负债规模2倍左右。

124
万亿元

故土怎堪离

环境难民的哀愁

Alessandro Grassani





2011年，29岁的蒙古姑娘额尔德尼·图雅拖着一只冻死的羊。这只羊死于一场暴风雪，被埋在图雅家的帐篷附近。图雅一家是普通的蒙古百姓，草原上寒冷的冬季被蒙古人称为“Dzud”，Dzud令这个家庭在过去三年中，损失了2000只羊——这是他们全部家当的一半还多。为了寻找更温暖的草场，图雅一家从蒙古北部的布尔干省迁移到蒙古中部一个叫乌尔兹伊特的村庄附近。



2011年，一处被遗弃的蒙古包被大雪覆盖。牧民们眼睁睁看着牲畜们被冻死，牧草地逐渐减少，最后只能迁往他处。
2010年最恶劣的一次Dzud期间，蒙古有超过800万只羊、牛、马和骆驼死去，其中有3.9万蒙古牧民选择前往首都。



2011年，从沉睡的醉汉肩上望过去，就是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在这座人口占蒙古一半的城市里，酗酒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里的人口在过去两年中增加了一倍，城市无规划地盲目扩张，许多居民住在被称为“帐篷区”的贫民窟里。等待放弃游牧生活的牧民们的是高失业率和贫困。他们不识字，也没有受过任何适应城市工作的技能训练。涌入城市之后，他们在贫困线上挣扎，许多人在酗酒中沉沦。



孟加拉国，这片地区刚刚被飓风和洪水袭击。2009年时这里还曾是一片良田，但是现在由于海水的渗入，土地盐碱化，已经寸草不生。孟加拉国是个人口过亿、人口密度极高的亚洲小国，有相当一部分土地是由境内贾木纳河形成的冲积平原。这里地势低洼，在雨季极易发生洪灾。同肯尼亚的干旱相反，孟加拉国民众迁徙是苦于飓风和洪水的袭扰。孟加拉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A.N.M.Muniruzzaman指出，气候变化将给孟加拉国造成3000万到4000万气候难民。

孟加拉国Satkhira地区，Fazila Khatum正在晾晒衣物。她所在地的街道已经被洪水浸泡。过去9年来，这里的河流已造成数次洪灾。人们惶惶不可终日，不清楚什么时候会突然爆发洪水，更不知道洪水会有多大。Fazila Khatum和她的丈夫过去靠种植水稻谋生，但是由于洪水频发，粮食绝产，他们现在不得不转行，靠贩卖家禽谋生。





肯尼亚，来自Turkana部落的Edipo今年23岁，他的身体严重畸形，这是邻近Pokot部落的一场夜间偷袭后的结果，好在他捡回一条命。稀少的降雨让肯尼亚这里的人和动物都变得疯狂。为了争夺有限的水与牧场资源，各个部落之间不断爆发冲突。部落里，人们的财富取决于自己拥有牲口的数量，当地人为了有限的自然资源，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肯尼亚图尔卡纳郡，一场大旱令此地唯一的一处水源地面临沙漠化。预计到2025年，地球上2/3的人口将面临水资源短缺带来的压力，数亿人将面临无水可用的困境。非洲之角是这一情况的典型代表：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两国边境间的沙漠化日趋严重，苏丹和乌干达之间的武装冲突笼罩了牧区，干旱和饥荒更加剧了这些地区的武装对抗形势。

超过2亿，这是国际移民组织（IOM）预计到2050年因环境恶化而背井离乡的人数。这个正在不断增长的人群被称为“环境移民”，他们出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是继政治危机、战争问题后的又一大难民群体。

有时，变故是因自然灾害引起，如洪涝干旱；有时是因生态环境退化，如耕地沙漠化、水土流失；有些则是完全人为的环境污染事件所致。

意大利籍摄影师格拉萨尼（Alessandro Grassani）把这称为21世纪人类新的人道主义危机。过去多年来，他将镜头对准那些因环境变化造成人口迁移的国家和地区，试图展示这种现象背后人们生活的变化。他的摄影作品《Environmental migrants: the last illusion》（环境移民：最后的幻想）获得了第15届Luis Valtueña国际人道主义摄影奖。

在具有代表性的肯尼亚、孟加拉国和蒙古三个国家，天灾人祸以不同的方式改造人们的家园。肯尼亚的居民目睹家乡最后一处泉眼枯竭，而在世界的另一角孟加拉国，人们却因泛滥成灾的水、上升的海平面苦不堪言。

很多环境移民选择了陌生的大城市。在蒙古，这个国家几乎一半的人口居住在首都乌兰巴托，其中又有半居住在贫民窟。气候变化令蒙古的严冬变得越来越长，雪下得越来越厚，猛烈冲击着传统的游牧生活。成千上万的牧民放弃了牲畜、牧场和蒙古包，无奈地涌向乌兰巴托的贫民窟。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孟加拉国的首都达卡和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

然而，陌生城市的生活并不如意，他们多蜗居在肮脏的贫民窟里，没有自来水或电力供应。这些原来一辈子以耕地和牧场为生，被迫进入城市的人们，大多缺乏教育和训练，无法胜任城市里的工作。规模庞大的移民也对城市的医疗保障、可居住空间提出更严峻的挑战。（曾鼎）



出于对冲突的恐惧及未来的忧虑，许多肯尼亚人被迫前往首都内罗毕，希望获得生活与经济上的稳定。但事实上他们的机会少得可怜。34岁的妇女Rose生活在内罗毕郊外的一处土坯房里，她正在做家务。一场极其严重的干旱过后，所有的牲畜都死了，她不得不和丈夫带着6个孩子从图尔卡纳郡移居到内罗毕。这就是“环境移民”们迁居后的状态：挤进道路拥挤狭窄、卫生状况堪忧的棚户区。

苏联警戒号反潜舰兵变始末

解密《猎杀红色十月》原型事件

文 / 李星

1 975年11月9日上午，波罗的海的里加湾外热闹异常。苏联空军前线轰炸航空兵团18架雅克-28战斗轰炸机组成了攻击队形，分多批次飞抵，轰炸海面目标。被攻击对象是一艘军舰，它熟练地进行机动，以规避来自空中的盘旋攻击，舰艉在波涛上划出长长的白线。

这幅惊心动魄场景，既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幻想小说的开头，也不是一次军事演习，而是真枪实弹的军事行动。更为奇特的是，被苏联空军锁定的是一艘苏联海军现役大型反潜舰警戒号，因为它已成为一艘叛舰。

兵变的领导者是警戒号的政治副舰长，即西方世界俗称“政委”的瓦列里·米哈伊罗维奇·萨布林海军少校。他计划推翻腐败的、官僚化的勃列日涅夫当局，在列宁主义基础上重新建立新政权。换言之，他想以官方意识形态的名义，向苏维埃国家机器宣战。

美国冷战作家汤姆·克兰西从萨布林与警戒号的事件中得到灵感，写作畅销小说《猎杀红色十月》，后来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曾一度风靡全球。

十月革命节次日的短暂政变

夺取警戒号是实现“远大目标”的第一步，萨布林接下来计划开着“革命”军舰取道波罗的海与涅瓦河，前往俄国十月革命的摇篮——列宁格勒，停靠在已经成为水上博物馆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之侧。

届时，他将通过广播电视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呼吁，宣告勃列日涅夫治下的



苏联腐败滋生、贿赂公行、欺骗充斥，国家已经被盗卖一空，社会主义祖国面临严重的威胁。他进而将号召全国展开罢工，直至苏联政府取消对言论自由的压制。

1975年11月8日晚7时左右，十月革命节次日，萨布林通过一种不流血的方式开始了自己的政变。他声称有些军官需要纪律约束，将舰长波图利内海军中校诱至位于甲板下位置最深处的第二声呐室。舰长进入房间后，意外地发现房间空空如也，并没有违纪军官等待处分，只有几本书。正在舰长纳闷之际，舱门被砰地关上了，萨布林在门外

加了自己事前从商店买的挂锁，并让水兵亚历山大·沙因持枪在门口看守。这名刚刚年满20岁的水兵素来敬仰萨布林，主动加入了兵变。

萨布林随后召开全体军官会议，舰上大多数军官出席。他向到场的16名军官讲述了自己的主张和计划，并取出了事先准备好的西洋棋棋子：愿意参加兵变的，可以选择白子；不愿意参加的，选择黑子，并进入禁闭室，一旦兵变失败，后者不至于受牵连。8名军官选择了参加行动，其他人进入禁闭室。

晚间10时许，萨布林在上层后甲板召集全体水兵，舰上165名水兵中有150人到齐，他们伫立在11月的寒风中听政治副舰长的讲话。令众人惊讶的是，出席的军官只有萨布林一人。他抨击勃列日涅夫及其班子背叛了党和十月革命的理想，愚弄和剥削苏联人民，将国家带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些人必须为这一切负责。

“有时你花了几乎半生时间等待，就是为了某一时刻。”萨布林在前一天的日记中写道。这一时刻到了，为获得支持，萨布林谎称已有数十个军事单位同意一起行动，北方舰队和太平洋舰队正在等待警戒号发出的信号。

船上水兵大多出身集体农庄或者工厂，年纪在18-20岁之间，他们没有怀疑萨布林的言辞。无论是入伍前还是入伍后，这一代人早就切身体会到特权阶级的跋扈、工农生活的艰难、军队的腐朽。但在苏联社会中，他们从未见到官方人士敢于公开说出真相，更难以想象一个负有政治监视职责的政治副舰长挺身而出。

一名水兵回忆道：“当萨布林问道‘你们是否同意？’时，我们都完全知道，他所说的事情是危险的，但却是一个值得一试的目标……他穿过队列，站在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面前，问‘你呢？’，你会听到每个人都在说‘是’或者‘我同意’”。水兵沙因的记忆是，听完演讲后舰上陷入了热烈气氛，仿佛一个节日里大家都在热烈谈论，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人那样生活。

萨布林原先的计划是待天亮后行动，一个突发事件让行动提前。近午夜时分，舰上的一名军官、该舰共青团书记弗尔索夫，通过系缆出逃至附近停泊的潜艇，报告了警戒号上发生的惊人事件。由于苏联军队素有节日期间狂饮滥醉的传统，加上弗尔索夫的汇报内容令人难以置信，最初听他报告的军官们无不怀疑此人是灌饱了伏特加后产生奇思妙想，故未迅速采取行动扭转局面。

发现有人跳船逃跑，萨布林立即下令



↑ 警戒号反潜舰的成员合影，前排左起第四位为萨布林。

↓ 警戒号反潜舰兵变事件曾轰动西方世界。

起锚开船。眼睁睁看着警戒号擅自出海，苏联波罗的海舰队这才发现了事情的严重性，层层上报至苏共中央。从睡梦中被叫醒的勃列日涅夫总书记，下达了命令：阻止它或击沉它！

波罗的海舰队的半数水面舰船大举出动追击警戒号，海军航空兵的图-16轰炸机

也接到出击的命令。或许是飞机所携带的苏联第一代巡航导弹制导效果不佳，或许是海军飞行员不愿轰炸一艘己方军舰，海军飞机均未攻击，带弹返航。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对海军失去信任，命令空军去执行攻击任务。驻扎在波罗的海沿岸的苏联空军侦察机与战斗轰炸机，纷纷起飞搜寻该舰，遂发生了本文开头那一幕。

追逐中，警戒号的后甲板被飞机投下的一枚炸弹击中，船舵被卡死，只能无力地兜

着圈子。与此同时，舰长波图利内被忠于他的水兵解救，他冲到驾驶室，开枪打伤萨布林腿部，夺回军舰的控制权。

一场“革命”告一段落，唯一的流血者是萨布林。据一位在机场迎接战机返航的空军中校目击，完成关键一击的空军上尉落地时，显得极为消沉。该飞行员因精准的轰炸被授予一枚勋章，但他从未佩戴过。

两份版本的事实调查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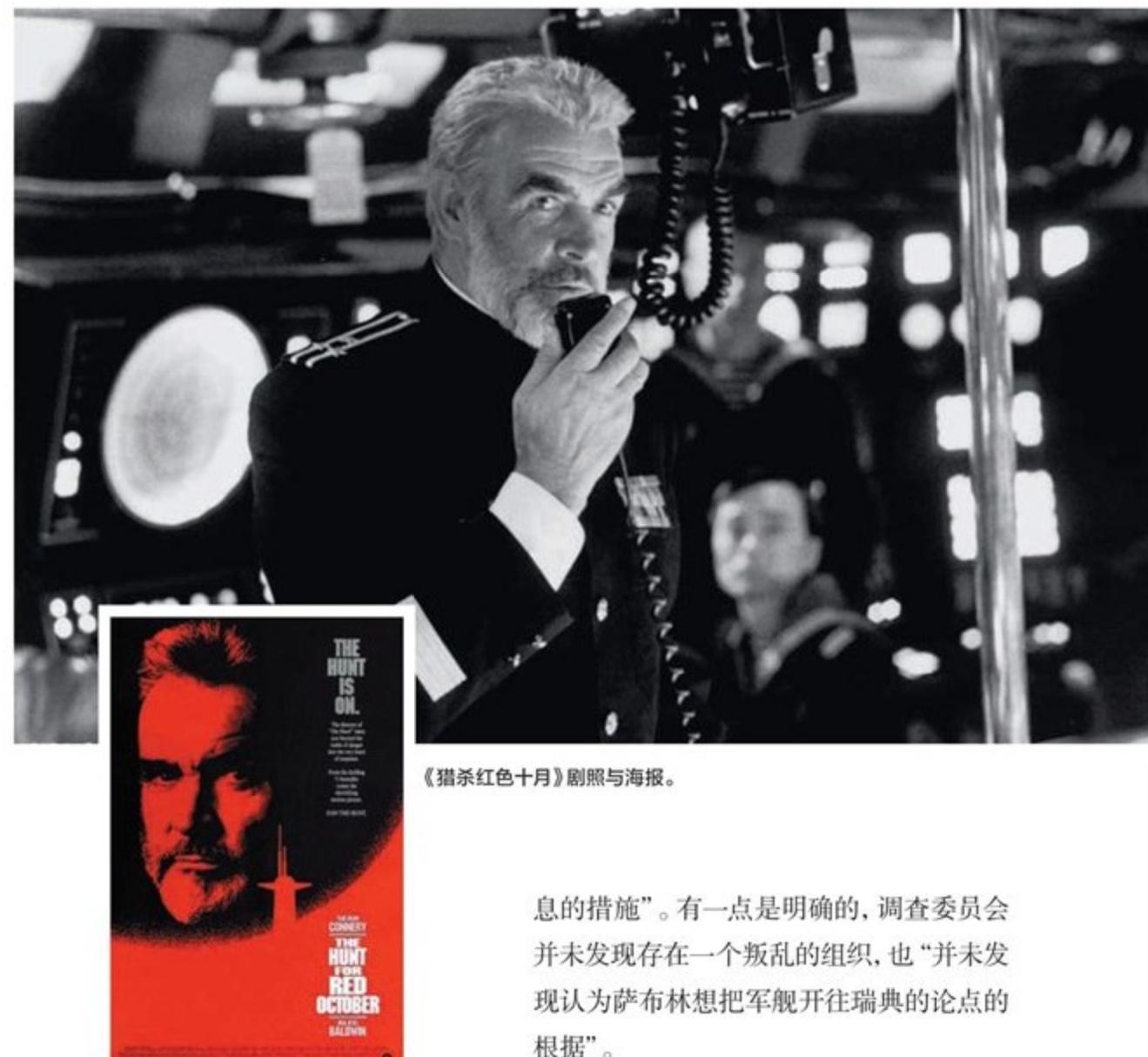
警戒号尚未被押回港内，对兵变的事实调查就开始了。

苏联的“事实”，分为内部掌握和对外公布的两个版本。内部事实的特征是，官僚机构会在不伤害本部门利益的前提下，对某个事件在真实基础上加以适当修饰后上报，即俗语所称的“酒里掺水”。对外公布的事，是以宣传需求为导向、以虚构为基础，适当点缀真实素材加以编造以求逼真，即“水里掺酒”。

在内部版本中，一般来说，官僚阶梯中越接近下层，所上报的情况就越接近于实情。克格勃审讯员奥列格·杜博罗夫斯基上尉得出结论：“萨布林完全不知道怎么将自己的计划付诸实施。他的打算非常天真，孩子气十足。”这一结论是客观的，即便警戒号到达目的地，萨布林成功通过电视向全国发送了“革命”演讲，那么会发生他设想的全国革命吗？答案是：不可能。

1970年代苏联政府的社会控制力，显然不是1917年的沙皇政府或临时政府能望其项背的。萨布林的“革命手段”，更像是从苏联宣传影片《列宁在十月》、《战舰波将金号》中得到的灵感，充满不切实际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却不值职业革命家一嗤。

他没有意识到，1917年的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是当时诸多政治势力中组织性最接近于军队、行动意志最为强烈的“职业革命家集团”。同时，它特别重视在一切组织中发展自己的力量，为夺取政权服务。用列宁的原话说，“俄国社会民主工



《猎杀红色十月》剧照与海报。

党……继续坚决利用一切‘合法机会’，从黑帮杜马讲坛，到任何一个戒酒协会都要加以利用，来进行坚持不懈的有计划的工作……”

以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在写给国防部的报告中对“内部事实”进行进一步修正：先极力缩小参与兵变的舰上人员规模，宣称只有2名军官投向萨布林一边；同时表示萨布林所说的军队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只不过是一些众所周知的社会弊病，不足为怪。

针对这一事件，此报告开出颇具勃列日涅夫风味的整改措施：由苏军总政治部制定措施改善军人的政治教育工作，研究修改高等院校军官培训大纲，使军人积极而有进取性地捍卫共产主义道德与苏联现实，并对事故责任者加强追责机制等等。当然，必不可少的是，“已采取了杜绝走漏消

息的措施”。有一点是明确的，调查委员会并未发现存在一个叛乱的组织，也“并未发现认为萨布林想把军舰开往瑞典的论点的根据”。

随后进行的审判和对外报道，则是“水里掺酒”的典范。苏联宣传部门先是公开否认发生兵变，并将一艘靶舰在短时间内拖到了轰炸发生地，宣称发生的是一场“打靶”演习。但由于事件发生在交通繁忙的公海上，实在无法彻底掩人耳目，苏联又私下放风称萨布林要驾舰叛逃资本主义的瑞典，并宣称他有精神分裂症状等。对于苏联高层来说，尽管出现叛逃事件并不光彩，但如果外界知道了事情的真实原因，后果更是不堪设想。考虑到萨布林兵变的本意，说他要叛逃堪称真相的反义词。

苏联的宣传举措在国外颇为成功，如《华盛顿邮报》此后即按叛逃事件报道此事。或许，萨布林的真实动机实在超出了西方社会一般人士的理解力与想象力。

1976年7月进行的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审判中，法官与宣传部门统一口径，给萨布林扣上了“背叛祖国分子”、“擅自驾驶大型反潜舰

离开里加港开往瑞典方向”等罪名。严格说来，开往瑞典方向在字面上倒也符合“客观事实”。由于里加湾北面有岛屿阻隔，不能通航，开往列宁格勒的出港船只，都必须先向西面的瑞典哥德兰岛航行一段，再急转向东北方的斯德哥尔摩驶去，随后再向东前往列宁格勒。警戒号尚未完成第一段航程，旅途就戛然而止。因此，观察到警戒号初始航向的西方情报机关，在冷战结束前一直相信该舰最终目的地是哥德兰岛。

萨布林案受重视的程度大大超过一般的叛国案，在案件侦查、起诉与审判期间，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不断向苏共中央报告进程。在写给苏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他宣称被告萨布林和沙因完全承认原告起诉的罪名，并对所犯罪行的详情供认不讳。实际情况是，萨布林与沙因都拒绝承认自己叛国和违反军人誓言，甚至不惜付出沉重代价——萨布林的妻子去探监时，惊恐地发现丈夫的牙齿被打掉了一块。

从叛国者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列宁主义者”

1939年，萨布林出生于一个俄苏海军世家，其祖父是沙俄海军军官，父亲是红海军的上校。如家庭期望那样，他进入位于列

章与警句，能指出这一内容在书中的位置，而当时连一般政工干部都很少能读毕全书。萨布林发自内心深信，共产主义最终要在未来取得胜利。因此，他非常不理解苏联当局为何如此缺乏自信，以至于对苏联社会的弊端三缄其口。

从列宁军事政治学院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政治副舰长，被分发到刚建成服役的警戒号上。随着勃列日涅夫逐渐走向衰老，不理政事，苏联这台国家机器中的弊端如以权谋私、营私舞弊、缺乏法治、官僚主义、商品短缺等问题开始越来越引起社会不满。人们的态度大体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犬儒，即缩进自己的私人空间，只追求物质生活；第二种是成为自由主义倾向的持不同政见者；第三种则是举起列宁主义大旗，反对“背叛”革命理想的现政权。萨布林显然不是“革命”路上的独行者，早在1969年就有一名陆军少尉试图开枪行刺勃列日涅夫，意图让意识形态更保守僵化的苏斯洛夫上台接班。

在查清兵变的真实原因，发现幕后并不存在一个组织之后，克里姆林宫直接下达了对萨布林的判决指示。对于背叛祖国罪，量刑一般是15年，但来自最上层的指令是判处死刑，立即枪决。萨布林在临刑前写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中，附上他手绘的两

幅图画。在第一幅画上，堂·吉诃德正挺枪向风车刺去，下一张图则是这位英勇的“骑士”折枪坠马。看来，萨布林对自己的事业和命运已有清醒认识。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重新审查了苏联时期的政治案件。1998年，针对萨布林是否应被定罪，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再次举行审判。结果认定萨布林和沙因的行为不构成叛国，其罪名应为“滥用职权”即扣押本舰舰长，因此撤销原判决，改判萨布林十年有期徒刑，其家属被认定为“政治迫害的受害者”。推崇列宁主义的萨布林不惜“以身相殉”，成为了国际互联网上左派网站的怀念对象，他被誉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列宁主义者”。

在太平洋服役多年后，名舰警戒号于2002年退役，随即报废后被卖到中国。在江苏靖江的拆船厂，它和其他来自太平洋舰队、布满铁锈的旧军舰一起，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被拆成废铁。

最终，警戒号的事迹以一种萨布林绝对预料不到的方式获得了重生：美国军事作家汤姆·克兰西看到西方关于警戒号的报道而触发了灵感，于1984年写下了小说《猎杀红色十月》，描述苏联海军的一艘军舰叛逃西方，并在北大西洋上与围追堵截的苏军海空力量展开了扣人心弦的周旋。小说中，起事军舰型号被换成了“台风”级弹道导弹核潜艇。

该书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被里根总统称赞为“无法放下”的“完美故事”。此后，原著被改编成畅销战棋与电子游戏，1990年被好莱坞搬上银幕，由老牌男星肖恩·康纳利担纲主演，成为闻名遐迩的冷战架空题材影片。萨布林原先设想用于打响十月革命第二炮的“革命”军舰，最终以投奔美国的形象存留于大众文化之中，这无疑是命运对他开的又一个巨大玩笑。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重新审查了苏联时期的政治案件。结果认定萨布林和沙因的行为不构成叛国，其罪名应为“滥用职权”即扣押本舰舰长，因此撤销原判决，改判萨布林十年有期徒刑，其家属被认定为“政治迫害的受害者”。

宁格勒的伏龙芝高等海军学院学习，在海军的阶梯中努力攀爬。

与海军同袍不同的是，萨布林身上有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他始终不渝地保持着自幼受到的意识形态熏陶。1970年，他收到军校同学们赠送的新年礼物《资本论》后，不但通读全书，还在书的边角处做了密密麻麻的笔记。他能信口引用此书的篇

幅图画。在第一幅画上，堂·吉诃德正挺枪向风车刺去，下一张图则是这位英勇的“骑士”折枪坠马。看来，萨布林对自己的事业和命运已有清醒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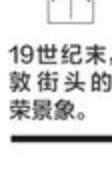
他的“桑丘”沙因，被判处了8年有期徒刑，其中2年在监狱监禁，6年在劳改营中度过。不过，极端审慎的政府还是将沙因在监狱中关押足足五年半，直至认为他



英国19世纪缘何发生人口爆炸？

1801年英国人口是1590万人，1901年为4150万人。英国人口在19世纪上半叶增长了1倍，在19世纪下半叶增长了75%。因下水道修建的普及，霍乱在1866年被扑灭，其他借助水传播的疾病也很快销声匿迹。天花在1853年被消除，因为国家实行强制接种疫苗。医疗技术、公共卫生的改进极大降低婴儿死亡率，延长人们的平均寿命。

随着化肥和休耕法的普及，农业产量增长迅速。北美谷物和澳大利亚冷藏肉类的进口，更是丰富了英国人的营养。茶叶、咖啡、蔗糖原先在英国是奢侈品，随着产量的提升成为大众消费品，同样增加了人们的营养摄入量。英国人每日卡路里的摄入，随着食品的多元化、低消费而普遍提高。饮食进步，使人更健康、强壮，这也有力促进人口增长。◎



19世纪末，伦敦街头的繁荣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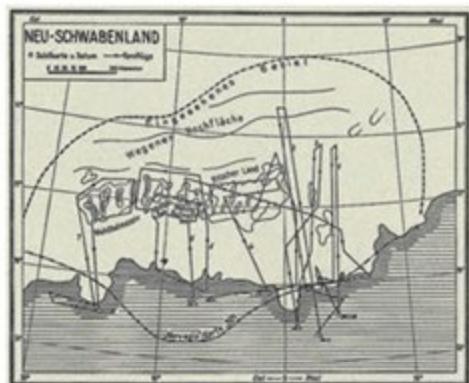
四川军阀时期鸦片税多如毛

1917年至1934年的四川，军阀分防割据，鸦片是筹集军费的最好方式，使得这段时期鸦片最为盛行。当时烟税如毛，举例部分：烟苗税，根据种烟多少来计算，又称烟窝捐；印花税即普通税，购买鸦片如同购买其他物品，票据上贴有政府印发的印花；起运税，是买鸦片时在起运的地方应征的税；落地税，把鸦片运到出售地，在出售地征税；过境税，在经过的地方交的税；内销税，只在本防区销售鸦片应交的税；外销税，贩运鸦片出川应交的税，在四川出口点或宜昌有征税点；红灯税，烟民吸烟或开设烟馆点红灯供人吸食应交的税。

还有诸多名目的税收被归为附加税，如重庆市长潘文华要附加市政费一成，放入他私人开的重庆银行。其他如教育附加、建设附加、民政附加等，总之大小军阀头目说了算。另有哭笑不得的懒税，如果被强迫种烟的农民敢拒绝，就指责农民懒惰而处以税收一笔。这种乱象，直到1935年中央政府派参谋团和中央军进入四川，控制住川军后才大体告终结。◎



20世纪初，中国烟馆内抽鸦片者



“纳粹余孽躲在南极”的谣言从何来？

德国在一战中惨败，失去了广袤的海外殖民地，直接导致国内原材料的匮乏。纳粹想到了鲸鱼脂肪，当时生产人造黄油、酱料、肥皂时都需要鲸脂，德国只能用外汇以不菲的价格从挪威购买。德国遂建立捕鲸船队，准备大规模猎杀鲸鱼。1938年12月17日，“施瓦本”号考察船从德国启航，它携带两架水上飞机，前往东经20度和西经10度的南极地带。德国主要目的是寻找一个适合建立捕鲸站的地点，另有建立海军基地之意，军方希望远洋作战的军舰和潜艇可以在南极得到补给。

当船于1939年1月19日到达目的地

时，发现挪威已于一年前宣示了主权。德国以众击寡，一不做二不休扣押了挪威人，径直宣示主权。德国人将此地命名为“新施瓦本”，建立了一个临时基地，用飞机拍摄超过16000幅照片。二战爆发后，德国无暇再赴南极洲。待大战结束，战败国德国的领土要求全失效。不过挪威在1961年签订《南极条约》，便失去了对新施瓦本的管辖权。但纳粹余孽躲在南极地下基地的谣言一直被流传，有不少人说自己在南极见到纳粹的飞碟和潜艇，甚至有人造谣说英美的特种部队一直在尝试攻击冰川下的秘密基地，这成为诸多文学作品的原材料。◎

纳粹的南极考察地图和水上飞机。

军中造反派的一幕闹剧

文革对解放军的正常建设造成巨大冲击，在一种迫击炮的列装上都能见到荒诞故事。67式82毫米迫击炮在1968年就定型，军委指示尽快批量生产装备部队，以取代老旧又笨重的53式同口径迫击炮。时值动乱高潮，极左分子以“革命”的理由反对武器更替，他们认为这有悖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他们倡导“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节约精神。

至于53式迫击炮重量大、携带困难，极左分子认为这纯属思想问题，只需要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来克服，红军长征时扛着更笨重的迫击炮照样跋山涉水。有一个造反派出身、火箭式提拔起来的师职干部，发动属下士兵开展一人扛一门53式迫击炮向党表红心的练兵活动，向军内走资派证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士能够克服一切困难”。为增加难度，他将比赛场地定在青藏高原，结果重负不堪的士兵走了几百米就严重缺氧被紧急抢救。经此血泪事故后，再没人敢阻止新迫击炮的列装。◎

去海军省“上访”的日本愤青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几年，常有日本愤青去海军省“上访”示威，当时海军因保守而被视为懦弱。标榜作家、农民身份外，“上访者”往往打着各种组织的旗号，如某新闻社、真正勤皇团、爱乡塾、圣战贯彻同盟、爱国妇人会茨城支部、召开茨城县打倒英国县民大会十三团体、县会议员有志等等。来者多在大幅宣纸上写誓言和请愿书，观点大同小异，通常用半文半白的语句表述“必须征讨英美”。

他们通常想进海军大臣和海军次官办

公室，副官装着不厌其烦地接待，打发人离开。有人直接展开宣纸恐吓，声称“代天诛灭山本五十六（时任海军次官）”，并向还嘴的秘书或副官一阵臭骂。有来者对山本出席英国使馆举行的电影招待会极为气愤，副官说高松宫宣仁亲王也去了，对方大骂：“居然敢搬出金枝玉叶的亲王，你想借此掩盖自己的过失吗？”深受其



1910年代日本海军省

苦的海军省人员，觉得这些人就如幕府末年尊王攘夷的志士，被俘虏时间及为何尊王，稀里糊涂答曰尊王就是尊王。◎

□ 文陈祥 □ 编辑 段宇宏 □ 美编 黄静

《阎明复回忆录》出版

揭秘中苏两党特殊间谍

记者 / 陈祥



摄影
李光耀

“写回忆录的初衷是，作为中办翻译，我曾在伟人们身边工作了十年，亲历了中苏关系从‘蜜月’到冷战的过程，想把那些历史事件真实记录下来。”阎明复在回忆录的序言里谈及写书的最大动机。近期，两卷本共95万字的《阎明复回忆录》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生于1931年的阎明复，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民政部副部长。退隐后投身公益，参与创办了中华慈善总会，自1997年至2002年担任会长。阎明复说，从工作岗位退下后只想做两件事，发展慈善事业和写回忆录。如今，两个夙愿大体实现。他的回忆录，跨度从出生到1983年结束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工作。

他的父亲阎宝航是中苏两党隐蔽战线

上的一位传奇人物，阎明复花了许多笔墨记录父亲，为回忆录平添了许多精彩元素。

作为俄语人才见证中苏关系

早在国共内战时期，阎明复就见证了中苏关系变迁。

1946年底，共产党组织派人将阎明复一家送到哈尔滨。阎宝航早于1946年8月秘密回到东北故土，他被共产党的东北行政委员会任命为辽宁省主席。同年3月，苏军撤离东北，国共为争夺东北而爆发又一场冲突。当时，哈尔滨是共产党手中的最大城市。

1947年8月，16岁的阎明复进入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简称哈外专）学习俄语。该校前身是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更早可追溯到延安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

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抗大三分校在1941年成立俄文队，这批骨干力量在抗战后随大军赴东北。从关内络绎而来的八路军、新四军需要与苏军交涉，亟须大量俄语翻译。阎明复的二哥阎明智，就是抗大培养的第一批俄语翻译，此时担任哈外专的教师。

学校直属于东北民主联军（即关外的共产党军队）司令部，既为军校，则实行军事化管理。阎明复记得，平时穿浅黄色军装，冬季清一色穿日本关东军遗留的狗皮大衣。联军参谋长刘亚楼兼任校长，他留学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在苏军中工作至东北民主联军成立，他还翻译了苏军《参谋条例》等一系列文件，推动解放军初期的正规化建设。

阎明复于1949年12月毕业，被分配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一直工作到1957年1月。阎明复觉得全总是一所“没有围墙的社会大学”，为自己的长远发展打下基础。全总期间，他生活在苏联专家的圈子里，也接待南斯拉夫来宾，随领导人去苏联和东欧开会。全总内的阎明复这一批翻译，把苏联工会的制度和经验引入中国大陆，事无巨细做了大量工作。

“学习苏联工会工作经验，对于新中国工会的成长壮大，功不可没。”阎明复总结道。

阎明复披着妻子送来的皮大衣，口袋里是一把没被搜查出的水果糖，坐上一辆黑色的轿车，直奔秦城监狱。七年半噩梦般的人生从此开始了。

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在《阎明复回忆录》发布会上表示，阎明复写书时参考了诸多中俄两国的档案，阎明复还将部分资料拿给沈志华过目。沈志华肯定了《阎明复回忆录》中的史实可靠性较强。

遗憾的是，涉及中苏双方由“蜜月”走向分裂的部分，几乎是流水账似的资料罗列，会议

记录、出访行程记录、领导人讲话引述等。如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签署两党会谈公报前与毛泽东四次会谈全文、1960年9月中国代表团首赴莫斯科进行两党会谈的五次对谈、9月底二赴莫斯科时杨尚昆的日记、1963年中苏公开论战前的9次会议……作者在呈现原始材料模样的同时，明显降低了内容的可读性。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在发布会上肯定了这种写法：“这本书记述平实，都是亲见的东西，叙述中没有个人倾向。不仅对普通读者具有可读性，对研究者来说也很好用。”

阎明复当场解释：“之所以没有特意去概括提炼，也是怕在这一过程中加进和融入主观性的东西，或是不经意中去掉了隐没在细节中的有用信息；另外，当年经历和参与过的当事人和决策者，健在的越来越少，这部回忆录再不全面交代、讲述这段历史全过程，恐怕以后就不会有既亲身参与或者说经历过那段历史、又有机会接触第一手资料、能全面记述那段历史过程的书籍问世了。”

俄语翻译们的厄运

1967年11月17日夜，宏庙大楼三楼大礼堂，“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阎明复大会”正在紧张进行中。主角阎明复被两名军人扭住胳膊，推到台前，随后被扯下胸前所挂的语录纪念章。手持语录的造反派头子带头高呼：“打倒苏修特务！”“打倒杨家死党！”“打倒现行反革命阎明复！”批斗会末尾，一个军人宣读了逮捕证，当场给阎明复戴上手铐，两个军人押送他离开会场。

阎明复披着妻子送来的皮大衣，口袋里是一把没被搜查出的水果糖，坐上一辆黑色的轿车，直奔秦城监狱。“我的七年半噩梦般的人生从此开始了。在这里，永别了和我几墙之隔的父亲；失去了美好人生中最宝贵的‘自由’；感受了‘独牢’之孤寂、‘思亲’之痛苦。”阎明复在回忆往事时感喟。

进秦城后遭遇第一件事，是脱光衣服后换上囚服。那是白色粗布的衬衣衬裤、黑色的棉袄棉裤，棉裤没有裤带，缝了短短两根窄布

条用来勉强系扎，这是为防止犯人用裤带上吊自杀，这种精致的管理细节借鉴自苏联。看守在交代完相关事宜后，就将阎明复推入囚室。对阎明复而言，这一切发生得很突然，他回忆当时“在万籁俱寂的独牢里，我最终意识到我被捕了，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监狱，也不知道要关多久，等待我的是什么，立刻陷入了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心情。”

整体而言，阎明复的狱中岁月回忆，与同时期遭迫害进秦城的老干部的回忆大同小异。最独特之处，乃疑似上面派了懂俄语者暗中监视他。1974年妻子来探监，阎明复在回牢房途中，见到一个衣着整齐、梳着小分头的年轻人带着得意的微笑看着他，这是典型的翻译人员装扮。阎明复断定，这个陌生人就是翻译。此后，结合此前的种种因果现象，阎明复开始在牢房里搜寻窃听设备，未果。

从此，阎明复抓紧一切时机自言自语，告诫对方不可能窃听到任何秘密，因为他是清白的。存心与狱方作对，他故意常用俄语自言自语或唱歌，有时大段背诵《毛泽东选集》。“老子是陪同毛主席和‘老毛子’斗的，还看不出你们这一点儿雕虫小技？”他独自在屋内痛骂，想刺激监听者。最终，他的疑惑集中到天花板的电灯上，但直到出狱都没有查得水落石出。

社会地位前后落差之巨大，对阎明复造成巨大冲击。“对我这样一个正当年轻、曾多年在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身边做翻译的人来说，变化太突然、太悬殊，好似从伟人光环下的‘风风光光’，突然坠入了‘万丈深渊’；仿佛从纵观‘世界风云’变幻的工作环境中，一下子就‘人间蒸发’般地被囚禁在与世隔离的独牢中。”



1968年四五月间，阎明复在狱中听到了熟悉如父亲的咳嗽声。但父亲这样功勋卓著、资历深厚的人怎么可能进入秦城监狱？阎明复用直觉排除了这个可能性。实际上，这声音确实来自阎宝航，荒诞的命运让父子成为监狱邻居，父亲的囚犯代号是67100，儿子的代号是67124，中间才隔了23个人。阎明复当时不知道，父亲在1967年11月7日被捕，1968年5月22日死于秦城监狱，身后事草率到骨灰都未保留。几声咳嗽，成为阎明复听到的父亲最后的声音。

长期的狱中生活，损害了阎明复的精神健康。他变得歇斯底里，动辄和监狱管理人员吵闹，经常大骂对方虐待犯人，接连用鞋子砸坏屋顶的灯泡。无奈下，监狱给中央专案组写报告，认定阎明复已疯。阎明复随后被强制做危险的电疗，他极力反抗，最终改为服用药物。他不知道是什么药，总之每天三顿饭之外就是昏睡。幸好，两三个月后，1975年4月，他被毫无预兆地释放回家了，他接着需要一段时间来治愈精神创伤。

阎明复遭劫的背后，是中苏关系剧变殃及在中枢工作的俄语人才。

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在1957年1月成立，阎明复任组长，有组员朱瑞真、赵仲元两人。小组的最初使命，是接替师哲，在中苏党政首脑会谈等外事活动上任俄文翻译。翻译组地位高贵，1950年代末，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说，国务院有外交部，中共中央有联络部，中办有小外事机构即中办翻译组。

师哲身份特殊，他长期在苏联学习、工作，于1929年加入了克格勃的前身即格别乌，此后一直在苏联安全部门工作，直到1940年回国抵达延安。初期，他的任务是作为共产国际的观察员，观察并汇报中共七大的情况，共产国际在1943年解散，师哲依然是延安和莫斯科间电报和书面联系的重要联络人。中苏交恶的预兆刚显露，师哲就预感到自己将有厄运，故主动离开中央去地方工作，他果然在1962年被关押。最终，所有为中央服务过的俄文翻译，都被扣上“里通苏修”罪名。

阎明复记录了好友李越然的遭遇，他便

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李越然父亲李芳中在中东铁路交涉局工作时，就担任苏联的谍报人员，苏军进入东北后，精通俄语的李越然开始为苏军做情报工作。孰料多年后，这段经历成为污点，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1956年出访苏联时想请李越然做翻译，政审没通过，最后改派阎明复。只是，阎明复也好景不长。

父亲阎宝航的谍报生涯

一部由国家安全部参与制作的谍战剧《英雄无名》，2008年在央视一套播出。该剧将阎宝航抗战时期的事迹普及介绍给大众。

更早在1995年11月，叶利钦签署了为阎宝航颁发“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章”的总统令，俄罗斯驻中国大使罗高寿在使馆向阎宝航后人、阎宝航情报小组的两位健在者颁发纪念章。不过，大陆媒体当时未报道此事。

阎宝航在平反后被官方热情宣传，首先是东北籍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吕正操在1988年6月的《人民日报》上撰文，《一生无私奉献，风范长留青史——纪念阎宝航同志逝世二十周年》。1995年7月，情报系统元老罗青长在《人民日报》上刊文，《反法西斯的无名英雄——纪念阎宝航同志百年诞辰》。

2005年，央视拍摄了专题纪录片《阎宝航》，专程去莫斯科采访已离任的罗高寿。罗高寿说：“阎宝航的功绩可以同苏联著名的情报人员佐尔格相媲美。我认为，政治家、历史学家对阎宝航写得太少。阎宝航的功绩是俄罗斯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阎宝航让苏联、俄罗斯感激不尽的功绩，来自他直接向莫斯科提供的两份重要军事情报。当年他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高官，俄文代号“巴维尔”，国内只有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李克农知晓他在为苏联搜集国际情报。他先是拿到了德国计划进攻苏联的确切日期，它来自中国驻德武官桂永清的报告。1944年夏，阎宝航借阅到军委会掌握的日本关东军材料，包括部署、设防计划、要塞地址、兵种武器、番号人

数、将领姓名等。

实际上，按军事情报学常识，绝大多数情形下，单份情报不可能让人采信，做一个判断需要建立在多种来源、多种形式的情报之上。苏联在苏德战争前夕收到了巨量情报，但情报来源越多，斯大林越发相信是丘吉尔在散播阴谋。同理，佐尔格情报小组的尾崎秀实提供的关东军情报，远比阎宝航的情报丰富，但阎宝航的消息可作为辅助材料来证明尾崎秀实这一情报源的可靠。

“九·一八”事件爆发不久，阎宝航一家人在日军刚占领沈阳时就跑到关内，一别故乡14年。11月，阎明复在北平降生。东北沦陷前，阎宝航已是东北社会的名人、张学良的重要幕僚，他担任了奉天基督教青年汇总干事，那是当时最大的青年组织。1934年，阎宝航担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总干事，会长由蒋介石亲自担任，可见蒋对他的重视。正是在蒋介石身边工作期间，阎宝航在国民政府党政军高层编织了一道关系网。抗战爆发后，阎宝航的官方职务有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重庆市动员委员会设计委员、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陪都劝募公债运动主任干事等，民间职务则更多。

情报界常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越高，能获取的情报价值越大。1937年抗战爆发前，阎宝航由周恩来介绍入党，成为秘密党员。他利用自己的身份为共产党做出无可替代的贡献，营救被捕的党员，开展地下情报工作，掩护地下工作者……吸收名流阎宝航入党不是小事，延安需要向共产国际报告，共产国际认为他是国民党上层反动分子而拒绝。党内也议

论纷纷，部分人嫌阎宝航社会关系复杂，周恩来坚定地说：“你关系不复杂，但是阎宝航能做的事，你能做得到吗？”

周恩来此话不假，阎宝航完成了诸多他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国民党的专业情报机构并非不知情，阎明复回忆往事时即提及，重庆卫戍司令刘峙找过阎宝航“谈心”，戴笠、康泽、徐恩曾也找过阎宝航“谈心”。但只要没确凿把柄落在国民党手里，没有人敢为难阎宝航，何况这些特务头子多与他交好。逐渐，共产国际也认识到阎宝航的巨大价值，1941年春，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与阎宝航接上线，交代了任务范围、具体要求、技术问题，周恩来事先找阎宝航通了气。阎宝航从此领导一个情报小组，同时给延安和莫斯科两边搜集情报。

阎明复对重庆岁月的最深印象，仅仅是家里有无数陌生人进进出出，他们吃饭、临时借宿、躲藏、打麻将、开会交谈……阎家的三层楼别墅照顾了无数的东北落魄同胞，因此被誉为“阎家老店”。当然，所有的秘密会议都不可能让年幼的阎明复接触到，阎宝航妻子高素桐每次亲自打扫散会后的房间，母亲为什么要担负起佣人的工作，阎明复在多年后才明白这是出于保密需要。

《阎明复回忆录》里最具私人色彩的部分，是少年时期、大学岁月、秦城时光，其中以少年时期经历最为翔实。但对父亲人生中最惊心动魄的阶段，阎明复当年是懵懂无知，这固然是保密工作一丝不苟。“我当时年少，对父亲和情报小组的壮举一无所知。”阎明复在回忆录里遗憾写道。1947年在哈外专的“三查”运动中，阎明复很认真地在父亲身份一栏里填上“资本家”。

父亲在子女面前闭口不提为苏联做情报工作，直到1962年，在中办翻译组工作的阎明复看到父亲写给周恩来的信，上有周的批示，这才知道端倪。此时中苏关系紧张，阎宝航的这份特殊经历成为了“黑材料”。文革伊始，阎宝航就挂上“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要员”的罪名，直至1978年初被平反。儿子阎明复，则在同年年底获平反。◎

1937年抗战爆发前，
阎宝航由周恩来介绍入党，
成为秘密党员。
他利用自己的身份为
共产党做出无可替代的贡献，
营救被捕的党员，
开展地下情报工作，
掩护地下工作者。

上海名妓的风头

从晚清到民国，上海的名妓是时尚潮流的引领者。花界名人，你争我抢，争的就是一个风头。

文 / 张鸣

从晚清到民国，上海的妓女，拿得出手的，分为书寓、长三和幺二。书寓过于古朴，生命力比较弱，真正出彩的是长三和幺二。

说起来，长三和幺二，文化不一样，长三规矩大，嫖妓程序繁琐，花头多。然而，走着走着，两者就都差不多了。毕竟，上海是个讲究实际的地方。当年的花街柳巷，真实的场景现在我们已经无从知晓，看《点石斋画报》画的打茶围场景，无论三、二，都是一人拥一个丽人吃吃喝喝，跟今天KTV里的情景类似。

所谓二和三，就是出台侑酒的价格，拿牌九做比喻的。价格高的，当然脸蛋漂亮，活儿也不错，小曲唱得好。有清一朝，禁止官员士大夫嫖妓，整体上降低了妓女的格调，像明末柳如是、李香君那种能诗会画的名妓，早已不复存在。晚清禁令放松，但一时半会儿，妓女的文化素质拉不上去，所谓的“名妓”，也就是会多唱几个小曲，评弹和苏昆，碰上个把能文的，大家就给捧上了天。

上海的妓女也分地域帮派，幺二以扬州帮为主，而长三则是苏州帮的天下。其实，北京八大胡同的名妓，也多来自苏州。清朝中叶，陕州和大同出名妓的日子，已经永远地过去了。但是，京沪两地，花界中人的风格，却大不相同。北京的名妓，在社会上比较低调，名声也就是在上流社会中流传。她们的恩客，也都是这个圈子里的，圈里人替她们扬名，已经足够了。但是，上海不一样，但凡名妓，一定要张扬，用上海人的话讲，就是“出风头”。

出风头，在穿着上一定要潮，一度风靡



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

的元宝装，看上去让露出的脸蛋比较瘦的女装，就是名妓先穿起来的。现在留下的晚清名妓的玉照，大抵都是高领元宝装，身上包裹得严严的，但脸蛋却个个状如瓜子。然后兴女人着男装，长袍马褂，甚至西装革履，跟着男人在游乐场所招摇。上海地方政府一度还下令禁止，说是有伤风化。

当然，进入民国，则是旗袍的改良，越改越苗条，越显身段，再往后，露出来的部分愈发多了。这样的旗袍，跟当初的旗人妇女装，基本精神已经大相径庭。不管名妓们怎么潮，总是有一两个名妓带头，然后众妓跟上，最后，良家女子慢慢跟着学，无论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嘴里骂着娘子，行动上跟着走，蔚为大观，化为流行时尚。出风头，有时候也很政治。民国了，好些大男人尚在徘徊怀旧，但名妓们却跟得紧，五色国旗直接画进了衣服裤子，摇摇摆摆过闹市，令遗老切齿，让新进开心。

出风头，行为更要潮。第一个进戏园子、书场的，是名妓；率先坐四轮马车满城转的，是名妓；最先进照相馆照相并把玉照送人的，也是名妓，后来这些玉照居然还被

印在了香烟盒子上。大规模用洋货和西洋化妆品的，当然更是名妓。曾一度，上海滩上的上流女子，精致的日本扇子人手一柄，也是由名妓先兴的时髦。到了五四运动期间，倡导抵制日货，名妓们也率先垂范，坐着汽车，打着旗帜，在人多的地方大声疾呼，不用“敌货”。

要出风头，离不开媒体的配合。配合媒体评选“花榜”，先是“状元”、“榜眼”、“探花”，然后是“总统”、“总理”、“部长”。买票舞弊，不亦乐乎。最先把自己的小照登到报刊上的，也是这些名妓。若不是她们的配合，最早的画报还不知怎样打开销路。画报上出风头的女子，先是名妓，然后才是名媛。等名媛思想解放了，名妓就开始大露特露，甚至全裸了。

跟今天某些时髦女子一样，上海名妓出风头，也是为了挣眼球。但是，上海名妓的市场，其实跟北京一样，都是上流社会中人。有没有大众的名声，其实关系不大。挣眼球，挣得大众的名声，其实是海派的范儿。也就是说，在上海讨生活的人，无论官商，还是记者、律师、医生，打心眼儿里喜欢新潮儿，喜欢刺激。名妓们的张扬，最初都是为了恩客的欢喜，久而久之，这做派本身就成了一种新潮。花界名人，你争我抢，争的就是一个风头，哪个风头最劲儿，就看她敢不敢出格儿。

晚清上海名妓胡宝玉，在上海号称“三胡”之一，跟胡雪岩、胡公寿平起平坐。看老照片，胡宝玉相貌似乎并不格外出奇。以今日观之，这样的女子能有这样的名声，出奇的，其实就是她的风头。◎

□ 编辑 徐伟 □ 美编 黄静

钱穆眼里的中国文学史

钱穆先生是一代通儒，著作等身，然而论及文学的文字却极少，新近出版的钱穆版《中国文学史》，可谓拾遗补缺之作。

文 / 凌越（文学评论家）

7月30日，是钱穆先生诞辰120周年，一系列纪念活动在学界悄然开展。由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无疑是其间最大的惊喜。在钱穆逝世25年之后，还有他的“新著”面世，自然引起人们的兴趣。

原来，此书是由钱穆的学生叶龙，将其1955年至1956年间在香港新亚书院所做的“中国文学史”课堂笔记整理而成。书中的内容曾于2014年在媒体上连载，引起诸多文学史家的激烈争论，成为一时的文化事件，而此次出版则意义更为重大。

文学审美不掉书袋

由于本书是依据钱穆课堂讲授整理而来，保留了口头语言的特点，理解起来要比钱先生的一般著述更为容易。课堂讲课总有兴之所至的时候，钱穆自己又不可能做最后的“修订”，许多即席的发挥就更能窥见钱穆的性情和才学。

比如在第十七篇《建安文学》中，钱穆说：“中国最高的文章没有内容，没有理论，没有思想，是空的。”单看这句话有点突兀，要是钱穆自己写文章，这看起来似乎有漏洞的句子，大概是不容易见到的。但是这貌似突兀的观点又非常有意思，在一般人印象中，钱穆自然是提倡“文以载道”的通儒，怎会对“没有内容，没有思想”的文章评价如此之高呢？

实际上，它透露出钱穆高超的文学审美直觉，这句话是钱穆在一大段介绍《昭明文选》的文字之后说的，钱穆对其评价非常高，所谓“吾人如欲研究古代文学，除研读《诗经》外，再加上《昭明文选》就足够了”。



《中国文学史》

钱穆 讲授
叶龙 记录、整理
天地出版社

《昭明文选》是中国上古文学极重要选本，选入包括周、秦、汉、晋、宋、齐、梁七代之诗文作品，共有130位作家。但是并没有选周公、孔子之经文，因为“不能任意裁剪删节，有伤原来面貌”；老、庄、管、孟之文，由于诸子重立意而非重文，所以也没有选；记言和记事分属历史而非文学，也不选入。

对于《昭明文选》的选文标准，钱穆是颇为欣赏的，在他看来“这是文学开始觉醒与独立的时代”。钱穆博览群书，涉猎极广，其著述以史学、经学、文化、思想、考据、理学等领域学术性论文为主，属于文学范畴的在他五十四册的全集中只有《中国文学论丛》一册而已，但他对于文学的重视与理解力，绝不是著述数量的比例能够反映出来的。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钱穆渊博的知识没有成为其文学审美的障碍。（只要稍微浏览一下其他老派学者掉书袋式的文学批评，就可知这个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在他的意识中，仍然是把文学之纯或者说微

妙的审美视为文学的关键，对此钱穆在第十八篇《文章的体类》中有进一步的阐发：

“好的文学作品必须具备纯真与自然。真指讲真理、讲真情。鸟鸣兽啼是自然的，雄鸟鸣声向雌鸟求爱固然是出于求爱，但晨鸟在一无用心时鸣唱几声，那是最自然不过的流露；花之芳香完全是自然地开放，如空谷幽兰，它不为什么，也没有为任何特定的对象而开放；又如行云流水，也是云不为什么而行，水不为什么而流，只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流乎其所不得不流，这是最纯真最自然的行与流。写作也是如此，要一任自然。文学作品至此才是最高境界。”

这段话简直就是西方“为艺术而艺术”的中国版，这个观点出自以儒家思想安身立命的钱穆，还是多少让人有点意外，并由此更增添了几分钦佩之心。和文学本身的复杂一样，钱穆对文学的品评也是极微妙的，甚至乍看其某些观点似乎有自相矛盾处，而实际上这些都反映出钱穆对于文学审美精微的把握。

最高的文学不求人解

在钱穆看来，“文学是有情感的，是生命，也可以说是间接的生命。”随后他又补上：“文学又是时代的。”然而，“最高的文学又是不求人解的”。所有这些观点，在某个特定语境中都是正确的，而如何正确地使用，又在于批评者内在的领悟力和理解力。那么，当我们看到钱穆从道德上轻视汉赋，认为“赋后来变成皇室的消遣文学，作为供奉之用，即成为御用的帮闲的文学，如司马相如的赋便是这一类作品”，也就不难理解了。

同样，初唐诗人沈佺期与宋之间也难以入钱穆的法眼，因为“他们人格差，在武则天时代作应制诗而已”。而在评价比较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几位诗人的优劣时，人生实用的一面似又占了上风：“杜甫的诗不超脱，却是人生实用的，故其境界比庄子为高，庄子只是一位哲学家；陶渊明与屈原相比，陶为人退隐而不合作：故屈原、杜甫可说已达到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而庄子、陶渊明则较次。”

请注意“庄子只是一位哲学家”这句，在钱穆看来，最好的文学家当是在最好的哲学家之上的，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可惜翻遍全部讲稿，没见到钱穆就此问题展开进一步的阐述。这大约就是讲稿的特点，讲到精彩处经常有出人意表的观点，但又不似写作那样，可以把这个观点稳妥地固定下来，仔细经营，用缜密的论据给予这观点以说服力。

钱穆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在1962年为自己首部有关中国文学的《中国文学讲演集》撰写序言时就写得清楚：“讲演究和著作不同，有许多意见，我自知非精密发挥，不仅不易得人同意，抑且容易引起误解。”而这已经是在钱穆可以修订自己的演讲稿，甚至有两篇“是我舍弃原记录稿而径自另写的”前提下的阐述了。

类似的虽未经“精密发挥”，但却很有意味的观点，在叶龙整理的钱穆版文学史里至少还有：“我可以肯定地指出来，中国有两位大人物，即是两位大文学家：一位是屈原，他解答了文学与道德的问题。一位是司马迁，他解答了文学与历史能否合流的问题。”这当然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只可惜钱穆并未就此展开论述，可能的两篇精彩的论文，只能存在于想象中了。

中正评价不入俗流

从对整个文学大势的把握来看，钱穆版文学史是比较中正的，钱穆所激赏的屈原、司马迁、曹操、杜甫、韩愈、欧阳修、关汉卿，以至于桐城派古文和《水浒传》，现在基本已是公认的经典。

关于对曹操文学地位的肯定，整理者叶龙认为是钱穆在近代首先发现其重要性的，这引来南大学者莫砺锋教授的不同意见，认为鲁迅早在1927年就认为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了，在书跋中，叶龙对此做了进一步解释，证明钱穆在1922年就在厦门集美学校的讲课中，充分肯定了曹操的价值。

这本文学史的主要价值不在于观点的猎奇，而在于钱穆本身是一位学识极渊博的通儒，他在讲述那些中国文学史上的扛鼎之作时，也总有自己的独到的发现和独到的视角。

比如在讲《离骚》时，钱穆指出由于司马迁不识历史地理，认为《楚辞·渔父》里的“宁赴湘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有语病，人在鄂而何以会在湘水自杀，故改为“宁赴常流”。而钱穆则认为，屈原时代所说的洞庭湖与湘江都在湖北，只是因地名的迁徙而造成了误会。所以，屈原做《楚辞·渔父》时正居于湖北，所说之“湘流”实是指“汉水”。像这样的辨析实在非学识极渊博者所不能做到的。

如果说对于曹操的肯定现在已是共识，那么钱穆对于曹丕和曹植的比较则显出其眼光的特异之处。一般的文学史通常是表彰曹植而贬抑曹丕的，但钱穆力排众议，盛赞曹丕是中国文学史上讲文学价值与技巧的第一人，对曹丕所作《典论·论文》推崇备至，认为其表达了文学家的曙光，“曹丕才是真正文学家，能看出文学之价值。”前人褒曹植而贬曹丕，是因为刘勰所说的“位尊减才，势窘益价”，哥哥做了皇帝，减了才，弟弟不得意，别人同情他而更看重他的文学地位。这些意见都是不流俗的，这些不流俗的观点汇聚起来，才可能成就一部个人化的不人云亦云的文学史。

而钱穆最不流俗的看法，则是对新文学运动的批评态度，在《中国文学论丛》的再序中，钱穆对此有直率的阐述：

“然民国初兴，新文学运动骤起，诋毁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甚嚣尘上，成为一时之风气。而余所宿嗜，乃为一世鄙斥反抗之对象。余虽酷嗜不衰，然亦仅自怡悦，闭户自珍，未能有所树

立，有所表达，以与世相抗衡。”

然而时髦的文学观念往往又是易逝的，今天至少在学界对于新文学运动已经不再是众口一词的赞颂，相反，对新文学运动的负面作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反省，这时再来看钱穆几十年前所独自坚持的观念，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钱穆版《中国文学史》的出版是令人兴奋的事，但通览全书之后，和钱穆全集中仅有的论文学的《中国文学论丛》比较来看，前者的价值到底不如后者。《中国文学论丛》的前身是1962年出版的《中国文学讲演集》，收录钱穆有关中国文学的演讲稿16篇，这些虽然也是演讲稿，但是都经过钱穆自己仔细修订，甚至有两篇是丢开原讲稿重新写过的。1983年，在此基础上又增添了14篇，改名为《中国文学论丛》出版。

叶龙整理的钱穆版《中国文学史》中有意思的观点，在《中国文学论丛》的相关篇目中多半有更细致缜密的阐发。而后者中几篇极厚重的文章，叶龙整理版文学史则没有涉及。全书中最精彩的两篇文章，我以为是《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和《谈诗》，前者展示了钱穆全面而精深的学术功底，其考据功力一般学者根本难以望其项背。《谈诗》一文则将钱穆版文学史讲稿中已经流露出的偏于形式方面的审美趣味，做了进一步发挥。在这方面，近代大概只有顾随讲诗词的讲稿可以和其一争高下，顾随讲诗也许要比钱穆更敏感，而钱穆的批评视野则肯定比顾随更为开阔。

从装帧看，三联版的《中国文学论丛》相较而言更朴素舒服一些，钱穆版文学史封面在我看来有两句多余的话——“国学大师以死者的心情写死去的文学”以及“钱穆首讲文学史”。以我们对钱穆平实、扎实的学风的了解，我想如果钱穆健在的话，他断不会允许这两句充满商业营销风格的话上他的书的封面，或许连文字和观点他也会一改再改，不做“精密的发挥”，他大概不会将那些尚存漏洞的观点公之于世的。